建設

學術性月刊

5

1955

論共產主義道德教育……江　陵（一）
胡風的「眞實的現實主義」批判……霍松林（七）
反對建築學中的形式主義和復古主義……楊正彥（一五）
「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傑出貢獻……王亞南（二一）
論明清之際的社會、階級關係和啓蒙思潮的特點……侯外廬（二六）
評「獨特的民族」論……官　顯（三六）
論部分集體所有制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曹國興（四二）
中國的棉花生產問題……華　恕（四七）
貨幣流通規律與貨幣流通計劃化……鄭伯彬（五四）
孟德斯鳩——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維護和平的思想家……徐大同（六一）
·信　箱·
關於國民經濟計劃……馬紀孔（六四）

新建設
（學術性月刊）
一九五五年五月號
（總第80期）
一九五五年五月三日出版

編輯者：新建設雜誌編輯委員會
北京東華門南夾道62號
出版者：光明日報社
北京石駙馬大街甲90號
總發行處：郵電部北京郵局
代訂代售處：全國各地郵局
全國各地新華書店

預定價目
全年十二期　四元二角
半年六期　二元一角
三個月三期　一元零五分
定費一律預收

1956.7.25.第二次印刷　印數(京)55101—57780

論共產主義道德教育

江陵

一

培養和發揚新的共產主義道德，是對人民羣衆進行共產主義教育、抵制資產階級思想侵蝕的重要組成部分。列寧在一九二〇年十月在俄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着重地論述共產主義教育，而首先提到的是共產主義道德問題，可見道德教育在共產主義教育中的極端重要性。

道德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屬於社會上層建築方面的現象。道德是調整人們對社會和對人的行爲的規則的總和，這些規則用來評價一個人在社會中的行爲，他對別人和對整個社會的態度，反映出人們關於善與惡、正義與非正義等等的觀念。任何人，只要他不是白痴，他對於社會上任何事物或任何人的行爲，總要作出自己在道德上的評價，認定這件事或這種行爲是善的還是惡的，是正義的還是非正義的，從而影響自己對於該事物或該行爲的態度。每個人也各以自己所具有的一定的道德觀點影響着或制約着自己的行爲。因此，道德這一社會現象不能不對社會實際生活起重大的作用。

馬克思列寧主義第一次給道德這一社會現象以眞正科學的即辯證唯物主義的解釋，指出社會上各種道德的根源是人們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是社會的一定的經濟關係或經濟基礎，什麼樣的經濟關係或經濟基礎產生什麼樣的道德。例如，以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爲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產生資產階級道德。資本主義經濟的職能是榨取剩餘價值，資產階級的本性是唯利是圖，所以，自私自利、損人利己、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使別人受痛苦」的基礎上、把人和人的關係商品化等等，就成了資產階級道德的特色。無產階級則是喪失生產資料的出賣勞動力的工錢勞動者，被大工業組織起來，是社會上進步生產力的代表者，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是消滅社會上的勞動剝削制和少數人的特權，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爲解放最大多數勞動人民及全人類和解放自己而鬥爭。由於無產階級的這種經濟、階級地位，由於社會主義意識之灌輸於無產階級隊伍中，就產生了無產階級道德即共產主義道德。也由於此，反對人剝削人的行爲，忠於共產主義事業並爲此而英勇奮鬥，維護勞動者的公共的集體利益，反對損人利己，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使別人同享幸福」的基礎上，熱愛勞動和科學等等，也就成了共產主義道德的特色。

道德作爲上層建築方面的現象，不是永恆不變的，它必然隨着經濟關係的改變而歷史地變更着。資本主義經濟關係代替封建主義經濟關係，原來在封建社會中佔統治地位的封建宗教道德也就要被資產階級道德所代替（指統治地位），當社會主義經濟關係代替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時候，在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也就不是資產階級道德，而是無產階級道德了，資產階級道德將在人們意識中逐漸被排除。恩格斯指出：「在過去、現在與將來，就已經提出了三大類同時相並存在的道德論。其中那一種是正確的呢？如果律以絕對的終極性，那末一種都不是；可是自然，在現時表現根本改造現社會的觀點、或表現將來觀點之道德，即無產階級之道德，具有最多的長久存在的原素。」㊀

在存在着對抗的階級關係的社會中，道德不可避免地帶有階級性。在階級社會中，「道德總是階級的道德：它或是爲統治階級的統治及利益辯護，或是當被壓迫階級充分有力之時，它表現對於這個統治的反抗，而擁護被壓迫者的將來的利益。」㊁階級不同，人們的善惡觀念也不同：剝削階級認爲善的，被剝削階級認爲惡，被剝削階級認爲善的，剝削階級認爲惡。所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於階級社會中道德實質的唯物主義的理解，在實踐方面必然歸結到階級鬥爭，即承認階級社會中人們行爲的道德評價的出發點是階級鬥爭，是這個或那個階級的階級利益。「只在不懂消滅階級對立，而且在實際生活中，消滅一切關於階級對立的回憶之社會發展階段上，超越一切階級矛盾及矛盾回憶之上的、眞正人類的道德，方才成爲可能。」㊂

資產階級及其它剝削階級對於道德現象的唯心主義或半唯心主義的解釋，竭力企圖把道德的這種階級實質掩蓋起來，把自己評價人們行爲的尺度是自己階級的狹隘利益這一點掩蓋起來，企圖把自己剝削者的道德冒充爲全人類的道德。爲了這個目的，他們從各種超階級的概念中引伸出道德的根源及定義，把道德說成好像是不依賴於社會生活的實際條件（所謂「純理性的」），符合於一切人的利益、並適合於一切時代的永久不變的東西，它不是根源於某種先驗

㊀ 恩格斯：「反杜林論」，三聯書店版，第一一〇頁。
㊁ 同前引書，第一一一頁。
㊂ 同前引書，第一一一—二頁。

的東西或神的意旨，就是根源於個人的主觀願望、個人的私利觀念或甚至是人（作爲生物的人）的求生本能，等等。列寧稱這一切是「爲了地主資本家利益來愚弄和禁錮工農頭腦的伎倆」㊀。資產階級及其它剝削階級的行爲越不得人心，越是道德墮落，便越要用道德來遮掩，越要在道德這個意識領域中販運各種唯心論。近代資產階級哲學中，連篇累牘都是道德問題，各種各樣的貨色齊全，正是反映了資產階級統治的危機日益加深。國民黨反動派在中國的統治臨近末日的時候，除了直接加强對於人民的强力血腥鎭壓以外，也曾經加緊地企圖在人民羣衆中宣揚一套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的道德，用滿口滿篇的「禮義廉恥」來掩蓋其徹頭徹尾的男盜女娼，橫征暴斂，兇殘屠殺和賣國行徑，妄圖模糊人民的意識，以補强力鎭壓之不足。

資產階級除了竭力掩蓋道德的階級實質以外，並厚顏無恥地責備共產黨人摒棄一切道德。這當然是完全的胡說八道。共產主義者並不是摒棄一切道德，而只是「摒棄一切從超人類和超階級的概念中援引出來的德性」㊁，因爲這種道德只適合剝削者的利益。共產主義者所提倡的是從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利益中引伸出來的、完全服從於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利益也就是全體勞動人民利益的那種道德。

道德同其它任何一種社會意識形態一樣，它反映一定的物質生活條件或經濟基礎，同時反過來又積極地影響基礎，幫助自己基礎的形成和鞏固，並幫助消滅舊的基礎。根據這一歷史唯物論的原則，所以共產主義者在道德問題上歷來反對兩種觀點：一種是不適當地過分誇大道德在社會改革中的作用，好像社會問題的中心是道德問題，企圖依靠道德說教來改變舊的社會秩序，違背「以物質力量反對物質力量」的馬克思主義原則。這種觀點是十足的唯心觀點，只適合於剝削階級的利益。現代資本主義哲學——實用主義正不嫌其煩地把社會問題說成是一個道德問題，說什麼要改善社會，必得先改變人性。共產主義者當然摒棄這種對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十分有害的觀點。另一種是漠視道德的社會作用，不了解使人民羣衆認識革命事業的正義性和反動統治的非正義性，是保證革命勝利的條件之一，因而不去激勵無產階級的道義力量，不去揭露資產階級及其他剝削階級的道德的欺騙性和醜惡性。列寧早在一九〇五年所寫的「工人階級和革命」一文的計劃中，曾寫道：「起義。道德力量和物質力量。」㊂這裏明顯地表示出道德因素在社會變革中的重大意義。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時期中，列寧更强調指出共產主義道德的作用，「道德就是用來破壞舊時剝削者社會，並把全體勞動大衆團結到創立共產主義者新社會的無產階級周圍的工具。」「道德就是要幫助人類社會昇到更高的水準，使人類社會擺脫勞動剝削制。」㊃列寧不僅指出資本主義勞動剝削制的非正義性和不道德，而且尖銳地指出在小私有制下過活的農民以餘糧進行投機漁利的非正義性，號召同這種行爲作鬥爭。

列寧在過渡時期特別强調共產主義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是由於下述的情況：社會主義革命把人民的道德提升到了更高的階段，共產主義道德隨着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已變成統治的道德體系。但是，這不等於說全體人民都已經掌握了共產主義道德的原則。由於過渡時期處於社會經濟關係的急劇改變狀態，資產階級只是在被消滅的過程中，舊社會的殘跡遠未肅清，階級鬥爭空前尖銳，這一切必然要反映到人們的意識方面（包括道德方面）來，而人們的意識又常常落後於社會經濟生活，常受習慣勢力的支配，所以，這時候不僅行將被消滅的資產階級決不放鬆以自己的腐朽的思想和道德觀來腐蝕人民，竭力和共產主義道德爭奪地盤，而且人民羣衆中相當多數的人、尤其在小私有制下生活的人具有易於接受資產階級影響的基礎，不可能一下子擺脫掉那種由地主資產階級千百年來的統治所薰陶的精神、習慣和風俗，也就是不可能一下子領會共產主義道德原則。然而在社會主義革命或社會主義改造中，如果不是隨着革命實踐的進展使人民認識自己鬥爭的正義性，認識逐步消滅勞動剝削制和逐步改造小生產的行爲是合乎道德的，則勢必影響社會主義革命或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順利進行。共產主義道德陣地的擴展，不是隨着社會物質基礎的社會主義改造而自流地進行的，這裏，全部問題是要隨着社會主義陣地的擴展，不斷地向人民羣衆進行經常的始終不懈的教育工作，以便使人民羣衆的意識適合於他們的正在經歷着深刻變化的生活及這種變化的需要。

列寧之所以在過渡時期的共產主義教育的任務中特別强調共產主義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正是由於上述的情形。而列寧的這一教導，對於今天同樣處於過渡時期中的我們，當然也是完全適用的。

二

共產主義道德作爲人類社會的全新的道德，和其它新的思想和理論一樣，是反映了社會物質生活發展的要求。無產階級就其階級地位說來是自發地傾向於共產主義的，但無產階級意識中眞正科學的共產主義道德觀點的產生和形成，只有隨着共產主義意識之灌輸於無產階級隊伍中，在階級鬥爭發展的過程

㊀「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莫斯科中文版，第八〇七頁。
㊁同前引書，第八〇七頁。
㊂「列寧全集」，第九卷，俄文版，第一八五頁。
㊃「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第八〇九、八一一頁。

中，當鬥爭不是自發地而是自覺地進行的時候，才有可能。因此，共產主義道德的集中體現者和傳播者，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只有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積極參與下，在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教育下，無產階級的道德才能由自發地產生的觀點變成爲以科學共產主義思想爲依據的觀點和規範。無產階級取得革命勝利以後，在共產黨和無產階級領導下建立起來的新的國家政治、經濟制度，成爲進一步擴展共產主義道德的基礎。目前，我們正面臨着共產主義道德教育的新的時期。

那末，究竟什麼是共產主義道德？它的標準和主要要求是什麼？回答這些問題在目前有實踐意義。

共產主義道德既然從無產階級階級鬥爭中產生並服從無產階級的鬥爭利益，無產階級鬥爭的目的既然是要使人類社會擺脫勞動剝削制，創立、鞏固與完成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那末，新的共產主義道德的標準也就由此確立。這就是，評價人們對社會和對人的行爲是否合乎道德原則，完全要看這種行爲是否符合於創立、鞏固和完成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事業的鬥爭的利益。在我國目前，要看這種行爲是否符合於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及保衛祖國的利益，是否符合於鞏固社會主義陣營和保衛世界和平的利益，並在這些方面是否神聖地履行着自己的社會義務和國際義務。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或客觀必然性，這就是「義」之所在，完全按照這個客觀必然性行動，見義勇爲，這就是共產主義道德的總要求和總標準。工人階級政黨及世界革命工人運動的傑出領導人物之所以是最完美的共產主義道德的體現者，就是因爲他們的一舉一動符合於這個總要求和總標準的緣故。

共產主義道德在各個方面向人們的行爲提出自己的要求（或規範）。共產主義事業是人類歷史上空前偉大的事業。承担着這個偉大事業的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必然要一步一步地戰勝國內外的强大敵人，最後廢除階級，消滅剝削，所以是一個長期的、殘酷的、艱難的、勝利的鬥爭過程。爲了贏得這個勝利，共產主義道德必然要求人們在這個鬥爭中表現立場堅定，堅忍不拔，英勇果敢，確信勝利前途，不被困難所折倒，具有自我犧牲精神和高度的革命紀律性；忠於人民，忠於祖國，忠於勞動人民的國際團結，把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和高度的國際主義精神結合起來；對於阻礙社會進步和人類進步的惡勢力採取不調和的態度，憎恨國內外一切敵人，時刻保持革命警惕性；經得起困難環境的考驗，也經得起勝利環境的考驗。資產階級是一旦獲得政權便喪失一切革命性，我們則必須在這個問題上同資產階級劃清界限，防止由滿腔熱忱地勤勤懇懇地爲人民服務的高貴品質墮落到資產階級的卑鄙的個人主義方面去。所有這些，都是共產主義道德重要的特徵。我們說重要的特徵，是因爲若沒有這樣的政治品質，就根本談不上什麼共產主義道德。

在個人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相互關係問題上（這個問題歷來是倫理學的基本問題之一），共產主義道德的要求是根據公共利益第一的原則把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正確地結合起來，反對利己主義，提倡集體主義。在私有制的階級社會中，人們的利益是分裂的，彼此經常發生衝突，一些人的幸福建立在另一些人的痛苦之上，人們只關心自己而不顧及旁人，資本主義關係更使這種利害衝突擴大而且加深起來，眞像一個資產階級哲學家所說的「人對人如豺狼」。所以在舊社會，根本不可能有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眞正結合。不管資產階級倫理學在道德評價方面曾經使用過多少好聽的名詞，其實質一概都是資產階級利己主義和個人主義。在資產階級口中的所謂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不過是一個資本家所有的獨資商店的利益和幾個資本家共有的合股公司的利益的關係的代名詞，歸終是要使勞動人民犧牲自己服從資本家的利益。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和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則眞正造成個人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一致，消除兩者間的對抗。社會主義是公共勞動事業，因此，它首先要求個人利益服從公共利益，每個人都應當把公共利益放在第一位。社會主義關心個人利益，集體利益不能離開個人利益，但只有在保證公共利益的基礎上，才能最高地滿足個人的利益。勞動者只有實行同志般合作和兄弟般互助以發展社會主義集體事業，才能保障每個人都享有一切物質福利和文化福利。那些只顧個人不顧社會、只顧局部不顧全體、只顧眼前不顧將來、只顧權利不顧義務的觀點和行爲，是不利於集體因而也最後不利於個人的，所以必須加以反對。在個人和社會的關係問題上，共產主義道德所要求的，正是在這種原則基礎上的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一致。

列寧曾指出：把自己的能力用去爲公共事業服務，是共產主義教育的實質。每個人能力有大小，社會職務有不同，但只要肯爲公共事業服務，關心集體利益，自覺履行社會義務，當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發生矛盾（這種矛盾至少在目前是不可避免的）的時候，能使個人利益服從公共利益，便應該說是一個具有共產主義道德精神的人。我國的憲法規定：「禁止任何人利用私有財產破壞公共利益」；「愛護和保衛公共財產是每一個公民的義務」。這也是大家行動的規範。顯然，這種道德精神不是容易獲得的，它是在經濟關係的逐漸改變中，在反對資產階級利己主義和改造小私有者觀念的鬥爭中，在同損害公共財產和破壞公共秩序的行爲作鬥爭中，逐漸培養起來的。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的勝利，資本主義的被徹底戰勝，歸根到底依靠社會主義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所以採取新的社會主義的勞動態度，爲高度的勞動生產率而鬥爭，是共產主義道德的基本要求之一。地主和資本家以剝削

勞動爲生，他們把勞動看作下賤人幹的事情；小私有者看重勞動，僅僅要使勞動對個人有利。社會主義既反對前者，也要改造後者。社會主義要求人們對待勞動的態度是：把勞動看作社會主義事業的基礎；眞正把勞動看作光榮、崇高的事情（依靠剝削爲生才是可恥的）；在勞動中發揮積極性和首創性；實行先進幫助落後、落後向先進看齊的勞動競賽；自覺地遵守勞動紀律並同破壞勞動紀律和偷懶要滑的現象作鬥爭，等等。共產主義道德要求人們對於任何一種對社會有益的勞動（不論體力勞動或腦力勞動）採取上述態度，但是特別要求對於物質生產部門的勞動採取上述的態度，尊重體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者，把體力勞動看作一切勞動的基礎，徹底肅清目前還相當普遍地存在着的鄙視體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者的現象（不僅在非物質生產部門，也在物質生產部門和某些勞動者身上）。鄙視體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者是一切剝削階級共有的最荒謬的偏見，是唯心主義集中表現之一，資產階級目前正繼續以這種偏見毒害勞動人民的意識。顯然，不克服這種偏見，所謂熱愛勞動，所謂和工農羣衆結合，所謂和地主、資產階級在思想上劃清界限，一概都是空談。共產主義道德教育應把克服這種偏見看作自己極重要任務之一。

在我們的國家裏，對於勞動人民說來，自覺地遵守國家憲法及其它法律也是共產主義道德的一項要求。法律和道德同是社會上層建築方面的現象，都有階級性，但兩者有區別：法律條規反映統治階級的意志，由國家意志形式表現出來，由國家的强制權力保證其執行；道德所包含的內容則要比法律廣泛得多，它不是以國家意志形式表現出來，而是以社會輿論形式表現出來，它所依據的不是國家的强制力量，而是社會輿論的力量和人們的道德義務感。在剝削階級統治的社會裏，反映剝削階級意志和利益的法律，一般同被剝削的勞動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相違背相敵對，除了赤裸裸的被强制，勞動人民不可能把遵守剝削階級法律當作自己的道德義務。我們的社會的情況則不同，我們的憲法和法律是反映了工人階級領導下全體勞動人民的意志和利益，這樣的憲法和法律就其所要達到的目的和許多要求說來，不是同共產主義道德的要求相違背，而是完全一致的。在這種情況下，遵守國家憲法和法律，執行憲法規定的一切社會義務，不僅是全體勞動人民的法權職責，而且自然而然地成了全體勞動人民的道德職責。任何違犯國家憲法和法律及逃避憲法規定的社會義務的行爲，除了依法受到制裁外，也要受到道德上的譴責。國家憲法和法律成了向勞動人民進行共產主義道德教育的有力工具。當然，這裏須注意：法律和道德究竟不是完全同一的東西，有些行爲雖爲道德所不允許，但並不是屬於法律範圍的問題，因此，法律的强制手段只能施於違法者，對於那些行爲雖不合道德但並不涉及法律問題的人則只能加以說服教育和施以輿論影響，不能採用任何法律强制手段，混淆這一點是錯誤的、有害的。

除了上面所說的以外，共產主義道德所要求於人們的當然還包括着其他許多方面，例如，對人民、對集體事業的忠誠老實態度，階級友愛和同志互助精神，自覺地遵守紀律，堅持批評和自我批評，熱愛科學，同迷信觀念作鬥爭，反對一切流氓行爲和習氣，等等。這些都是從人們行爲服從於爲共產主義而奮鬥的利益這一原則中引伸出來的，並與之密切聯系的。

在講到道德要求或道德規範的時候，人們將會自然地發現一個問題，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共產主義道德規範，其中有些好像在提法上同剝削階級道德的規範並無區別，例如，共產主義道德所包含的誠實、勿偷盜、遵守公共秩序、完盡社會義務等等規範，舊統治者及幾乎一切剝削階級也都是承認的，並要求人們的行爲受這些規範的調節。這是不是表示這兩種道德之間有着相通的地方，或者，有些道德規範是帶有永恆性的呢？我們的回答是：不能看提法的外表，而要看提法的實質。如果撇開下述一種情況，就是：舊社會的被壓迫被剝削的勞動人們由於自己的處境而要求或設想人們之間的行爲應遵守類如誠實、勿偷盜等一定的規範，那末這一般地已不屬於從剝削階級的統治利益中所引伸出來的那種道德體系的範圍，而主要是從勞動人民自己的利益中自發地產生的樸素的道德觀點，共產主義道德的基本原則同勞動人民的這種自發產生的觀點並不是敵對的，恰巧相反，勞動人民從共產主義道德的基本原則看到了自己要求的眞正實現和要求的科學根據。如果我們撇開這種情況，而只就剝削階級道德體系的規範來說，那末，應當明白指出：共產主義道德體系中的個別規範雖然在外表上或措詞上和舊時代剝削階級道德的某些規範相同，但這絕不能認爲這些規範在實質上是相通的，是一個東西。

問題在於：任何剝削階級的道德規範不論採取何種外表，其目的一概都是爲了維護或辯護剝削者的利益及其統治秩序，這和共產主義道德規範的目的是服務於共產主義的利益即全體勞動人民的眞正利益，兩者處於完全敵對的地位，即兩類道德規範在性質上是完全敵對的。一切剝削階級道德幾乎無不有「勿偷盜」這一規範，這一規範由來已久，原因是社會上存在着私有制，人們存在着不勞而獲的自私心理。一切剝削階級提出在道德上禁止偷盜，是爲了藉此保護私有財產擁有者的利益，同時，也是爲了保護眞正偷盜者的利益。因爲一切剝削階級從奴隸主到資產階級，都是以偷盜勞動人民的剩餘產品或剩餘價值爲生的。他們的所謂「勿偷盜」的道德規範，充其量不過是以自己的公開大量的偷盜來反對別人的隱蔽少量的偷盜而已。共產主義道德也有禁止偷盜的規範，共產主義道德這一規範是從工人階級及一切勞動者的利益出發，是爲社會主義基礎服務。它的主要鋒芒針對着人們意識中的剝削階級思想的壞影響，保

護社會主義公共財產。因爲社會上既然存在着剝削制和私有制及剝削階級的思想影響，這一道德規範也就不會消亡，相反，在上述這些東西沒有最後消滅以前，共產主義道德的這一規範的作用必須大大加强，特別必須在社會上造成一種抵制和痛恨偷盜社會主義公共財產的强烈的道德氣氛。當然不能說，共產主義道德提出禁止偷盜和剝削階級道德提出禁止偷盜，兩者在本質上是一樣的。不，這是兩種在本質上完全敵對的東西。至於剝削階級在道德上提出所謂要誠實，要遵守公共秩序等等，其爲自己階級利益服務的實質更顯而易見。當然不能期望資產階級及其他剝削階級會造出眞正誠實的人來，他們提出誠實，不過是要求人民服服貼貼地聽命於剝削者的利益。在剝削階級統治下的公共秩序當然更是爲了保護少數剝削者的利益，這種秩序實際上只是一小撮人的統治秩序，而不是什麼「公共」秩序。

因此，任務是要在道德問題上明確劃清界限。道德是階級的，判別任何道德上提出的要求，不應從它們的形式着眼，而應從它們的階級實質及其所追求的目的着眼。

二

如前所述，道德問題不是孤立地提出的，它是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總鏈條中屬於思想鬥爭方面的一個環節，是我們向人民羣衆進行共產主義教育、反對資產階級思想侵蝕這一任務中的一個問題。唯其如此，所以過渡時期共產主義道德的進一步發展和鞏固，也只有在爲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而鬥爭的過程中，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和黨的政策影響下，才有可能。列寧說：「鞏固與完成共產主義事業的鬥爭是共產主義道德底基礎。」㊀這同樣是我們在對勞動人民和青年一代進行共產主義道德教育的全部工作中所應當遵守的。

過渡時期向勞動人民和青年一代進行共產主義道德教育，全部問題是要使這種教育和當前各種實際鬥爭任務緊密地結合起來，要把這種教育建築在實際獲得階級鬥爭的知識和經驗的基礎之上，避免作一般的抽象的道德說教。這不僅因爲人們的意識的發展總要依靠於實際生活的發展，社會經濟關係的變革是新的道德成長的基本條件，不消滅剝削階級，人們將無由達到道德觀念上的一致；而且因爲，如果人們不懂得我們目前處於階級鬥爭空前尖銳的時期，不懂得勞動剝削制度所給予人民的痛苦，不懂得目前國內外敵人正在用盡一切辦法破壞我們，不了解爲實現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應進行怎樣的鬥爭，甚至不理會美帝國主義繼續侵佔我們領土台灣這樣絕對不能容忍的侵略行爲，等等，在這種情況下要使人們眞正領會共產主義道德的原則和規範，反對資產階級及其它剝削階級的道德，將是不可能的。目前，一方面有不注意在各項實際鬥爭中和在貫徹黨的各項政策中向人們進行共產主義道德教育的現象，這是誤認爲人們的新的道德面貌可以不經教育而自流地發展，另一方面也有不善於將共產主義道德教育任務和當前各項鬥爭任務及貫徹黨的政策的每一步驟緊密結合的現象。這種在道德教育上的放任自流或孤立進行的現象都是不對的，應當加以糾正。

此外，還有這樣一種教育者，他們脫離開我國當前階級鬥爭的實際情況來向青年大談共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把我們現時的社會描畫成好像已經消滅了階級和剝削、人和人之間已經達到了道德觀點上一致的社會主義社會，因而要求青年們不論在任何場合、對待任何人（不問他們的階級立場和觀點如何）都採取一樣的態度，彼此互相照顧生活習慣和互相滿足要求。顯然，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是對於青年有害無益的。不問他們的主觀意圖如何，這總是有意無意地將目前實際存在的深刻的階級矛盾和人們間的道德標準的不一致掩蓋起來，因而雖然口頭上說的是社會主義，實際上是爲資產階級的超階級的人道主義幫了忙。這種說法將不是加强而是取消過渡時期共產主義道德教育的任務。

由於資產階級及其它剝削階級的道德總是用各種唯心主義（剝削階級的共同的思想體系）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來維持，而共產主義道德也只有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工人階級的思想體系）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的影響下才能逐漸發展起來，因此，取得唯物主義對唯心主義鬥爭的勝利，同樣是加强共產主義道德教育中的最根本的問題。事實證明：目前某些人所以發生道德墮落的現象，如果從他們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的根源去追究，將不難發現其中許多人都是深中唯心主義的毒害，他們認爲世界和社會並沒有任何客觀發展規律，個人在其中爲所欲爲，而又毫無方向，無任何客觀的是非善惡標準，每個人都是憑主觀願望辦事，都是碰「運氣」或靠「偶然的機會」生活，因而不是走向頹廢，逃避實際鬥爭，就是實行盲目冒險。諸如此類的極端腐朽的唯心主義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支配他們的行動走到錯誤的道路上去，走到資產階級的卑鄙的享樂主義、腐化墮落和剝削野心家的道路上去。在實際生活中，資產階級對於勞動人民的腐蝕，也常常是以宣揚這種極端腐朽的唯心主義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爲其基礎。「三反」「五反」運動及其它許多事實證明，資產階級對於唯心論和唯物論之間的鬥爭及其結局，甚至要比我們某些革命者對於這個鬥爭及其結局還要關心，他們隨時隨地不放棄自己宣傳唯心論的任務，而且常常進行得異常巧

㊀「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第八一一頁。

妙，善於適合時宜地利用各種僞裝。現在已經是警惕並徹底改變這種現象的時候了。必須在一切方面、當然也在道德教育方面貫徹這個鬥爭，徹底擊敗資產階級唯心論。只有用科學唯物主義的世界觀逐漸把人們的頭腦武裝起來，使人們獲得關於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和階級鬥爭規律的知識，確定自己在實際鬥爭中的正確的政治方向，確定自己的生活的崇高目的，並使自己的行動跟爲社會主義而鬥爭的一般任務聯系起來，只有在這樣一個可靠的基礎上，才能進一步擴展共產主義道德的陣地，逐步縮小以至最後消滅資產階級道德的陣地。

影響共產主義道德發展和鞏固的方法是多方面的，需要動員各方面的力量來進行工作。例如，切實改善學校教育質量的問題必須予以更多注意，向青年一代進行教育的人自己必須是品德健全的人，確實懂得培養青年一代成爲德才兼優的共產主義建設者是自己的光榮任務，剷除目前依然存在着的那種忽視品德教育，甚至有意無意地以資產階級觀點來影響青年品德的現象。在培養青年一代的共產主義道德方面，正像列寧所指出的，青年團担負着特殊重大的責任，「應該做到使教育、訓練和培養現代青年的全部事業，都成爲在青年中養成共產主義道德的事業」㊀。必須十分注意改善人民的文化生活，文化教育部門和文學藝術部門應設法逐步地改變目前人民的業餘文化生活貧乏的現象，眞正有助於培養人民的高尙品質和共產主義道德的書籍和文藝作品極少的現象，一切文化活動和文學藝術作品，都是把無產階級世界觀，把共產主義的道德習慣等培植到人民意識中去的重要工具，而對於那些至今還大量存在的、足以使人們道德敗壞的下流娛樂場所，以及包含着嚴重毒素的十分淫穢荒誕的黃色書籍等，則應堅決地有計劃有步驟地加以排除。經常運用各方面先進的優秀的榜樣和經驗來影響人們的觀點和行動，用活的事例向人民羣衆展示新的道德的標準，同時對於那些違犯國家法律並應依法制裁的行爲實行公開審理的原則，藉以引起人民羣衆對於犯罪者及其行爲的憎恨，動員起來同犯罪行爲作鬥爭，在社會上樹立起一種抵制犯罪的道德氣氛。各種報紙和刊物應當積極地向人民羣衆宣傳共產主義道德的原則和範例，揭露資產階級道德的醜惡面貌和社會上各種道德敗類，積極動員輿論以支持前者和抵制後者。

向人民羣衆進行共產主義道德教育，抵制和肅清資產階級道德及其它剝削階級道德對於人民羣衆的影響，是一項長期的複雜的任務，絕不是幾次突擊式的運動所能全部解決問題的（在目前，爲了引起人們的注意，集中地進行一次教育是完全必要的），重要的是要使這種教育經常化，使之不僅同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每一步驟緊密地結合起來，而且同黨和國家對人民羣衆所進行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的每一步驟緊密地結合起來。人們的道德意識所賴以支持的既然不是任何强力，而是社會輿論和人們內心的道德義務感，因此，說服教育和動員輿論是樹立共產主義道德的優勢的最正確有效的方法，粗暴强制或亂扣帽子的做法是有害無益的。道德包含着廣泛的內容，人們的各種行爲都可以用一定的道德標準來衡量，但在實際對待時，必須注意區別不同行爲的不同性質（例如犯法與不犯法，眞正的職業流氓分子和只染有流氓習氣等），不能採取簡單的籠統對待的態度。而且道德既然爲階級鬥爭服務，我們在評價人們的行爲時就必須首先依據正確的政治觀點，即首先估計它們是對工人階級鬥爭有害抑有利，從政治上加以分析判別，而不是脫離政治單從瑣碎的細節上去要求，這種要求有徒然使人成爲謹小愼微的人物的危險。我們認爲，在目前注意到上述各點，對於正確地進行共產主義道德教育是必要的。

㊀「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第八〇七頁。

胡風的「眞實的現實主義」批判

霍松林

胡風一向是用他所謂的「眞實的現實主義」，企圖偷換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不過在去年向中共中央所提出的「對文藝問題的意見」中，表現得特別露骨。那麼，什麼是他所謂的「眞實的現實主義」？他又怎樣和爲什麼用這種「眞實的現實主義」偷換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就有加以分析研究的必要，因爲弄清這個問題，才可以了解胡風文藝思想的實質及其反動性。

一

胡風所宣揚的「眞實的現實主義」，是一種不受世界觀指導的「創作方法」。他早就說過：「眞實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能够補足作家底生活經驗上的不足和世界觀上的缺陷。」㊀現在更變本加厲，公然反對工人階級的立場和共產主義的世界觀，公然主張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應該和共產主義的世界觀分家。他爲了證實這個論點，他和他的追隨者一向以恩格斯論巴爾札克和列寧論托爾斯泰的經典名言作爲自己的理論根據。在「對文藝問題的意見」中，胡風又拿出了這個法寶。

但這個法寶是嚇不住人的，因爲胡風歪曲了列寧和恩格斯的經典名言的精神，也歪曲了托爾斯泰和巴爾札克的現實主義的實質：第一、托爾斯泰和巴爾札克之所以能成爲傑出的現實主義者，首先由於他們有非常豐富的生活經驗，而不是如胡風所說的「生活經驗不足」，這是列寧和恩格斯都强調指出了的；第二、他們的世界觀當然有缺陷，但不能簡單地說是「反動的」。

傑出的古典作家的思想常常是矛盾的（也就是說，他們的世界觀是分裂的）。這種矛盾正是階級矛盾的反映；他們思想中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正是人民生活和鬥爭的反映；也正因爲他們思想中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人民的生活和鬥爭的反映，他們才能成爲傑出的具有人民性的現實主義者。托爾斯泰和巴爾札克就都是這樣的。列寧和恩格斯的經典名言正說明了這一眞理。

胡風認爲巴爾札克和托爾斯泰的世界觀是「反動的」，但仍舊能寫出生活的眞實，這和恩格斯、列寧的說法毫無共同之處。巴爾札克和托爾斯泰的世界觀中存在着作爲階級矛盾之反映的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和人民羣衆相聯系而和統治階級相對立的。這就是說，他們的世界觀有進步的一面。

胡風認爲托爾斯泰是一個具有「反動的」世界觀的「地主」，更是歪曲事實、歪曲列寧的分析的胡說。一個具有「反動的」世界觀的徹頭徹尾的「地主」，是不可能成爲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準備時期千百萬俄國農民的那種思想和情緒的表達者的。根據列寧的分析，托爾斯泰終於和地主貴族的「一切傳統觀點決裂了」，並且轉而「站在家長制的天眞的農民的觀點上」，所以才能「把農民的心理搬到了自己的批判、自己的學說中」，才能成爲農民的代言人。

胡風對托爾斯泰的評價，是和列寧所指斥的「自由派」對托爾斯泰的評價完全一致的。「自由派」爲了「躲避托爾斯泰所提出的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具體問題」，說托爾斯泰是「偉大的良心」、是「眞和善的觀念」。這和胡風所說的「仁愛的胸懷」、「眞誠的心願」、「藝術的良心」等等多麼相像！

當然，巴爾札克和托爾斯泰的世界觀是有缺陷的，而這種缺陷，就不可避免地限制了他們的現實主義的力量和規模。例如托爾斯泰的「不抵抗惡」和「迷信基督」的錯誤觀點，有害地表現在他的作品中。巴爾札克的在君主政體保護下調和階級對抗的可能性的幻想，也有害地從「人間喜劇」中顯露了出來。這就是說，托爾斯泰和巴爾札克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並沒有「補足」他們的「世界觀上的缺陷」，而是相反，他們的「世界觀上的缺陷」正限制了他們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

一個作家，不管他意識或不意識，永遠是受一定的世界觀指導的，他的創作方法是在一定的世界觀指導下理解生活、反映生活這一基礎之上確立起來的，因而永遠帶有被這個世界觀所打下的烙印。胡風企圖用被他歪曲了的恩格斯和列寧的經典名言作爲理論根據，達到他的惡毒的目的：使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脫離共產主義世界觀的指導，變成他所謂的「眞實的現實主義」，但這是徒費唇舌的。

胡風爲了達到他的惡毒的目的，還拿出了「更有力的」法寶——拉普派。

㊀ 胡風：「密雲期風習小紀」，第一〇〇頁。

他在提出「拉普派底指導『理論』是：要求作家首先具有工人階級即共產主義的世界觀，要求作家用『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去創作……」之後，即把拉普派的帽子扣到林默涵和何其芳兩同志的頭上（實際上是通過林、何兩同志扣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思想和毛澤東文藝政策的頭上）。

我們知道，拉普派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藝思想和作風表現在許多方面，比如：第一、用虛無主義的態度對待文學遺產；第二、在文學領域中樹立小集團，闖無原則糾紛，壓制批評與自我批評；第三、用「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代替現實主義。……第一第二兩點，是和胡風的思想作風完全相同的，胡風如果要用它們作武器，就首先擊中了自己的要害，所以他避而不提，却提出了第三點。但這「無的放矢」又有什麼作用呢？

當然，拉普派教條主義地把辯證唯物論作爲創作方法，用以代替現實主義，這是十分錯誤的。毛主席在糾正「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就是重複辯證唯物論的創作方法的錯誤，就要妨害創作情緒」的糊塗觀念時，就對「辯證唯物論的創作方法」進行了有力的批判。他說：「馬克思主義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藝創作中的現實主義，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學中的原子論、電子論一樣。空洞乾燥的教條公式是要破壞創作情緒的，但是它不但破壞創作情緒，而且首先破壞了馬克思主義。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反馬克思主義的。」㊀在另一個地方，又明確地指出：「政治並不等於藝術，一般的宇宙觀也並不等於藝術創作和藝術批評的方法」㊁。可見毛主席是充分地估計了文學藝術的特性的。在林默涵、何其芳兩同志的文章中，也沒有「要求作家用『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去創作」的字句和意圖，那麼，胡風亂扣拉普派的帽子，究竟是什麼用意呢？用意是非常明顯的，他企圖用拉普派的帽子阻止我們的作家去建立工人階級的立場和共產主義的世界觀，好讓他的「主觀戰鬥精神」「擴張」開來，「擁抱」世界。但這是徒勞無功的。因爲我們反對「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並不等於反對建立工人階級的立場和共產主義的世界觀。胡風以爲强調建立共產主義的世界觀，强調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會破壞他的「昂揚」的「主觀精神」和「飽滿」的「創作情緒」，就會「堵死藝術實踐」。對他說來，這種顧忌是很有必要的。但對於廣大的願意接受思想改造、願意實踐毛主席的爲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方向的作家來說，就沒有這種顧忌。因爲他們並不想「保衛」和「發展」非無產階級的「主觀精神」和「創作情緒」，而是想「破壞」它們。正如毛主席在說明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不僅破壞創作情緒而且破壞馬克思主義之後所指出：「那末，馬克思主義就不破壞創作情緒了嗎？要破壞的，它決定地要破壞那些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的、爲藝術而藝術的、貴族式的、頹廢的、悲觀的以及其他種種非人民大衆非無產階級的創作情緒。對於無產階級文藝家，這些情緒應不應該破壞呢？我以爲是應該的，應該澈底地破壞它們，而在破壞的同時，就可以建設起新東西來。」㊂

在我們看來，林默涵同志所說的「對於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者，根本問題也不是有沒有抽象的『主觀戰鬥精神』，而是首先要具有工人階級的立場和共產主義的世界觀」，是完全正確的，和拉普派的「理論」毫無共同之處。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是立脚於工人階級的立場和共產主義的世界觀之上的，不贊成工人階級及其世界觀的人就不會贊成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胡風就是反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他所主張的是「眞實的現實主義」；我們所主張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他看來是「虛僞的」現實主義，因爲它的基礎是工人階級的立場和共產主義的世界觀。「眞實的現實主義」是不需要這些的，它所需要的是「主觀精神」，是「眞誠的心願」……。蘇聯「哲學問題」雜誌在以「作家的世界觀和創作」爲題的專論中指出：

> 竭力證明作家的創作同他的世界觀無關，作家的創作服從於靈感和主觀眞誠的特殊「規律」，是現代資產階級唯心主義陣營中許多美學家的特色。㊃

胡風就是披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外衣，販賣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美學思想；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外衣，無論如何也遮掩不住他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美學家」的特色。

二

胡風所宣揚的「眞實的現實主義」是一種超時代、超階級的「最廣泛的概念」。他說：

> 現實主義底哲學根據是反映論，即唯物主義認識論（也是方法論）在藝術認識（也是藝術方法）上的特殊方式。猶如眞正反映了客觀世界的纔是唯物論，通過藝術特徵眞正反映了歷史眞實的纔叫做現實主義。……在科學的意義上說，猶如沒有「無論怎樣的」或「各種不同的」反映論一樣，不能有「無論怎樣的」或「各種不同的」現實主義的。

接着，便非常得意地嘲笑林默涵、何其芳兩同志道：

㊀「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二月第一版，第八九六頁。
㊁同前引書，第八九一頁。
㊂同前引書，第八九六頁。
㊃見「學習譯叢」，一九五五年第二號。

現在林默涵同志更進一步，弄到把作爲認識論（方法論）的現實主義當做了意識形態本身，也給劃了階級成分了。何其芳同志也是很有自信地這樣做了的。

（「胡風對文藝問題的意見」第一一—二頁）

誰都知道，反映論是專指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而言，所以當然沒有「各種不同的」反映論，也沒有「各種不同的」以反映論爲哲學基礎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但歷史告訴我們，在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之外，還有「各種不同的」認識論；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之外，還有「各種不同的」現實主義。

認識論是有階級性、黨派性的，藝術地認識世界的現實主義也是一樣。列寧曾說：「現代哲學是有黨派性的，正如兩千年前的哲學一樣是有黨派性的。縱然被假充博學的新名詞或極其愚蠢的非黨派性所掩飾着，互相鬥爭着的黨派實質上是唯物論與唯心論。」㊀文學藝術也是一樣，縱然被假充博學的新名詞或極其愚蠢的非黨派性所掩飾着，互相鬥爭着的黨派實質上是現實主義和反現實主義。

文學的歷史是現實主義和反現實主義鬥爭的歷史。現實主義的藝術方法，就是在這種不斷的鬥爭中確立起來、發展起來的。

現實主義由於它是和革命的、上昇的階級及人民羣衆血肉相連的，所以它具有根本的優越性和長久的生命，它並不是產生於和終止於某一時代、某一階級的東西，而是有其歷史的持續性和發展性的。但另一方面，它在根本上決定於它的時代的社會生活和特定的世界觀以及作家的特定的階級立場，因而它也是有其顯明的時代性特別是階級性的。在現實主義發生、發展的歷史上，簡單的分析，就有古代的現實主義、封建時代的現實主義、資產階級革命期的現實主義，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等等。例如巴爾札克的現實主義，就並不是如胡風所說的超時代、超階級的東西。法捷耶夫在「論文學批評的任務」一文中，就把巴爾札克、狄更斯、馬克·吐溫等人的現實主義，稱爲「資產階級的現實主義」㊁。

胡風企圖用他的「眞實的現實主義」偷換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企圖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弄成一種超時代、超階級的「最廣泛的概念」，一句話，企圖取消作爲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美學基礎的黨性原則，進而抹煞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世界觀——反映論的階級性、黨性。但這是徒然的。在「實踐論」中，毛主席明確地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辯證唯物論有兩個最顯著的特點：一個是它的階級性，公然申明辯證唯物論是爲無產階級服務的……」㊂這和列寧所說的馬克思主義所以偉大，「就是因爲它把最高限度的嚴格的科學性（它是社會科學的頂峰）和革命性結合起來」㊃的名言，同樣表現了不可動搖的眞理。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反映論，就是一種「把最高限度的嚴格的科學性和革命性結合起來」的爲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服務的。毛主席教導說：「馬克思說：……『從來的哲學家只是各式各樣地說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於改造世界。』這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第一次正確地解決意識和存在關係問題的科學的規定，而爲後來列寧所深刻地發揮了的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之基本的觀點。我們討論中國文化問題，不能忘記這個基本觀點。」㊄我們討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問題，也不能忘記這個基本觀點。以反映論爲哲學基礎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基本特徵在於它以反映論爲行動（生活實踐和創作實踐）的指南，正確地反映世界並從而改造世界。它是爲無產階級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革命實踐服務的。如果沒有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立場，要成爲一個正確地反映世界並從而改造世界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者，將是不可想像的。

爲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服務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有階級性、黨性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黨性原則，正是共產主義世界觀的最高表現，也正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性的集中表現。作家只有站在黨性的立場，只有全心全意地參加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只有用共產主義的世界觀武裝自己，才能掌握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從現實的革命發展中眞實地、歷史地和具體地去描寫現實，並把這樣地描寫與用社會主義精神教育勞動人民的任務有機地結合起來。

胡風之所以要抽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階級性、黨性，把它弄成一種甚至站在反動的階級立場的作家都可以掌握的「最廣泛的概念」，其目的無非是：反對黨的文藝領導，反對思想改造，反對文藝爲工農兵服務，而爭取所謂「藝術自由」和「藝術獨立」。爲了達到這個目的，胡風還不厭重複地引用了列寧在「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一文中爲預防對黨性原則作庸俗的、機械的理解而發的重要指示：「無可爭論，文學事業最不能機械地平均，標準化，少數服從多數。無可爭論，在這個事業上絕對必須保證個人創造性、個人愛好的廣大的空間，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內容的廣大的空間。」但胡風却有意地隱瞞了這一指示的不可分割的後一部分。列寧接着說：「這一切都是無可爭論的，可是這一切只證明着：無產階級黨的事業的文學部分不能和無產階級黨的事業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來。這一切並沒有推翻那個對於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民主派是陌生的和奇怪的原理：文學事業應當一定要成爲與其他部分不可分割地聯繫着

㊀「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三五頁。
㊁見「蘇聯文學批評的任務」，三聯書店一九五一年版，第一一—二頁。
㊂「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一年十月第一版，第二八三頁。
㊃見「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八九頁。
㊄「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三月第一版，第六三五頁。

的社會民主黨工作的一部分。」㊀我們是全面地接受這一指示的。胡風企圖借用這一指示的前一部分「推翻」後一部分的那個「原理」，但我們却絕對不讓他「推翻」，雖然那個「原理」對於他是「陌生的和奇怪的」。

三

胡風所宣揚的「眞實的現實主義」是一種從資本主義國家「移植」過來的而且不需要革新的東西。因爲他企圖用這種東西偷換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所以他一方面否定祖國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一方面抹煞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舊現實主義之間的區別。

我們已經說過，現實主義是有其歷史的持續性和發展性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就是現實主義發展中的最新的和最高的階段。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之所以是現實主義發展中的最新的和最高的階段，是由於：第一、它繼承了舊現實主義的優良傳統；第二、它又是舊現實主義的改造和革新。

無產階級是一切優秀的文學藝術遺產的繼承者。日丹諾夫曾說：「無產階級，也正像在物質與精神文化的其它部門裏一樣，是世界文學寶藏中最優秀的東西的唯一的繼承者。」㊁毛主席更明確地教導說：「我們必須繼承一切優秀的文學藝術遺產，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東西，作爲我們從此時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原料創造作品時候的借鑒。有這個借鑒和沒有這個借鑒是不同的，這裏有文野之分，粗細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們決不可拒絕繼承和借鑒古人和外國人，那怕是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東西。」㊂這都說明了繼承文學遺產的重要性。蘇聯的文藝學家都强調指出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在繼承文學遺產的基礎上形成、發展起來的。我國「五四」以來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也是一樣。它是適應着中國革命的性質和任務，在批判地繼承中國古典現實主義文學傳統和創造性地吸收外國文學經驗的基礎之上形成、發展起來的。

所謂繼承一切優秀的文學遺產，當然兼指自己的和外國的遺產而言，但自己民族的文學遺產是更根本的。繼承外國的遺產，其目的是作爲自己的養料，而不是代替自己的傳統。毛主席着重指出：「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但是一切外國的東西，如同我們對於食物一樣，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爲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後排洩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對我們的身體有益，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㊃胡風正就是主張「全盤西化」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的「論民族形式問題」中，胡風創立了「新的文藝要求和先它存在的形式截然異質的突起的『飛躍』，……它要求從社會基礎相類似的其他民族移入形式（以及方法）」㊄的「理論」，並拿起這把「理論」的「刀子」，割斷「五四」新文學對於中國古典現實主義文學的繼承關係，斷言「五四」新文學的形式和方法（指創作方法）都是從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移來的，比如「魯迅底小說形式」，就是「從歐洲『移植』過來的」，魯迅是「國際文學的產兒」。

毛主席指示我們：「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㊅胡風則對抗這個指示，爲了建立他的「移植論」，爲了阻止「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他全盤地否定了中國「燦爛的古代文化」遺產。他認爲中國的歷史「客觀上既沒有民主主義的現實存在，主觀上又沒有民主主義的戰鬥觀點」，因而中國的古典作家，「就祇有在封建意識裏面橫衝直撞，恰像追求光明的蒼蠅亂碰在玻璃窗子裏面；不但不能使那些『反抗的動因』得到合理的『歸宿』，而且也不能使那些反抗的實際內容在歷史眞理底照明下面呈露出眞像，因而封建文藝再也不能向前發展了。」㊆而中國的勞動人民和人民藝術家所創造的光輝燦爛的戲曲遺產，在他看來，「連表現喜怒哀樂的動作、聲調、甚至詞意」，都是「可以喚起特定封建意識的情緒的、象形文字式的符號」。中國的民間文學，他認爲不過是封建文學的同義語，在民間文學中，「甚至略略帶有民主主義觀點底要素底反映也很難被我們發現」。在描寫並歌頌農民革命的「水滸」中，他也聽不見「發自貳心的叛逆之音」。

在「對文藝問題的意見」中，胡風爲了「捍衛」他在「論民族形式問題」中建立的一系列誹謗祖國文化、文學遺產的「理論」，竟大胆地曲解了列寧的「在每個民族裏都有兩種民族文化」的學說，申言列寧所指的是「近代民族」，所以在中國歷史上只有一種文化，那就是封建文化。在中國古典文學中，自然也只有「封建性的糟粕」，沒有「民主性的精華」。誰要說接受遺

㊀ 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文藝」，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七一—二頁。

㊁ 見「論文學、藝術與哲學諸問題」，時代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第二一頁。

㊂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二月第一版，第八八二頁。

㊃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三月第一版，第六七八頁。

㊄ 「論民族形式問題」，海燕書店版，第三〇頁。

㊅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三月第一版，第六七九頁。

㊆ 「論民族形式問題」，海燕書店版，第四九頁。

產，誰就是「盲目的讚揚封建文化」，誰就要戴「國粹主義者」、「民族復古主義者」的大帽子。

胡風的「移植論」和全盤否定祖國文化、文學遺產的虛無主義態度，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愛國主義的，是帶有濃厚的世界主義色彩的。

我國文學，從「詩經」開始，有一個非常綿長、非常優秀的在和反現實主義作鬥爭中發展起來的現實主義傳統。「五四」以來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固然接受了外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影響，但在根本上還是中國古典現實主義的繼承和發展。正如毛主席所指出：「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㊀胡風斷言「五四」新文學的形式和方法都移自歐洲，與自己的傳統無關，這種割斷歷史的論斷是歪曲事實、違反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的。「五四」文學革命運動的發生有它的社會條件，這是不用說的。只就文學條件說，中國文學如果沒有三千年的發展歷史，在這個發展歷史中如果沒有現實主義文學與反現實主義文學的矛盾，則「五四」文學革命運動也就不可能發生。事實也正是如此，在當時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封建主義的舊思想和舊文學的鬥爭中，以魯迅先生爲代表，把中國古典現實主義文學特別是宋代以後的以平民文學爲中心的古典現實主義文學提到和封建主義的正統文學尖銳對立的地位，並把它作爲革命的武器而繼承過來，使它的內容中的民主性的精華、方法上的現實主義、形式上的白話，都獲得了新的、革命的意義。

當然，外國進步的現實主義文學對「五四」文學革命的影響也是不應該忽視的，但在根本上決定這種影響的還是中國的社會條件和文學條件。「五四」新文學的奠基者和代表者魯迅先生，就是一方面根據中國的社會條件批判地繼承了中國古典現實主義文學傳統，一方面根據中國的社會條件和文學條件創造性地吸收了外國進步文學（特別是俄國文學和蘇聯文學）的經驗，而創造了他的輝煌的現實主義文學的。

事實證明，魯迅先生所代表的「五四」新文學的主流，是和胡風的論斷格格不入的。我們說，胡風歪曲事實，就是指歪曲「五四」新文學的主流而言。但胡風的論斷却符合另一事實，即符合胡適所代表的「五四」新文學的逆流。居於「五四」新文學運動右翼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後來墮落爲帝國主義的走狗的胡適，對於祖國文學遺產，他要繼承的只是包括皇帝的「詔令」在內的「白話」，而中國古典文學的人民性的內容和現實主義的方法，都被他歪曲了、抹煞了；對於外國文學，他大量販賣的是資產階級沒落期的各種反現實主義文學流派的作品和方法，而外國的進步文學，特別是俄羅斯文學和蘇聯文學，他是視若寇仇的，到了後來，竟墮落爲主張「全盤西化」的世界主義分子。胡風認爲「五四」文學革命是「以市民（指資產階級）爲盟主的」，具體地說，是以胡適爲盟主的。了解這一點，則他在「理論」和作風上跟胡適竟那麼神似，就不必驚異了。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繼承民族文學的傳統，是包括民族形式的傳統在內的。社會主義的內容，民族的形式，這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主要特徵之一。民族形式是一個歷史範疇，它是民族語言、民族的歷史傳統和文學傳統、以及民族特性（即斯大林所說的「表現於文化共同性中的心理狀態」）等因素構成的。它在發展中不斷地接受國際影響，這是無可爭論的；但決不能丟掉自己的傳統，從外國移入。如顧爾希坦所說：「不管我們循着什麼方向去尋求各種新的文學的形式，來體現新的社會主義的內容，——形式部門中的民族文學的傳統應該是它們一個出發點。文化遺產的問題，不僅僅存在於內容的部門中，也存在於形式的部門中。文學（和藝術）的存在的具體的歷史形式，就是民族的形式。」㊁

許多年來，我們的文藝工作者接受毛主席的指示，在爲更有力地表現社會主義內容而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我們的民族形式這一點上已做出了很大的成績，創造了許多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優秀作品，這就引起了胡風的憤怒。早在「論民族形式問題」中，他就發出了不准利用民族形式的叫囂：誰要利用它，就是「跳水」、「上吊」或「用手槍打死自己」。在「對文藝問題的意見」中，更把「推陳出新」地繼承和發展民族形式的號召說成「理論」的「刀子」。而且歪曲事實地說：「解放幾年以來，他們這種民族復古主義的理論，在思想上使舊文藝獲得了絕對的優勢，用五七言或格律壓死了詩，用『古典劇』打退了話劇，被形式主義和公式主義弄乾枯了的新文藝一步一步地敗退……」

事實是最雄辯的，胡風的惡意誹謗，誰都看得出來，因而無須辯解；要弄清楚的倒是他之所以要進行誹謗的原因。這個原因就是：他的「移植論」失掉了市場，他的從歐洲「移」來的所謂「眞實的現實主義」找不到出路，他快要被「悶死」、「壓死」了，因而不得不作垂死的掙扎。

胡風爲了捍衛他從歐洲連根帶葉地「移植」過來的「眞實的現實主義」，並用它偷換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就不得不抹煞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特點。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特點是抹煞不了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對於過去的現實主義有其繼承性，但也有其顯著的革新性。我們通常所說的「批判地繼承」或「創造性地繼承」，就意味着革新，而不意味着「硬搬」。毛主席說：「……繼承

㊀「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三月第一版，第六七九頁。

㊁「論蘇聯文學中的民族形式問題」，新文藝出版社版，第八頁。

和借鑒決不可以變成替代自己的創造，這是決不能替代的。文學藝術中對於古人和外國人的毫無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沒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學教條主義和藝術教條主義。」㊀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決不是舊現實主義的「毫無批判的硬搬和模仿」。無產階級根據新的現實，根據革命實踐的任務，根據自己的立場，觀點，把舊現實主義加以改造和革新，吸收了它的優點，揚棄了它的缺點，並給它以科學的革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給它以爲無產階級和人民大衆服務的立場，給它以共產主義的黨性原則。這樣，就把舊現實主義變成了新現實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之所以是「新的原則」，主要在於它是立脚於新的現實、立脚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和共產主義的黨性原則之上的。

胡風認爲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所要求的是『寫眞實』」，在「寫眞實」這一點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和舊現實主義沒有區別的。但事實上，在「寫眞實」這一點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固然繼承了舊現實主義的傳統，但仍和舊現實主義有顯著的區別。

嚴格地說，舊現實主義者，總是在一定程度上片面地、平面地（非歷史地）描寫現實的，這由於他們不可能對社會歷史的發展作全面的、歷史的了解。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者則與此相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世界觀，是人類認識發展史的頂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者站在這個頂峰之上，高瞻遠矚，不僅可以洞察現在，而且可以洞察過去與未來。

能否從現實的發展中全面地、歷史地描寫現實，這個由有無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世界觀所決定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與舊現實主義的區別，還決定了另一區別。最傑出的舊現實主義者，雖然也描寫過現實生活中還不普遍、還不常見的新的性格和現象，但由於他們究竟缺乏洞察未來的能力，因而描寫新的性格和現象，並沒有成爲他們的藝術方法的主導的和一貫的特點；他們描寫的主要對象還是佔統治地位的、過了時的東西。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則與此不同。因爲：「在辯證法看來，最重要的不是現時似乎堅固，但已經開始衰亡的東西，而是正在產生，正在發展的東西，那怕它現時似乎還不堅固，因爲在辯證法看來，只有正在產生，正在發展的東西，才是不可戰勝的。」㊁描寫現實生活中還不普遍、還不常見，但却有着發展和勝利前途的新的、正面的性格和現象，這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主導的最本質的特徵。而胡風和他的追隨者，正是千方百計地抹煞這個特徵的。

從發展的趨勢中有意識地突出地刻劃新的性格和現象的這種最本質的特徵，也就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所特有的革命的浪漫主義的特徵。這個特徵之所以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所特有的，一方面決定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所特有的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能夠幫助作家洞察客觀事物發展的前途。日丹諾夫說：「對於我們這種兩脚站在堅實的唯物主義基礎上的文學，是不能和浪漫主義全然無涉的，但這是新型的浪漫主義，是革命的浪漫主義。」㊂這正說明革命的浪漫主義的特徵，是被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所決定的。另一方面，也決定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所站立的前所未有的新的現實。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所特有的這些優越的條件，也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家所特有的「幸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家不僅本身握有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這種最强大的認識並改造現實的武器，而且他所描寫的新人物，也正是用這種武器武裝起來的正確地認識現實並從而能動地、自覺地改造現實的眞正英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建設者。舊現實主義者却沒有這種「幸運」。比如西歐資產階級的現實主義者，其中的大多數幾乎不企圖表現新的、正派的主人公；而少數最傑出的具有進步的浪漫主義精神的作者，如巴爾札克、狄更斯、馬克·吐溫等等，雖然是寫了新的、正派的主人公的，但如法捷耶夫所指出：他們底「前進的代表人物，正面理想的代表人物，又是那些在實際上、在現實中不能實現這些原則和理想的人們。早已被我們的文學理論所證明了的，就是資產階級的現實主義在其正面的綱領中不能提出在當時是歷史底現實的動力的、歷史底明天的眞正主人公」㊃。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區別於舊現實主義的另一個顯著特徵，是它所特有的共產主義黨性。列寧所規定的黨性原則，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靈魂。

胡風企圖用他所說的「人民性」或「眞實性」偷換共產主義的黨性，從而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舊現實主義之間放上一個等號，但這也是徒然的。如所周知，反動的資產階級（封建地主階級也是一樣）的階級性、黨性排斥人民性，無產階級的階級性、黨性則包括人民性。這因爲只有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才能表達出全體人民的利益，才能以最大的毅力、最高的熱忱領導全體人民，爲全體人民的解放事業奮鬥到底。所以列寧所規定的黨性原則，包括了人民性原則。

四

胡風所宣揚的「眞實的現實主義」是一種不需要生活實踐就可以「首先」掌握的「來路不明的先驗的概念」。

㊀「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二月第一版，第八八二頁。
㊁「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莫斯科中文版，第一三五頁。
㊂見「論文學、藝術和哲學諸問題」，時代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第二〇頁。
㊃見「蘇聯文學批評的任務」，三聯書店一九五一年版，第一七—八頁。

胡風一向是輕視甚至取消生活實踐的，但現在却非常强調實踐。他揚言如果向作家「要」工人階級的立場和共產主義的世界觀，那就會「堵死實踐的道路」；相反，如果不要工人階級的立場和共產主義的世界觀，那麼，作家就可以通過「寫眞實」，通過「文藝實踐達到馬克思主義」。

原來他强調實踐，也是反對工人階級立場和共產主義世界觀的一種手段。

胡風是歌頌「自發性」的。拒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而强調盲目的實踐，也是他的「自發論」的一種表現形式。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非常重視實踐的，但不重視盲目的實踐，而重視被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所指導的實踐。如列寧所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㊀馬克思指出「理論是能够滲入羣衆的」，「理論一經進入羣衆之中，就變成了物質力量」㊁。被馬克思列寧主義滲透、組織和動員起來的中國人民，不是自發的、而是自覺的投身於變革自然和變革社會的實踐之中的。對於作家，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參加社會實踐，絕不能偏廢。如毛主席所指示，非無產階級的作家只有「在深入工農兵羣衆、深入實際鬥爭的過程中，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學習社會的過程中」，才能把立脚點逐漸移到無產階級方面來。只依靠胡風所强調的自發的、盲目的實踐，是很難「達到馬克思主義」的，胡風本人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同時，胡風所强調的不僅是自發的、盲目的實踐，而且僅僅是「文藝實踐」或「創作實踐」。他說：

> 文藝上的問題要以文藝實踐爲中心環節，爲出發點和着落點。（「胡風對文藝問題的意見」第三〇頁）

就這幾句話看，他是取消了「文藝實踐」之外的任何實踐的。毛主席不是也指示作家「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羣衆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羣衆，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鬥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後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嗎？而胡風却有意地對抗毛主席的這個指示，不以生活實踐爲「出發點」而以文藝實踐爲「出發點」，主張一開始就進入創作過程，誘騙作家從事沒有對象的勞動，去「做魯迅在他的遺囑裏所諄諄囑咐他的兒子萬不可做的那種空頭文學家，或空頭藝術家」㊂。

胡風會說：文藝創作需要生活，我所說的文藝實踐是包括生活實踐在內的。不錯，胡風也說過：

> 現實主義問題，文藝問題，那中心環節是一個實踐問題。
>
> 但這所說的實踐，只能是生活實踐和創作實踐的統一過程的實踐。離開了創作實踐（創作態度），「豐富的生活」頂多只能算一句空話。（「胡風對文藝問題的意見」第四〇頁）

在這裏，他是提到了生活實踐的。但這個「生活實踐」只不過是「創作實踐」的附屬物。他在這裏所說的「生活實踐和創作實踐的統一」，其具體內容就是他在另一個地方所說的用自己的「精神力量」把「道聽途說」的材料「化成溶液」，「再用那來塑成完全新的另外的東西」。

把胡風所說的「生活實踐」完全歸結爲「道聽途說」，自然是不公正的；但胡風所畫的「生活實踐」圈子實在小得很。「人民在哪裏？在你底周圍。……起點在哪裏？在你底脚下。」「哪裏有人民，哪裏就有歷史。哪裏有生活，哪裏就有鬥爭。有生活有鬥爭的地方，就應該也能够有詩。」「在前進的人民裏面前進，並不一定是走在前進的人民中間了以後才有詩。」這就是胡風對於「生活實踐」的「理論」。爲了確立這種「理論」，他還提出「文藝作品底價值，……並不決定於題材」的主張。斷言只要有强烈的「主觀戰鬥精神」，以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私生活爲題材，或以「道聽途說」的材料爲題材，也一樣可以寫出有「價值」的文藝作品。林默涵、何其芳兩同志根據他的「理論」和「主張」，作出「安於原來狹小的生活圈子」的結論，他很不服氣，斥責人家不聯系他說那話時的地點和條件。可是直到現在，他還是强調「日常生活」，輕視工農兵底生活，說什麼「只有工農兵底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算生活……這就把生活肢解了」。

把生活實踐局限在「日常生活」的範圍，並從屬於創作實踐，而且是拒絕共產主義世界觀指導的盲目的實踐，要通過這樣的實踐「達到馬克思主義」，達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很難想像的。

胡風指給作家的「眞實的」「現實主義的路」似乎是非常平坦的。它的「出發點」是「文藝實踐」，「中心環節」是「文藝實踐」，「着落點」還是「文藝實踐」（不是爲政治服務）。不需要深入生活，不需要思想改造，只要坐在書齋中去寫作，就可以掌握「眞實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只要掌握了「眞實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就「能够補足生活經驗上的不足和世界觀上的缺陷」。

㊀ 見「列寧文選」，兩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第一九六頁。
㊁ 見「馬克思、恩格斯論文學與藝術」，平明出版社版，第二七頁。
㊂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二月第一版，第八八二—三頁。

根據胡風的邏輯：對於今天的作家，根本問題不是有沒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和共產主義的世界觀，而是「首先」要掌握「眞實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

胡風的「眞實的現實主義」是一種「來路不明的先驗的概念」，胡風指給作家的「眞實的」「現實主義的路」是一條歧路。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路是毛主席所指的路——參加革命實踐，加强思想改造。這條路走起來雖然沒有胡風的路那麼舒坦，但却是一條正路，只要願意走，就一定走得通。

五

胡風所宣揚的「眞實的現實主義」，實質上既不是巴爾札克等人的現實主義，更不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而是西歐資產階級沒落期的反現實主義。

第一、西歐資產階級沒落期的反現實主義的各種流派的第一個特徵是：諱言文學的階級性、黨性，諱言世界觀對創作方法的影響，諱言文學爲政治服務；主張「藝術自由」，主張「爲藝術而藝術」。胡風的「眞實的現實主義」就正是這樣的：它沒有階級性、黨性；它不受階級立場和世界觀的影響；它是任何階級的作家都可以「首先」掌握的「最廣泛的概念」；它的「着落點」是「文藝實踐」，而不是爲政治服務。

這種反現實主義是不是眞的沒有階級性、黨性呢？不是的。它的階級性、黨性是很明顯的，不過沒落的資產階級不敢承認罷了。資產階級的文學家和文學理論家，由於他們所處的特殊地位，使他們不敢承認自己的階級性、黨性。他們能够坦白地說出他們的階級利益是建築在剝削、壓迫廣大的勞動人民羣衆的社會關係之上麼？他們能够坦白地說出這樣的社會關係是不合理的麼？他們能够坦白地說出他們的文學是爲捍衛這樣的階級利益、鞏固這樣的社會關係而鬥爭的麼？當然不能。於是他們就拚命地隱瞞文學的階級性、黨性，宣揚所謂「藝術自由」或「藝術獨立」。

胡風的「眞實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也並不是「超階級」、「超黨派」的，它具有資產階級的階級性、黨性。它也不是與世界觀無關的，它的哲學根據是資產階級的唯心論。

這種反現實主義是不是眞的自由，眞的不爲政治服務呢？也不是的。胡風的「眞實的現實主義」，也並不是獨立於政治之外的「自由的」東西，它是爲資產階級服務的。

第二、西歐資產階級沒落期的反現實主義的各種流派的第二個特徵是把意識看成第一性的，而把生活看成第二性的，從而宣揚藝術的規律性不依賴於現實生活的客觀規律性，而依賴於藝術家的主觀。比如印象主義要求表達藝術家的主觀感覺，表現主義要求表現藝術家的激情和他對動態的熱狂、對客體所抱的放任態度。

胡風所宣揚的「眞實的現實主義」就正是這樣的。它拒絕藝術家在實踐中認識生活，揭示生活的客觀規律，要求藝術家表現「主觀戰鬥精神」，用「主觀戰鬥精神」去「擁抱」客觀世界。它給藝術家以充分的自由去進行「創作」，即讓藝術家完全不受現實生活的客觀規律的約束，只憑自己的主觀去進行「創作」。

這種反現實主義之所以拒絕認識生活，拒絕揭露生活的客觀規律，正是彼它的反動的階級性、黨性所決定的。垂死的、反動的資產階級爲了捍衛它的統治地位和階級利益，有意地隱瞞生活的眞理，有意地把人民引離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和尖銳鬥爭，「努力使人與現實相妥協，或使人避開現實，在自己內心世界中作無益的躲匿，使人沉溺於『人生命運之謎』，愛、死等思想中」㊀。

第三、西歐資產階級沒落期的反現實主義的各種流派的第三個特徵是仇視現實主義的偉大傳統，特別是仇視標誌着現實主義發展中的最高階段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胡風的「眞實的現實主義」也正是這樣的。

資產階級在往昔跟封建主義進行鬥爭的時候曾使用並鍛鍊了現實主義這個有力的藝術武器，但當它逐漸向反動的、死亡的道路上前進的時候，這種武器就反轉來打擊了它自己。因而反動的資產階級在把文學藝術推上反現實主義道路的同時，就用反現實主義對抗現實主義，並仇視現實主義的偉大傳統。比如巴爾札克，由於在他的作品裏資本主義受到極尖銳的批判，現代法國資產階級的批評家就把他說成過了時的作家，說成「舊政體」和財產私有制、君主和僧侶的熱烈的擁護者，把他的作品中的一切進步成份都加以誹謗，加以歪曲，企圖阻止勞動人民接受他的遺產。

胡風不打自招地聲明他的「眞實的現實主義」是從歐洲移來的。就上述的幾個特徵看，他並沒有說假話。他的「眞實的現實主義」是地地道道的西歐資產階級沒落期的反現實主義。不過正像西歐的反現實主義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者一樣，他自己不承認那個「反」字，却把那個「反」字加在現實主義者一樣，他自己不承認那個「反」字，却把那個「反」字加在現實主義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頭上，硬說自己的「現實主義」是「眞實的現實主義」。

在我們揭露了胡風的「眞實的現實主義」的實質及其反動性之後，就可以瞭解胡風的反動意圖：他所提出的一切文學「理論」和「文學運動的方式」，都是爲了反對黨的文藝領導，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毛主席的文藝政策，都是爲了給他的從歐洲移植過來的反現實主義開闢道路。

㊀ 見「馬克思主義與文藝」，解放社版，第八〇頁。

反對建築學中的形式主義和復古主義

楊正彥

一

我們祖國正在進行着大規模的基本建設，每年國家都要付出大量的資金，用來建設工廠、學校、醫院、辦公樓、住宅以及其他各種建築。這是一項與國家工業化和廣大人民生活有着密切關係的重要工作，我們必須努力按照黨和國家的要求，既好又省又快地完成這一任務。而在實現這一要求上，建築設計部門工作的好壞乃是十分重要的一環。

黨的政策和蘇聯建設的經驗，早已明確地指出了在建築設計中必需全面深刻的考慮「適用、經濟、美觀」這一不可動搖的原則。但是從許多城市一些新建築物的設計情況看來，這一原則在設計的實踐中並沒有廣泛地得到正確的貫徹，相反地不顧及建築的適用和經濟，單純追求形式的「美」的風氣，却日益嚴重地滋長了起來。這種風氣首先表現在許多新建築物設計中，爲了達到建築外貌的所謂「壯麗」和所謂「民族風格」，把大量的資金，耗費在房屋立面許多不必要的裝飾上。造價極其昂貴的、同時與先進的設計方法與施工方法不相適應的中國宮殿式大屋頂，被無節制的到處搬用，便是一顯著的例證。這種作法使得建築的外部裝飾費佔全部造價百分之二十甚至三十以上，因而大大地提高了建築的成本。這種風氣還表現在支配建築面積的不合理上。不少新建築物，爲了講排場，設計了許多脫離實際需要的過大的門廳、過道、樓梯間、以及沒有用處的角亭等等，而主要使用面積却遭到無情的排擠，在整個建築面積中佔不到一半。另外，在房屋內部的裝修上也存在着嚴重的鋪張浪費，到處鋪裝大理石、漢白玉，隨意使用進口的貴重木材，貼金彩畫，以及複雜精緻的手工藝品等等。由於上述這些做法，就使得我們往往要爲建設一座建築物付出雙倍的代價，無謂地浪費了國家大量的資金。

而且，這種不顧經濟追求形式的「豪華」的風氣，其惡果還不僅僅是浪費了國家資金。在某些新建築物的設計中，還存在着爲了迎合外貌的「美」，竟不惜犧牲建築內部佈置的合理與適用的嚴重錯誤。同時在設計中的過分裝飾現象，也使得設計和施工大大的複雜化了，因而不可避免的要耗費更多的設計力量，給建築施工向工廠化、機械化發展造成困難，這樣也就必然降低了建設工作的速度。由此可見，這種錯誤傾向對國家建設的危害是十分嚴重的，我們必須加以堅決的反對和制止。

固然，造成這種傾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設計工作者在設計思想上的錯誤；建房業主不適當的要求；以及計劃及設計批准部門缺乏嚴格的控制等等都與此有直接關係。但是應該特別指出的是，在目前中國建築界中，流行着一種極其有害的觀點，即片面地强調建築是藝術，把建築的首要任務說成是滿足人民「美」的要求，把社會主義建築的主要特徵解釋爲「華美」「壯麗」，以此來代替對人民生活、工作舒適的深刻關懷，同時還錯誤地理解和濫用「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的公式，在反對結構主義的口號下，提倡無批判地仿效古代建築。這種觀點促成和助長了建築設計中上述錯誤傾向的產生和發展，並給這種傾向做了理論上的解釋和爲它披上了「社會主義」的外衣。因此，在和當前建築設計中不良傾向作鬥爭中，不能不駁斥和批判這種在建築學領域中有深厚影響的錯誤觀點。不如此即不可能使我們建築設計以及建築科學與藝術的研究循着正確的方向前進。

二

梁思成先生是我國有名的建築學者。他對中國古建築有過長時期的研究，解放後熱情地參加了建築教學和首都建設工作，並且較快地放棄和批判了他從美國所接受的結構主義建築思想，積極主張學習蘇聯。但是，由於他並未能眞正地、深刻地領會與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因而在建築學某些基本觀點上，不可避免地犯了一系列的原則性的錯誤。其中之一便是他對「建築」這一社會現象的理解是片面的、不正確的。

解放幾年來梁先生在各種雜誌、報紙上發表了不少有關建築問題的文章。在各篇文章中共同具有的和最突出的基本論點之一，即强調建築是一種藝術。例如梁先生在中國建築學會成立大會上的報告，即以「建築藝術中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民族遺產的學習與運用的問題」爲主題，而在開頭第一段中說道：「今天我想就建築的藝術性這個問題來談談，這個問題到今天還未受到我們應有的重視。」在最近出版的「祖國的建築」一書中，梁先生又爲建築做了以下的解

釋：「建築是全面反映社會面貌和有教育意義的藝術」，並在書尾着重的道出：「我還希望廣大羣衆肯定地承認建築是一種重要的藝術，而不僅僅是工程。」

誠然，建築，特別是社會主義的建築是有藝術性的，企圖說明這一點並不能說是錯誤，但問題在於建築除了「藝術」這一屬性之外，至少還有着其他兩種特性，即實用性和科學技術性。這兩種特性對於建築的發生、存在、發展起着更加直接和決定性的影響。然而，這兩種特性在梁先生的文章中不是根本不提，就是盡量壓低它們的意義，把「實用」說成僅僅是建築藝術創造中的一個條件，把科學技術當做建築藝術的表現工具。由此梁先生就從强調「建築是藝術」而變爲建築「唯藝術」、「唯美」的形式主義觀點的倡導者了。

從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上來看，建築一開始便是人們爲滿足物質生活的需要——「住」的要求產生的。這種要求在最初只是在於遮蔽風雨和防禦野獸，而後，隨着生產的發展和生活的提高，才有了對建築「美」的要求和實現這種要求的可能性，這就出現了「把建築當作藝術的萌芽」（恩格斯語）。同時，也是由於生產的發展和生活的提高，人們才開始向建築提出各種不同的、專門的實用要求，因而促成了建築的分類（如工廠廠房、住宅、學校、醫院、劇院等等），這種分類對於建築形式的多樣化，建築藝術的發展也起了推動的作用。就這樣，建築發展到今天成爲一種具有高度藝術性的創造活動，而建築藝術也就形成了一種專門藝術。不過，在這裏我們必須明確，即使在今天這種情況下，任何建築（除去紀念碑、牌樓等少數例外）都仍然不能脫離實用功能，像一般文學藝術一樣，單純爲表現一種思想和美的意向而存在。無論工業建築、住宅建築、公共建築，其首要的任務都在爲人們安排、提供一特定的「空間」，以便人們進行生產、以及物質與文化生活上的各種活動。由此可見，「實用」乃是決定建築存在和發展的首要的因素。

如果說「實用」是建築產生和發展的基礎的話，那麼「工程技術科學」便是建築產生和發展的主要手段。「建築」就其另一方面的本性來講，它乃是人類一種運用自然規律適應和改造自然的活動。顯而易見，任何建築，那怕是最原始的窩棚、土洞，都只有在不違背自然科學的規律（例如力學、材料學等）的條件下，方能存在。人類對建築的不斷增長的要求，推進和刺激了與此有關的各種自然科學的發展，同時，各種自然科學研究的成果也在不斷地改進着建築方法，使之更加完善、經濟。由此可見，科學技術性在建築身上是一種不可忽視的重要特性。

有了以上的說明，我想已經足以使我們清楚地看到，儘管建築由於其藝術性，因而與其他藝術有某些共同點之時，更重要的還存在着十分顯著的根本的區別。認清這種區別，對於我們正確地確定我們建築實踐的方針，以及建築學、建築藝術的發展方向有十分重要意義。反之，如果抹煞或低估了這種區別，則必然會踏上歧途。其重要意義，我想至少可以有下面三點：

首先，既然建築首要的在於其「實用」的功能，因此我們即不能像對其他藝術創作那樣，只是去要求它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藝術性，而首先是要求它「適用」，要求它在最經濟的條件下爲我們提供最大限度的實用功能。

其次，既然建築主要是一種科學技術的產物，那麼，我們即不能像對其他藝術那樣，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概括爲其「創作」的基本方法，在這裏，更重要的是如何運用一切先進的科學技術的成果，提高建築事業（包括設計、施工）的科學技術水平，以求更加經濟、迅速、便利地建成更多、更好的建築。

最後，既然建築有着「實用」和「科學」這兩種特性，因而建築藝術本身也就產生與其他藝術不同的特點。建築中的「美」必需在「適用」、「經濟」等條件下來實現。這對於其表現內容和方式，不能不產生一定的限制，也就是說，規定它必須在一定的範圍內，用建築藝術特定的手法，來達到建築的「美」。（這一點擬另作論述）

顯然，只有這樣來認識「建築」，我們才可能正確深刻地領會和掌握黨對於建築所提出的：必須適用、力求經濟、樸素美觀的方針。

但是，遺憾的是，梁思成先生以及某些中國建築師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並不是這樣，他們正像赫魯曉夫同志去年在蘇聯建築工作者會議上講話中所指責的某些蘇聯建築師那樣：「經常只强調藝術問題而很少談到居住房屋及其他建築物的經濟與舒適問題」，這一點無論在他們的著作中、設計實踐上以及建築學教學裏，都可以找到明顯的例證和它所造成的不良影響。

梁思成先生一九五三年曾做爲中國科學代表團代表去蘇聯訪問。回國之後在「新觀察」發表了文章。題爲：「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我們姑且不論這篇文章全篇的中心都只是在强調建築的藝術性、民族性，同時重中保護古建築的重要性。應該指出的是：在這篇文章的第一句話裏就存在着嚴重的錯誤。梁先生寫道：「我們在蘇聯學習中最主要的收穫是認識了蘇聯建築的總方向。基本原則就是研究、設計、建造、發展反映社會主義面貌並具有民族特有風格的建築。」試問，蘇聯建築的目的、方針，特點只是在於「反映社會主義面貌」和「具有民族特有風格」嗎？顯然，這是對於蘇聯建築的一種曲解，是梁先生帶着「片面」的眼鏡觀察和認識蘇聯建築的必然結果，而不是什麼出於不小心偶然造成的「語病」。

正是由於梁先生所提倡的這種觀點，促使和助長了某些建築師在設計中單純追求形式的美。北京西郊某招待所便是一個突出的典型。這座建築由於在設

計中部分採取了中國宮殿式大屋頂，大量使用琉璃和大理石飾面材料，濫用貼金彩畫，大大增加了建築的造價，據不完全的估計至少浪費國家一百萬元（新幣）以上的資金。同時由於建築師單純追求美，不注意適用，使這座建築在使用功能上遭到損害；房間十分狹窄，使居住者感到很大不便。然而，這樣一座建築設計却得到了梁先生的好評，在他所主編的「建築學報」上作了詳盡的介紹，準備推廣全國，而且，令人奇怪的是，這座建築的造價高低和適用與否在學報上竟隻字未提。

赫魯曉夫同志在蘇聯建築會議的講話中還曾指出：「一個建築師，如果想不落在生活後面，那他不僅應該知道和會使用建築藝術形式、裝飾品和各種裝飾配件，而且應該知道新的、進步的建築材料，鋼筋混凝土結構和配件。他首先應該精通經濟問題。」並且提到在蘇聯「廣泛地運用裝配式鋼筋混凝土配件、結構、大型砌塊和新的效能高的材料，已經成爲建築技術中的新事物，它無條件地要求摒棄那些陳舊的設計手法」。從赫魯曉夫同志這些話中，我們可以非常清晰地了解到科學技術在建築設計中的重要意義。但是，梁思成先生却在自己的文章中一再辯白：「美觀與經濟沒有矛盾」、「材料技術不能決定建築形式」。其最終目的，仍不外是企圖把「藝術」形式說成是建築設計中的首要的、獨立無拘的問題。梁先生在自己的文章中不遺餘力地倡導建築師要重視「建築藝術」，鑽研「民族形式」，因爲在他看來，「廣大人民對建築的要求一天比一天提高，對於民族形式的要求也一天比一天迫切；我們若不掌握民族遺產的傳統和規律，我們就將落後於人民在這方面的要求」㊀。而在梁先生眼裏，過去幾年來建築設計中的缺點，最主要的是「造成了許多不足以反映這偉大時代的建築」㊁。請看梁先生就這樣把「美」當作了人民對建築的最「迫切」的要求，把「不美」說成設計工作者最大的罪過。難怪許多建築師沿着這條路「努力」的結果，就是：只注意立面設計，不注意平面佈置；只希望搞得可以充分表現所謂「美」的民用建築設計，不願意搞被實用「限制」較大的工業建築設計；只高興搞單獨的設計，不屑於作標準設計；只醉心於藝術形式的採用，裝飾材料的選擇，而對快速施工，機械化、工廠化施工以及施工組織設計等先進經驗的推行，却十分冷淡。而這一切不正是當前阻礙着我們把建築設計與施工的科學水平提高一步的絆脚石嗎？

三

我們指出建築的「實用」和科學技術這些特性，絕非意味着否認建築包含着藝術性。因爲建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把人類社會生活、生產關係、政治制度以及思想意識，通過建築藝術形象反映出來，這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而人民對於建築的審美方面的要求也是不容忽視的。正爲了這個緣故，黨對於建築的要求，不僅要適用、要經濟，還要美觀。不過，問題不在於要不要「美」，而在於要什麼樣的「美」和「如何達到建築的美」。

梁思成先生根據蘇聯建築的經驗提出：我們建築中「美」的基本方向應該是「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從原則上看這當然是對的，這正是斯大林同志爲社會主義文化藝術確立的一個基本的口號。建築藝術既然作爲文化藝術的一部分，那麼無疑的，這一口號對它來說也是適用的。然而，不幸的是，梁先生在對於這一口號的理解出了偏差，因而仍然不可能正確地解決當前建築藝術的問題。

首先，梁先生在「什麼是建築藝術的內容」這一根本問題上是混淆不清的。

本來，這個問題在一般文學藝術中是比較容易弄清楚的。例如一篇文學作品的內容，不外是對社會生活、人物的描述，而所謂「形式」就是指這一作品的體材、格式、結構、風格、韻律等等。但是，對於建築來說，因爲它是一個具有使用功能的、實在的物體，因而建築藝術的內容就不可能像文學那樣形象、具體。而只能把現實生活中提昇、抽象出來的人的思想、感情、慾望等等，通過建築所特有的空間形式——包括體形、尺度、比例、色彩、格調、佈局等表現出來。恩格斯在「茲格夫立德故鄉」一文中曾這樣形容過建築作品的思想內容：「希臘建築中反映出光明、快樂的意識，回教建築——反映憂鬱，高直建築——使人進入到爲神聖氣氛所籠罩的狀態。希臘建築——是明朗的晴天，回教建築——是星光閃爍的黃昏，而高直建築——是朝霞。」這自然是一種十分概括的描寫，但也的確一語道中這幾類建築最基本的思想特徵。爲了更具體來分析建築藝術的內容，這裏不妨舉出一些現實的建築物來說明。就以莫斯科紅場上的列寧斯大林墓來說吧，這一建築物的設計在蘇聯獲得了極高的評價，是成功地以建築形式深刻地反映思想內容的典範。它以一級級提高的台基的形式，表明了安息在這裏的是蘇維埃國家的奠基人；它以一種極其樸實、單純的外表和內部裝修，反映了無產階級領袖的平凡而偉大的人格；整個建築從地面拔起不高，這也反映着領袖和人民之間的親密的聯系，使人們感到列寧同志並沒有遠離人民，仍然和人民在一起（以上這只是根據我的不完全的理解）。再以莫斯科地下鐵道車站爲例。正如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在建築地下鐵道的決議中要求的那樣，蘇聯建築師爲它們闢出廣闊的空間，做了巧妙的採光上和通風上的安排，並加以豐富多采的藝術裝飾，這就達到了給予人們以明

㊀、㊁ 均見「祖國的建築」，第四十六頁。

亮、暢快的感覺，不以爲自己置身在深邃的地下的目的，同時反映出社會主義祖國的偉大力量和物質與文化的豐富。就其思想本質來講，這也就是革命的人道主義和愛國主義在建築藝術中的反映。卡岡諾維奇同志曾這樣說過：「農民工人在地下鐵道中，在這些大理石的柱子中間，不僅看見優美技術和建築物，他在地下鐵道中看見自己的力量，自己政權的具體表現。」北京的天壇可以說是另一種典型。正像大家所知道的那樣，這一組建築羣，以它特有的佈局、體形，象徵和顯示了封建帝王和天神的聯系，以達到肯定、鞏固皇權的目的。從上面的實例中，至少可以幫助我們肯定以下兩點：

一、所謂建築藝術的內容就是它所反映的人的、階級的、時代的和社會的思想意向、感情和慾望。

二、基於不同階級、不同時代的不同思想、感情、慾望，因而也就產生了不同的建築藝術形式和建築藝術體系。

但是，梁思成先生是怎樣理解建築藝術的內容呢？他在「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一文中借別人的口，這樣地寫道：「『社會主義內容』就是關心勞動人民的幸福；關心他們物質和精神上不斷提高的需要，在設計中去滿足它。」「民族的形式是根據每個民族的特點——它的語言、它的歷史等等所形成的文化的形式。」請看，這是一種多麼令人難解含混不清的解釋啊！不過，問題還不光在這裏。在這篇文章的後面，梁先生又作一段補充：「經過了這樣的參觀（指在蘇聯參觀）之後，我們深深體會到：『民族形式』和『社會主義內容』絕不是割裂的兩件東西。爲了滿足人民物質的精神的需要，『社會主義內容』就包括了照顧各民族人民所習慣的、所喜愛的、美好的形式在內；倒過來說，就是關懷到人民對這個方面的要求。因此，應用並發展各族人民的文化遺產也就是『社會主義的內容』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爲不通過民族的形式就不能完整而透澈地滿足人民這種精神和文化上的需要的。」這裏，梁先生更把「形式」和「內容」這兩個在美學理論中屬於不同範疇的東西硬給混合在一起了。

剖解開這幾段話，可以看出梁先生的邏輯是這樣的：

一、梁先生所謂建築藝術的社會主義內容，簡單說來就是滿足人們在「居住」功能和審美方面的要求。

二、既然建築採用「民族形式」是完整、透澈地滿足人民審美要求的必要條件，發展民族文化遺產是社會主義內容的重要因素，因此「形式」問題就包含到社會主義內容本身去了。反過來說，只要採用了「民族形式」的建築也就一定具有社會主義內容了。

顯然，如果按照梁先生的邏輯來理解建築藝術的形式和內容問題的話，結果是非常可笑和可怕的。

在我們看來，建築的內容和建築藝術的內容這本來是兩回事情。所謂建築的內容就是指一座建築所提供的物質功能，而建築藝術的內容，如前所述，就是它所反映的社會的、階級的思想特徵，但是梁先生却把「民族形式、社會主義內容」中的內容，硬解釋爲包括物質功能的提供和「美」的要求的滿足，來替代社會主義建築藝術中不可缺少的深刻的思想內容。按照這個公式，一座建築只要是適用的，而且籠統地說來也是「美」的，那麼這座建築在建築藝術上就是具有社會主義內容了。至於「美」究竟是怎樣的美呢？從梁先生的答案裏，那就是「民族形式」。於是，有了民族的「形式」，就既有了「內容」，又有了「形式」。難怪梁先生按照自己這一套邏輯，把反映封建統治階級思想特徵的宮殿、廟堂等建築的藝術形象，全面地肯定了下來，並企圖把它規定爲我們這樣一個新時代的新建築所必須遵守的格律。這種抽出了藝術的內容而只談形式的觀點，在實質上不是等於完全否定了建築藝術的階級性了嗎？

四

梁思成先生不僅曲解了建築藝術中的「社會主義內容」，在對「民族形式」的了解與運用上也存在着很大的錯誤。

不錯，我們承認建築藝術應該有民族的特點（即民族的形式），對於民族建築的遺產應該珍視，並深入地加以研究，以便承繼其中的優良的傳統，吸取其中優秀的、巧妙的手法。但是，這裏必須明確，由於建築是工程技術和藝術的產物，它必然受到當時當地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制約。因此，對於民族的建築遺產必須加以歷史的和階級的分析，分清其「精華」與「糟粕」，確定有所取捨，關於這一點，梁思成先生雖然在口頭上是承認的，但實際上却恰恰相反。

在「建築學報」一九五四年第一期上，梁思成先生發表了「中國建築的特徵」一文，把中國建築的基本特徵歸結爲九點：即（一）建築由台基、房身、屋頂三部分組成；（二）四合院的平面佈局；（三）木材構架的結構方法；（四）斗拱的普遍運用；（五）舉折、舉架的屋頂結構；（六）展翼式屋頂和出檐；（七）大胆地使用顏色；（八）結構交接處的藝術加工；（九）使用有色琉璃磚瓦。緊接着，馬上就肯定這些特徵即歷代中國建築所遵循的法規。並大胆地把它比作語言中的文法，主張現代中國建築也必須嚴格地、無條件地遵守下去，否則便不可能創造出具有中國民族特點的建築藝術作品。這就是梁先生倡導的「法式論」，在他的其他許多文章中也一再的爲此做了申述和論證。

建築中的民族特徵，以及梁先生所舉出的各種「型範」、「法式」、「作

法」等等能不能比做語言中的文法呢？只要我們很好地讀一下斯大林同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一書，並具體分析一下這些「特徵」、「法式」的內容，就可以明顯地看出它們之間是極不相同的。

在梁先生所歸結出中國建築的九個特徵中，實際上包含多種性質的東西。木材的框架結構和舉折、舉架屬於建築科學技術的範疇；展翼式的屋頂和出檐乃是一種建築形式；「斗拱」、「蜀王堂」、「螞蚱頭」以及彩畫、琉璃磚瓦等屬於建築藝術手法；而四合院的佈局又是一種建築羣的組織方法。因此，我們絕不應該把它們一律等同看待，更不能不加分別地全都承繼下來。

就中國古建築的以木材作爲框架的結構方法來講，固然應該承認，我們的祖先能在數千年前，即創造出這種在某種程度上合乎近代鋼筋混凝土構架原理的建築方法，實在是一種驚人的、可以引爲驕傲的智慧的表現。但是，用木材作建築的主要結構材料，無論如何是不如鋼筋混凝土更加堅固、耐久，在建築跨度、層數都受到了局限。而且木材生產量受自然的限制，決不能像鋼筋、水泥的生產增長的那樣迅速，因而大量進行建築的今天，木材必然會供不應求。再說。現代的建築還不是都必須採取框架結構，目前在中國以磚墻負重的所謂混合結構的建築方法，正廣泛的使用着。因此，中國古建築的這種結構方法，實際上除了在一部分民間建築仍然使用外，在國家的大規模的新建築中已經很少看到了，這何嘗能成爲中國建築所必須具有的「民族特徵」呢？

再就展翼式的屋頂和出檐及與此相聯的斗拱來講，它的形成與當時結構方法、實用要求是分不開的，屋頂曲面的形成是和當時舉折、舉架的結構方法相適應的。屋檐之所以挑出較長主要是爲了保護墻面，屋檐之所以上翹和室內採光有很大關係。而爲了承托挑出的屋簷就出現重重疊疊的斗拱。古代的建築巨匠們，就這樣在實用和技術結構的需要的基礎上，給屋頂和屋檐加以藝術化，使之達到美的效果，這自然可以說是一種明智之舉。不過到了今天，舉折、舉架的屋頂結構方法由於耗費木材太多，跨度有限，實際上已經逐漸被「揚棄」了。同時由於多層建築的日益普遍，屋簷已經不可能解決「保護牆面」的問題，因而挑出很長的屋簷就不是今天的建築在實用上所必需的了。況且目前在一般坡頂的建築上的屋簷，或是某些建築上爲了「美」而加上的「挑簷」，由於結構方法和材料的不同，也已經不再必須用斗拱來承托。因此斗拱這種「作法」就很難再說是必須遵守的了。

當然，梁先生還可以用中國某些磚石的古建築中也有「虛構斗拱」的事實來證明「斗拱」已經越過材料的界限，成爲中國各種建築的共同的「作法」。其實這一點是容易說明的。正像梁先生自己所說的那樣，我們祖國過去數千年中，木框架結構的方法在建築中始終保持着主要的地位㊀。在這種情況下，斗拱自然會形成一種普遍的傳統的手法，與此同時建造的少數磚石建築不能不受到這種手法的影響，這有什麼奇怪呢？然而，到了今天，社會生產力已有了很大的變革，木框架結構現在不是、將來更不會是主要的結構方法，那麼，有什麼理由一定還要把「斗拱」不分青紅皂白地强加在所有現代的建築之上呢？（這裏要附帶聲明一點，即「斗拱」作爲一種建築藝術手法來看，在適應藝術內容和不違反適用、經濟原則條件下，適當地採用也還是可以的，但並不是必須的。）

由於篇幅所限，這裏不能對「九點特徵」一一作詳盡地分析，但只要舉出以上兩點，已經可以看出梁先生所謂的民族特徵，實際上是中國古建築技術、形式、藝術手法等等的大綜合，其中無一不是在當時生產和科學水平及社會生活的限制和影響下產生的。正因爲這個緣故，它們和語言中的文法便有了極大的差別。

按照斯大林同志的分析：語言乃是一種既不屬於上層建築，又不屬於物質生產的、由全社會創造的並爲全社會服務的「人類交際的工具」。而建築呢，就其藝術性來講，是屬於上層建築的一部分，就其實用功能方面來講，是人類社會生產和生活的物質財富，就建造建築物的方法來講，又屬於自然科學與技術的範疇。因此，建築和語言是根本不能相比擬的。

其次，建築藝術有民族性這一點和語言有民族性是一致的。不過，是不是能因此把建築藝術形式中固有的民族的特殊手法，當作民族語言中的文法規則一樣必須去遵守呢？不能的。我們知道在建築藝術中是內容決定形式，而不是形式決定內容。建築中的民族性主要表現在建築藝術某些形式上，不像語言中的民族特點滲透在全部詞彙和文法中，因此在建築藝術中運用民族固有的形式、手法，只有在適用於所要表現的內容的條件下，才應該被採用。

由此可見，把中國建築的特徵比作「文法」是不能成立的。既然如此，爲什麼梁先生却一再强調這種論點呢？我以爲在「祖國的建築」中有一段話可以看作梁先生的自白，他說：「我覺得建築中的各種作法的規則很像語言文字上的文法。文法有時候是不講道理的東西。……可是它是由習慣發展來的、實際存在的一種東西。你要表達你的感情、說明問題，你就得用它。」㊁想必梁先生正是看中了「文法」是「不講道理的東西」這一點，企圖藉它把所有自己認爲是「民族特徵」的東西，不分先進、落後，是好，是壞，「蠻不講理」地要求我們一律都搬到現代建築上來。這不正是一種毫無批判、分析、盲目復古思

㊀ 見「祖國的建築」，第二十三頁。
㊁ 見「祖國的建築」，第十二頁。

想的典型嗎？

五

把上面列舉的梁思成先生在建築和建築藝術上存在的錯誤觀點，歸結在一起，簡單的說，就是：在建築中片面地光看到其藝術性；在藝術中又單純地强調形式，抽出了內容；而在形式中又把「民族形式」看成固定不變的東西。這一系列的錯誤，在本質上乃是一種以資產階級唯心主義觀點和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認識和解釋建築及建築藝術問題的結果。

毛主席曾再三教導我們：「研究問題，忌帶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矛盾論」）。列寧同志在「再論職工會，目前形勢及托洛茨基與布哈林的錯誤」一文中也曾指出：「爲了眞正地認識對象，必須把握和研究對象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系和『媒介』。我們從不能完完全全做到這一點，可是，全面性的要求，就可以使我們謹防錯誤，謹防僵化。」不幸的是：梁先生在對建築的認識上犯了片面性的毛病。他不去全面的認識建築所具有的多方面的特性，而單純地强調其「藝術性」，以致使自己的思想、論點脫離和違反了客觀實際，最後不能不陷入到主觀主義——唯心主義的泥潭中而不能自拔。

梁先生對建築藝術的內容與形式問題的理解同樣帶有濃厚的唯心主義色彩。我們知道，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在美學領域裏最基本的分歧之一即發生在對藝術內容與形式的問題上。馬克思主義美學認爲：在藝術中首要的和起着決定作用的乃是它的內容。所謂內容也就是對人類社會生活、階級鬥爭的反映，而藝術的力量的源泉也就在於此。因此，「藝術作品的價值，最後決定於它所表現的內容的多少」（普列漢諾夫語），「形式如果不是有內容的形式，它是沒有任何價值的」（馬克思語）。然而唯心主義美學却與此相反：在他們看來，藝術只是天才的創作，是藝術家幻想、虛構出來的，因此不承認藝術有什麼社會內容和階級內容，主張「認識藝術就是認識形式」，「美就是不需要任何理解的普遍的享樂對象」（康德語）。非常遺憾，梁先生在建築藝術問題上，恰恰是抽去了「內容」，而去單純讚揚形式的美。顯然，這和馬克思主義美學是毫無共同之處的。

在運用「民族形式」的問題上，梁先生的看法也同樣如此。根據馬克思主義美學理論看來，「民族形式」絕不是固定不變的東西。因爲依照「內容決定形式」這一規律，爲了表現不同的內容，只能從民族固有的各種形式中尋找和運用適應於內容所需要的某些形式，而且還有必要根據新的內容、新的條件創造出新的形式。然而梁先生却主張把中國古建築的形式全盤的、毫無改變的承繼下來。把所謂中國古建築的九點特徵毫無道理地比做不可更改的「文法」。要求新建築的形式只能在「法式」的有限範圍內加以選擇。結果，使得新建築座座變成「故宮」、「太廟」的翻版，它們之間最大限度的差別頂多只是「太和殿」和「祈年殿」之別而已。因此，這種觀點實際上是用形式來決定了內容，並且窒息了「形式」的不斷發展、豐富的可能性。

梁先生建築思想的錯誤不僅表現在這些問題上，在他的城市建設的論點上，在對於中國建築史的研究上，以及在對於外國建築的學習問題上都反映出來，有待進一步的揭發、批判。這裏我僅就建築及建築藝術的問題，發表一些意見，由於認識水平和知識所限，很可能我自己是完全錯誤的，希望同志們指正。

貨幣流通規律與貨幣流通計劃化

鄭伯彬

（上接第60頁）在各地進行現金收支分期匡計下，會發現出納計劃是否能够及時完成，會貫徹出納計劃的實現，也能及早地使上級適當地給予修正。同樣，也能使上級更加了解具體的經濟情況，組織現金的調撥。

所有這一切措施，現金出納計劃的編製和「發行——現金調撥辦法」（包括現金收支分期匡計），都是在貨幣流通規律的原理下進行的。它緊緊地掌握着貨幣流通必須與生產與商品流通相一致的原理，減除那些應從社會必要貨幣流通量中扣除的各種因素，使流通所必要的貨幣量適應物質生產和流通的需要。

總上所述，馬克思所揭示的貨幣流通規律，是有計劃地組織貨幣流通的最重要的依據。這個規律告訴了我們：貨幣流通必須服務於生產和商品流通的需要，而現金出納計劃，就是根據這個原理進行編製的。現金出納計劃反映了各種不同的現金需要，也反映了不同的現金流轉。以國家銀行的出納部門爲中心，如何從各個渠道流出和流入，都在現金出納計劃明確地表現了出來。

自覺地運用貨幣流通規律，使貨幣流通適應生產和商品流通的需要，只有在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才有可能。近年來的事實已經證明，我國在國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發展與壯大的基礎上，已經可以自覺地運用貨幣流通規律，對貨幣流通加以有計劃的組織與調劑了。我國貨幣流通計劃化，在現金出納計劃的編製的基礎上，已經向前邁進一大步了。隨着計劃化的逐步加强，我國的貨幣制度是日趨鞏固了。它不但使人民幣的價值日趨穩定，而且更使人民幣的流通更加適應生產與商品流通的需要，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

「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傑出貢獻※

王亞南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工人階級從事革命戰鬥和建設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正如同整個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中的其他構成部分一樣，政治經濟學不斷地隨着工人階級革命事業的進展、不斷地由工人階級革命事業發展的經驗的總結，而使它的內容日益趨於完備和充實。

我們以往的政治經濟學，差不多主要是把資本主義國民經濟體系作爲研究對象。自從斯大林的經典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發表以後，關於社會主義經濟或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就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同時，對於資本主義經濟部分，也主要由於「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關於基本經濟規律的新提法，而不能不有一些更完密的訂正。直到最近系統而完備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出版，可以說是完滿地實現了這些任務。

人民出版社給予我一個閱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譯本初稿的機會。我從初步閱讀中，獲得了不少的啓發和體會。這裏打算先就「教科書」中主要包括的二個國民經濟體系——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說明系統及其在研究上的關聯性，提供以下幾個不成熟的看法，藉供關心這部大著並準備學習這部大著的同志們的參考。

一 「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在那些方面發展了政治經濟學的內容和面貌

我們首先需要就「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這個書名講幾句話。一般所謂教科書，通常是把已經存在着或已經發現出來了的某門科學理論，爲了便於傳播、便於教學，而加以通俗化或系統編列的結果。而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却具有極豐富的革新的內容，表現了更深刻得多的科學意義。

長期以來，政治經濟學就只是被理解爲以資本主義國民經濟體系爲研究對象的經濟學說。在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固然是如此設想，就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即使只是把有關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說思想看作是狹義的政治經濟學，但因爲那時社會主義還不會由理想變爲現實，他們也就只好面對着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關係，論證分析其向着社會主義發展、轉化的規律和必然性。作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和依據的「資本論」，照馬克思自己所說，它所「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與其相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㊀。列寧還認定：「資本論」中所探究的「這個理論，僅僅企求說明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組織，而沒有企求說明任何其他社會組織。既然運用唯物主義去分析和說明一個社會形態時已達到了這樣燦爛的成功，那麼歷史唯物主義當然也就不復是什麼假定，而是經過了科學檢驗的理論；這種方法當然就必須通用到其餘各個社會形態方面去，雖然這些社會形態尚未經過專門事實研究和詳細分析……」㊁。人類的複雜生理結構儘管是由細胞發展過來的並且還是由細胞構成的，但細胞學的研究却遠較生理學的研究爲遲緩。在關於人類生活形態的考察和分析上，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上，亦有類似的情形。到今日爲止，資本主義國民經濟體系所由發展過來的其他社會形態，儘管仍「尚未經過專門事實研究和詳細分析」，而從資本主義發展轉化過來的更高級的社會形態，即社會主義形態，社會主義國民經濟體系，却已經由革命和建設的實踐要求，已經應用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已經把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部論著作爲典範，而把比較完整、系統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第一次提到我們面前了。這個新創建起來的社會主義經濟學說，在「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第一次公表出來，單就這一點講，已够說明這部「教科書」該具有如何不同於一般所謂教科書的深刻的科學意義。

其次，正由於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部分第一次被創建出來了，這就使得包括這個重要部分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更加具備了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形式和體系。我們知道，廣義政治經濟學這個術語是首先由恩格斯提出的。他在「反杜林論」中指出，廣義的政治經濟學是「這樣一種科學，它研究各種人類社會裏生產、交換的條件與形式以及與上述二者相適應的產品分配方式」㊂。這個

※「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譯本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翻譯，將由人民出版社在今年五、六月間分册出版。

㊀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初版序，人民出版社版，第三頁。

㊁ 「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一卷，莫斯科中文版，第一〇三頁。

㊂ 恩格斯：「反杜林論」，三聯書店版，第一八五頁。

術語本身，具有極深刻的革命意義，它不僅駁斥了那些把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看作最後一個社會形態的資產階級學者的形而上學的主觀幻想，同時並還殷切期待着、明確預示着由社會主義形態代替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辯證的必然變革。因此，所謂廣義政治經濟學，在本質上，就只能是以資本主義的暫時過渡性爲歷史前提，或是以馬克思所發現的「社會經濟形態」爲認識前提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反過來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那怕它像在「資本論」中所研究的那樣，只是把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作爲對象，但由於它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來論證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來踪去跡，論證其發生、發展以至滅亡的全部過程，它就不能不帶有廣義的性質。不過，在社會主義經濟學尚未出現以前，甚至在社會主義形態已出現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尚未出現以前，不僅是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甚至在蘇聯革命初期的經濟學界，也還有一些自命爲馬克思主義者的經濟學者認爲：政治經濟學只限於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生產形態。例如，拉比托斯在他一九三〇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教程」後面附有「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附文，在那裏面，他着重的表示：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不是研究人類的一切社會關係，而只研究調劑生產關係的定律，並且只限於研究無組織的（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的生產關係」（見李譯本「政治經濟學教程」上册第一八頁）。到了一九三一年他雖在同書第六版中把這個意見修正了，可是據列昂節夫所說：「……在政治經濟學的講授中，在提綱和教科參考用書中，存在着許多本質上的錯誤和缺點，……認爲只要一剷除資本主義，凡是它所固有的一切法則就都消滅了；並且認爲在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制度中，是沒有任何經濟法則的，也不可能有任何經濟法則的……。」（見列昂節夫：「政治經濟學」，人民出版社版，第四二三—四頁）。這一切籠罩在廣義政治經濟學上的思想塵霧，直到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公刊出來，才算從根廓清了；而且，也正因爲比資本主義更高級的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形態的生產和分配規律，被發現出來，被建立起來，那就不但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更大的程度上具備了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形式，使政治經濟學更有理由、更有根據地看成是「研究人類社會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物質資料的社會生產和分配規律」的一門社會科學（參照「教科書」導言），並且還由於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推移過程中，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中發現了新的規律和原理，而由是提供了不少有助於進一步研究前資本主義諸社會形態和進一步理解資本主義經濟運動規律的有力依據。

現在且來看看在「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關於資本主義經濟部分，改變了那一些表現形式。首先，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一篇中，把它區分爲壟斷前的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兩個部分來說明，那對於資本主義整體性的認識，對於帝國主義是垂死資本主義的認識，就明確得多、系統得多。在壟斷前的資本主義部分有二點值得提及：第一，在「商品生產——商品和貨幣」以後，不接着論到資本和剩餘價值，而把「資本主義的簡單協作和工場手工業」到「資本主義的機器時期」先提出來，然後再講「資本和剩餘價值、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雖然把「資本論」中的順序略爲改變了一點，但在明確提出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以後，這樣的改變，是必要的、合理的。第二，在「資本的循環與週轉」後面，不接下去講「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與流通」，而先把剩餘價值轉化爲利潤，剩餘價值實現和分解爲企業利潤、利息以及剩餘利潤轉化爲地租，乃至國民收入，加以討論，再回頭來講「社會資本的再生產」，緊接着講「經濟危機」，然後轉到「壟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部分。這樣的程序，也像是順理成章，更符合現實發展情況，對於學習政治經濟學說來是更便於理解一些。在壟斷資本主義部分內，首先提出壟斷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接下去討論體現這個規律的殖民制度等等以及資本主義的總危機，明確地表現了社會主義革命前夜的情景。通過這樣的科學系統的表達方式，就最容易使我們認識到，現代資本主義的總運動，在以鐵的必然趨勢，走到了它的歷史盡頭。

最後，我還從「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看到了政治經濟學面貌的一個新變化，那就是，在以往，我們所學習研究的政治經濟學，一直是把資本主義經濟學部分作爲主體，由於「教科書」的出現，特別是由於在「教科書」中把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開始建立起來了的結果，那個主體，就顯然轉移到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一方面了。這也就是說，我們過去學習政治經濟學，一般只是從那裏得出資本主義由其內在的運動規律，必然要創造出並日益發展着否定其存在的無產階級，而由是實現社會主義的結論；現在，在蘇聯，在我們中國及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社會主義或是已經實現，或是正在迅速實現的過程中，因此，我們學習政治經濟學的歷史任務，就顯然不能只限於加強我們的革命信心和認識，更重要的是要把它當作一個幫助指導我們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有力的工具。正是因爲這個緣故，一部比較系統完整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或是一部以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部分爲主體的廣義政治經濟學教本，就是非常需要的了。當我們體會到，在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該發生了如何偉大的不可估計的力量的時候，我們是應當以非常興奮與感激的心情，來歡迎這部發展了政治經濟學面貌和內容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出版的。

二　研究有關資本主義部分的政治經濟學究竟對於研究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有那些聯系和幫助？

當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已在基本上建立起來，並已在政治經濟學這門課程中當作一個重要部分來講授的時候，大家很快就發生這樣一些想法：政治經濟學中有關資本主義的部分，是否無須學得太多呢？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或正在向着社會主義過渡的國家，學習關於資本主義部分的政治經濟學，它是爲了處在兩個對立鬥爭着的世界中，需要藉此確認資本主義滅亡的必然性和資本主義向着社會主義轉變的發展規律，以加强我們的戰鬥意志和信心呢？還是爲了作爲一門完整的歷史科學，非好好研究理解這一部分，就不容易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部分，有正確的認識的原故呢？大家當然會明瞭，兩方面都有關係。但有關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究竟在理論上和有關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有怎樣的聯系？前者究竟對於學習後者有什麼幫助？恐怕大家還是不怎麼明確認識到的。

我們需要從幾個方面來說明這個問題。

首先應當提到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具體表現在馬克思的體大思精的「資本論」體系中。「資本論」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基石。它的主要目的，雖然是在揭露「資本主義的運動規律」，在發現「資本主義的辯證法」，但却是在經濟基礎連帶其上層建築的整個社會制度和思想生活的相互關係中，並且是在把資本主義當作是一個過程的整個社會發展史中去發現那個運動規律的。因此，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決不能單純地理解爲是關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科學系統知識，同時還是體現着社會發展規律的歷史唯物論和辯證法的生動而完整的典範。所以，對於以「資本論」爲依據的政治經濟學的學習，其實就在訓練我們如何掌握並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這對於其他科學的研究是極關重要的，當然更大有助於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解。

其次，當作一門歷史科學的政治經濟學，它所研究的對象，所研究的社會諸生產關係，儘管因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本質不同而表現了極大的差別，但畢竟有它相通的和相聯系的一面。比如說罷，把政治經濟學定義爲研究不同社會歷史階段的生產關係發展的科學，或者爲研究物質生活資料生產與分配的關係或規律的科學，那不管是就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來講，或是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來講，是同樣適用的。而且，正如斯大林所指示：「各個社會形態不僅以自己特有的法則相互分開着，而且以一切社會形態所共有的經濟法則互相聯系着。」㊀而這共同互相聯系的經濟規律，就是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馬克思曾就「勞動過程」這一經濟活動的一般意義，啓示了我們許多關於經濟範疇原則通用於一切社會形態的因素。他說：「勞動過程，我們只把它表現爲它的簡單的抽象的要素時，是一種有目的的產生使用價值、使自然物適於滿足人類需要的活動，是人與自然間的物質變換的一般條件，是人類生活的永久的自然條件，所以和人類生產的各種形態無關，在人類生活的各種社會形態上都是適用的。」㊁其他如生產一般、生產力、生產關係以及生產決定其他一切經濟關係的原理，以所有制爲生產方式的基礎的原理……等等，都是馬克思所提到的或多或少地與一切社會形態有關的「一般的抽象的規定」㊂，在有關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中把握了它的基本概念，研究起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來，就大體可以當作既明的道理了。

至於那些多少與商品生產相聯系的一些規律和範疇，如商品、價值、價格、貨幣、貿易、信貸、價值規律、貨幣流通規律等等，那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是表現得最一般最突出普遍的，到了社會主義社會，由於全民的和集體農莊的兩種基本生產形式的存在，由於還需要採取爲集體農莊所願意接受的通過買賣交換的經濟聯系，這許多範疇和規律，就不能像其他那些更直接體現着資本主義剝削本質的經濟範疇和規律（如剩餘價值、勞動力價值、平均利潤及其規律等等）那樣，隨着資本主義經濟條件的消滅而失其存在。因此，在集體農莊所有制不會全面轉變到全民所有制以前，從而，在商品流通不會完全爲產品交換所代替以前，我們在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中所學習的這一些範疇和規律的意義及其作用的認識，在一定限度內，至少，在比較考察之下，是大可增進我們對於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有關方面的理解的。

最後，我還想補述一下斯大林關於馬克思的再生產公式的看法，這對於我們由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到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一個極有效益的啓示。馬克思依資本主義的商品價值關係所創制的再生產公式及其理論，在拘泥於形式的蘇聯經濟學者，如像雅羅申柯之流，就以爲對於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蘇聯情況，是不能通用的，也就是失了時效的，但斯大林却教導我們，必須善於在資本主義商品價值形式後面，去發現它的基本內容，去把握那個公式所由建立的諸基本原理。他明確指示：「……關於社會生產之分爲生產資料的生產與消費資料的生產的原理；關於在擴大再生產下生產資料生產的增長佔優先地位的原理；關於第一部類和第二部類之間的對比關係的原理；關於剩餘產品是

㊀ 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六四頁。
㊁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二〇〇頁。
㊂ 參閱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七〇頁。

積累的唯一源泉的原理；關於社會基金的形成和用途的原理；關於積累是擴大再生產的唯一源泉的原理，——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的這一切基本原理，不僅對於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是有效的，而且任何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在計劃國民經濟時，不運用這些原理也是不行的。」㊀在其它以資本主義商品價值表現的形式中，也有相類似的情形。如：資本的有機構成、不變資本節約使用方法、資本的循環與週轉以及如資本家在各種場合施行的提高勞動效率和降低成本方法方式等，都可在一定的限度內把它們所依據的原理原則，用來爲社會主義的生產和流通服務。事實上，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核算以及加速資金週轉的種種辦法，也確實在不同的精神和意義上或多或少地運用了那些原理。

然而，這些都只算是說明在學習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某些方面，有必要通過有關資本主義的諸經濟原理來增進我們的認識的一面；但還有另一面，更重要得多的一面，那就是必須明確社會主義的任何經濟範疇和規律，都是和資本主義的同一範疇同樣規律，有着本質的區別的。

三　應當嚴格分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範疇與規律和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範疇與規律的本質的區別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最容易顯示區別的地方，就在於後者沒有明確的歷史觀點。區別不同時代特質的「社會經濟形態」這個範疇，在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中是不存在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者行所無事地把形式上或表象上類同的東西，都一視同仁地對待起來。那怕是特出的古典經濟學者如像亞丹斯密和里嘉圖那樣的人物，也不能避免這種錯誤。當里嘉圖依據亞丹斯密的說法，認定在原始社會，漁人捕魚，獵人捕獸，不但要耗費漁獵的直接勞動，還要耗費用在漁具獵具上的間接勞動，因而，他們生產物的比較價格，就要和費在直接勞動間接勞動上的總量成比例。馬克思批判他，說他把資產階級社會的勞動形態，看成了社會勞動的永恆的自然形態；說他把原始漁夫、獵師看爲是其捕獵物的商品所有者，他們好像在依照他們寫書當時（按即一八一七年）的倫敦交易所通用的年息表，來核算他們各自費在那種「商品」中的勞動時間的比價㊁。如其說這些古典經濟學者忽視了同一形態在不同社會的本質和內容是出於天眞；那末他們後繼的庸俗經濟學者把古今中外的類似形態混拌在一起，就還在那種天眞當中，包含了故意否認馬克思主義歷史觀點的邪惡企圖。然而，沒有唯物主義的歷史觀點，就不但不能從一般區別特殊，不但不能把握究竟何者是屬於特定社會的最根本的範疇，也不易判斷那些範疇規律必須伴隨舊經濟條件的解體而消失，隨着新經濟條件的發生而出現。

自然，我們所學習的有關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的，是依照歷史唯物論的觀點方法寫成的。但雖然如此，我們從那裏所學的一些有關資本主義經濟的概念，也難免要在一定程度上，爲我們設定一些需要克服的認識上的障礙。我們習慣了有關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體系，就有些不易從那個體系得到解脫咧！其實，不但就整個體系說來是如此，就對每一個範疇或規律講，也難免有類似的傾向存在。「教科書」在有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部分中，其所以往往把社會主義的各個經濟範疇和規律，拿來和資本主義的範疇和規律相比論，無非是要求我們明確地辨認那種區別。

在這裏，爲了說明的便利，爲了增進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解，我想就廣義政治經濟學範圍內有關經濟範疇和規律，粗略地分作以次幾個類型加以解析：

第一個類型，就是那些與資本主義本質密切聯系，隨着資本主義制度消滅而喪失其存在依據的範疇和規律，如我曾在前面約略提到的剩餘價值以及和剩餘價值緊密聯系的剩餘勞動、剩餘時間、必要勞動、必要時間、勞動力價值、剩餘價值規律、平均利潤及其規律、剩餘利潤及地租規律、競爭與生產無政府狀態的規律、危機等等。當然，與現代壟斷資本相關連的壟斷價格、各種壟斷企業組織形態、總危機、現代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等也包括在內。所有這些構成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的範疇和規律，都是把生產資料私有制作爲其存在的客觀基礎。當我們學習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時候，當我們接觸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工資問題、企業利潤問題、企業組織形式問題、以及集體農莊市場競買競賣的問題的時候，只要我們隨時都把握着社會主義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爲基礎，明確認識生產資料不是資本，勞動力不是商品，誰也不能利用旁人的勞動力來榨取利潤；那末，這一類型的範疇和規律，就會隨着資本主義而消失，不致再混淆我們的認識了。

第二個類型，就是那些與社會主義本質密切聯系，只有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下才能取得存在依據的經濟範疇和規律，如像計劃經濟、集體農莊、勞動競賽、按勞計酬、經濟核算、週轉稅、平衡表、計劃價格……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等等。當我們接觸到這些範疇和規律的時候，是應當可以擺脫有關資本主義經濟概念的束縛和混淆的，但在實際上，仍恐難得完全避免「貌爲比附」的影響。把壟斷資本的統制經濟概念，拿來朦糊計劃經濟的實質；把僞裝的「勞動價格」範疇，拿來比附按勞計

㊀ 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七二—三頁。

㊁ 參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人民出版社版，第三二頁。

酬原則，把各種加强勞動、加强剝削的方式，拿來混淆勞動競賽的眞實意義；以及把資本主義的各種各色的企業管理技術、管理方法、偷運到經濟核算範疇裏面……等等，這都是沒有好好分析社會本質的皮相看法和技術觀點，時常容易發生的毛病。所謂「魚目混珠」，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是我們帶着資本主義概念來觀察那些僅僅存在於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下的經濟現象時，所應當引爲鑑戒的。

第三個類型，就是那些與一切社會形態的經濟生活相聯系，而採取了普遍的一般的共同形式的經濟範疇和規律，如像勞動過程、勞動力、生產、生產力、生產關係、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規律等等。那都是我們在學習有關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時候非常熟悉的。但是，同是以一定勞動力推動一定勞動工具，在某種勞動對象上創造使用價值，使適於滿足人類需要的勞動過程，在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就由這一般抽象的規定的具體化，而立即現出了不同的內容和本質；在勞動力作爲商品出賣給資本家，由資本家當作使用價值來支配消耗的社會條件下，勞動過程必然會變爲價值增殖過程，變爲剩餘價值生產過程。而在生產資料不復成爲私有財產，勞動力不復成爲賣買對象的社會主義經濟條件下，勞動過程也就不再是剩餘價值生產過程了。單就「生產力」這個範疇來講罷，斯大林會在他的經典著作「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中，明確指示了它在生產或生產方式中的一般特徵，可是作爲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就比在資本主義社會要顯得更生動更有更新的作用，那不但從構成它的重要因素「勞動力」的性質說是如此，就是從生產工具方面說，也可以達出同樣的結論。因爲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工具更爲它的使用者所愛惜所改進，並還有必要與可能做更迅速的更新、更合乎質量的配備。不過，當我們這樣考慮生產力在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不同作用的時候，尤其不要忘記了生產關係在後一社會對於生產力的可能最大適合性；儘管生產關係落後於生產力的傾向是存在的，非對抗性的矛盾是存在的，但作爲這生產方式的基礎的公有制的特點，能够很快就把那傾向改變過來，把那種矛盾克服過來。這都是非從一般去發現其特質不可的。

最後第四個類型，就是那些與商品生產密切聯系着，由於社會主義特殊商品生產形態的存在而還保有一般通行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形式或外殼的經濟範疇和規律，如商品、價值、貨幣、價格、工資、企業利潤、成本、利息、貿易、銀行、國民收入、價值規律、供需規律、貨幣流動規律……等等。所有這些範疇和規律，儘管已在不同程度上出現和作用於前資本主義諸社會，但那却無疑是存在於所謂自然經濟的孔隙中，而不像在資本主義社會那樣成爲最一般最顯著、每日每時都反覆活動着作用着的經濟現象。因此，這一類型的經濟範疇和規律，就和我在前面第一類型裏面指出的直接體現着資本主義社會本質的範疇和規律，連同構成了資本主義經濟生活中的息息相通的基本內容，但一到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爲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消滅了，它們之間的本質的區別，就立即呈現出來。即是說，到了這樣的場合，到了資本家的商品生產消滅了，而沒有資本家參加的商品生產却還存在着的場合，儘管第一類型的經濟範疇和規律跟着消失了，而我們現在所談的第四類型的範疇和規律，則有的仍舊保有原來的形式和外殼，有的仍舊在一定限度內發生作用，雖然在內容和作用的範圍與性質上，是不大相同的。我們研究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最難得從資本主義的經濟概念得到解脫的，就是關於這個類型的範疇和規律。幸而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不但教導我們從生產資料所有形態去區別它們的內容和性質，並還教導我們從生產資料所有形態去區別他們所能取得存在和作用的範圍，比如，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這些範疇：在生產資料公有的社會主義社會，商品生產的活動只限於個人消費品；而價值規律發生作用的範圍，也就受到了嚴格的限制了。

上述四個類型的經濟範疇和規律，歸根結底，都是要從生產資料所有形態去區別它們的本質和內容的。我們研究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對於那些專屬於資本主義的經濟範疇和規律，和專屬於社會主義的經濟範疇和規律，一般是比較容易判別，或者是比較不容易混淆我們的認識的；就是通用於一切社會形態的一般經濟範疇和規律，稍微仔細加以分析，也不難瞭解；最難得讓我們透徹理解和清楚辨別的，是第四個類型的經濟範疇和規律，因爲它們不但是直接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沿襲下來，並還在我們經濟生活和以往學習過程中打下了相當堅實的基礎。但是，只要我們在學習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時候，不憚反覆地從社會本質、從社會生產關係這個出發點，來認清：任何經濟範疇只是特定社會生產關係的某一側面的理論表現，那麼，我們就不但容易從習慣的資本主義概念解脫出來，而且還能够藉着這樣的歷史地比較觀察，來增進我們的認識。

還有值得提到的一點，就是，學習和我們日常經濟生活非常隔膜的經濟理論，那些理論就極容易變爲教條，從而也就極容易矇糊它的歷史性格。我們今天學習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比之我們過去學習資本主義部分的政治經濟學，是有不少便利的。在我們的實際經濟生活中，社會主義的成分，已經佔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並還在不斷增大其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和決定的影響。這就不但使我們的認識可以經常在實踐中得到檢證，並且過渡時期的經濟實踐——社會主義建設和資本主義經濟成分改造的實踐，在不斷要求我們從理論上明確社會主義經濟範疇規律和資本主義經濟範疇規律的涵義及其作用的本質區別。

論明清之際的社會、階級關係和啓蒙思潮的特點

侯外廬

一

中國思想史有一個優良傳統。每到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隨着社會歷史的變化和發展，思潮有了轉向和進步，這個階段的中國哲人便做出他們自己時代所能做的總結。春秋戰國之際，孔子、墨子做過三代先王的總結。戰國末到秦漢之際，荀子的「非十二子」等篇、莊子的「天下篇」、韓非子的「顯學篇」、商君書的「開塞篇」、以及「史記」的論六家要指，做過戰國以前思想的總結。漢魏之際，馬融、鄭玄做過兩漢經學的總結。晉末南北朝，如「世說新語」做過玄學的總結。明清之際，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傅山、唐甄等從各種不同的學術角度，做過道學的總結，而尤其以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和王夫之的各種史論，系統地總結歷代或宋、元、明的思想，爲更具有歷史價值。

中國思想史上的每一次的總結，不但批判了過去的傳統思想，而且發揚出另一時代的新的端緒。因此，思想史上的總結常居於時代發展的轉折點，而自成一個劃時期的段落。我們研究明、清之際的思潮，並不是由思想史的總結來看社會，相反，是由社會形態的發展來研究思想。如果這時不是如黃宗羲所講的「天崩地解」的時代，也就沒有王夫之所講的「六經責我開生面」的思潮。我們要注意的問題就是：十七世紀的中國思想家們究竟處在什麼樣的「天崩地解」的時代，而他們「別開生面」的批判的思想究竟是屬於什麼樣的潮流。

二

馬克思說：「世界商業與世界市場是在十六世紀開始資本的近代生活史的。」㊀這時中國也有了資本主義的萌芽，中國的歷史已經處於封建解體的緩慢過程之中。這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着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㊁當資本主義萌芽在中國封建社會孕育的過程中，城市對農村的矛盾、貨幣經濟對自然經濟的矛盾，以及手工業從農業中分離的矛盾，總括言之，個體經濟的自由經營對由法律固定下來的封建特權所依存的土地佔有制之間的矛盾，暴露出來。

封建社會的解體，特別是土地佔有關係的解體，並不是順利地就可能讓位於新的生產方式，正如列寧所說：「中世紀的土地佔有關係不是一下子可以取消的，而是慢慢地適應於資本主義。」同時另一方面，歷史的發展也有轉折點，好像在漫長的黑夜裏有黎明前的黑暗。

那麼，中國歷史上的資本主義萌芽究竟以什麼時代爲轉折點呢？我們以爲應以明嘉靖到萬曆年間，即十六世紀中葉至十七世紀初葉，爲轉折最顯著的階段。「天下郡國利病書」引「歙縣風土論」說：

> 國家厚澤深仁，重熙累洽，至於弘治，蓄纍除矣。平時家給人足，居則有室，佃則有田，薪則有山，蠶則有圃，催科不擾，盜賊不生，婚嫁依時，閭閻安堵，婦人紡績，男子桑蓬，臧獲服勞，比隣敦睦。……尋至正德末嘉靖初，則稍異矣。田賈既多，土田不重。操資交逮，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毀。東家已富，西家自貧。高下失均，錙銖共蓬。互相凌爭，各相張皇。於是詐僞萌矣，訐爭起矣，芬華朵矣，靡汰臻矣。……迨至嘉靖末、隆慶間，則尤異矣。末富居多，本富盡少。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起者獨雄，落者群易。貧愛有屬，產自無恒。貿易紛紜，誅求剝蝕。奸豪變亂，互猾侵沒。……迄今三十餘年（隆慶後三十餘年，正當萬曆三十年左右，十七世紀的初年——引者）則復異矣。富者百人而一，貧者十人而九。貧者既不能敵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錢神卓地，貪猾國蠹，骨肉相殘。受辱於身，不堪暴殄。

顧炎武的這一段描述，典型地說明了嘉靖至萬曆年間的歷史變革性的轉折步驟，值得我們重視。從這裏，我們看到資本的生活史從「末富（工商）居多，本富（土地）盡少」到「富者百人而一，貧者十人而九」的情況，可以看到金錢貨幣和商業關係的情況，可以看到財產集中和階級分化的情況。

㊀「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四九頁。

㊁「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三月第一版，第五九六頁。

城市手工業是逐漸在規模上擴展着，例如以蘇州的紡織業來說，「吳江縣志」卷三八就記載着發展的過程的轉折點的跡象，「至明熙宣間，邑民始漸事機絲，猶往往雇郡人織挽。成弘以後，土人亦有精其業者，相沿成俗。於是（按當在正、嘉之際），……居民悉逐綾綢之利。有力者（始）雇人織挽，貧（者仍）皆自織。」從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開始分離，經過手工業的獨立「成俗」，以至產生了城市的「有力者」（資本家前身）和僱傭勞動者以及手工業作坊，是有過程的，但就在最後，手工業還是和農村不完全分離（所謂貧者皆自織）。江南市鎮人口的集中，也是從嘉靖間逐漸增長着，「震澤縣志」、張瀚「松窗夢語」都有這樣的記載。

我們應分別從下列幾方面來論證這一時期社會內部的新舊矛盾。

第一、爲了究明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在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變化，我們需要考察中國土地所有關係的形式以及其在解體過程中的若干變化。

一、中國中央專制主義依存於土地的皇族所有制以及豪族的土地佔有制。馬克思指出東方國家的「主權就是在全國範圍內集中的土地所有權」㊀。列寧指出「亞洲式專制政府中的官吏底意志分配於農民的舊有份地」，是「古老式的土地所有權形式」㊁，這正符合於中國歷史的特點。

由漢代至開元天寶之際，土地國有制形式採取了對勞動力的軍事的政治的編制形態，例如屯田、營田、墾田、草田、公田、官田，中經占田以至均田、露田，都是這一制度的不同名稱。其間墾田、屯田的形式是在中古歷史上都存在過的。對於勞動力採用軍事的政治的編制形態之所以必要，是由於「在中世紀，農民的經營（特別是在空地墾殖上），……到處都佔支配的地位」㊂，也即由於封建領主「依存於他的臣屬的人數」㊃。這種土地所有制的形成，一方面由於承襲了古代土地國有（氏族貴族所有）的傳習，他方面由於封建制度的組織大都適應着野蠻的軍事組織（恩格斯論羅馬帝國的滅亡和封建因素的形成就着重指出了這一點）。中國在這一時期，土地國有制形式正是在對內對外戰爭環境中發展起來的，而且如北魏至隋唐的均田制形式更是在落後民族入侵以後發展起來的。這和歐洲中古史中野蠻民族的軍事組織影響於封建的所有制形式相比較，其形態不同，而其性質相似。

二、中國封建社會的土地國有制不是單一的封建佔有關係，和它相並存在的還有豪族的土地佔有制形式，史稱「豪强兼併，武斷鄉曲」，就是這一佔有關係。這關係的形成，一方面是以古代社會的世族做了它的前身，在奴隸制不能適應歷史發展之下，世族階級便轉化爲豪族階級；他方面又由於中國農村公社的殘餘以及北方落後的游牧民族的入侵，加强了列寧指的「這種身分性的地主」階級的制度。列寧說：「中世紀的土地佔有制底麗雜性，是在阻礙着經濟的發展，身分的體制是在妨礙着商業的流轉；舊的土地佔有制與新的經營底不相適應，是在產生着尖銳的矛盾。」㊄因此，身分的體制之下的豪族地主，成了中國歷史上被責斥的對象。他們和皇族地主是矛盾的，但也是妥協的，其間鬥爭和聯合的形式，各代也有些不同。這所謂聯合的形式，都和馬克思指的近代「自耕農民的自由小土地所有制形態」㊅是對立的。歷代統治階級的內部鬥爭，也是從這裏出發。

三、開元天寶至明代，土地國有制採取了對勞動力的經濟的經營方式（莊園），以適應土地大量開發以後的經濟的發展和勞動人口已經具有熟練勞動技術的發展。所謂皇田、官田、皇莊、官莊，歷經唐、宋、元、明一直在集中，至明代則變本加厲，「州郡之內，官田十居其三」，蘇常官田達於十五分之十四。這是一方面。此外，因了南方經濟的發展，對外貿易的增進，中唐以後，在皇族地主與豪族地主之外，產生出並發育出土地私有制的庶族地主，史稱寒族或素族，即非身分的地主。這樣的地主，在宋明以來有迅速發展的趨勢。因此，唐代如牛李黨爭，如楊炎、元載和劉晏、盧杞的黨爭，宋代如王安石新黨和舊黨的黨爭，都應從庶族地主和豪族地主的矛盾的背景去說明，他們都和皇族地主相配合成爲三角鬥爭的形勢。如果說楊炎不以身分爲別而以「貧富爲差」的兩稅制開始結束前一階段的國家地租形態的租調制的剝削形式，則明代的「一條鞭」法開始結束後一階段的國家地租形態的二稅制的剝削形式，更適應歷史的發展，轉向具有在最大限度上減輕封建依存的財產稅形式的新的剝削制度。到了清代，「更名田」的辦法「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辦法，「攤丁入地」的辦法，更貫徹了「一條鞭」法的精神，一方面，給予土地私有制以一定的刺激作用（「大清會典」說：「前明分給各藩之地，國朝編入所在州縣，與民田一體給民爲業，曰更名田」），另一方面，更明確了財產稅的性質。

四、明中葉後，土地私有的發展，是適應着商品經濟的發展的，特別是在

㊀「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〇三二頁。

㊁「社會民主黨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第一次俄國革命中的土地綱領」，第二章。

㊂「反杜林論」，三聯書店一九五一年版，第二二〇頁。

㊃「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九〇六頁。

㊄「十九世紀末期俄國底土地問題」，見「列寧文集」，第三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八〇頁。

㊅「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〇五三頁。

浙海和長江流域以及贛水流域的廣大的三角地區（「明會要」引明政統宗，「嘉靖元年八月令廣東江西貨物納稅，自北而南者於南安，自南而北者於南雄」）。這和列寧論俄國的情況是相似的，「土地佔有的非身分性是在增長着。……因之，農民日益分化出了一種社會分子，他們轉變爲土地私有者了。這是一般的事實。以後在分析農民經濟時，我們一定要揭開產生這種分化的社會經濟機構。現在我們須要確切地確定，俄國土地私有制底發展，即在於由身分性之轉變爲非身分性。」㊀列寧所說的這種變化的本身就表示資本主義經營的傾向。在俄國十九世紀，據列寧的分析，「貴族封建的或貴族底農奴的地產，還繼續包含着全部私有土地底一大部分，但是發展的傾向，却是明顯地走向資產階級的土地佔有制的創立。……用錢買得的私有土地，則在增加着。土地底權力日漸衰微，而貨幣底權力則日在增長着。土地日益捲入於商業流通中了。」㊁在中國的十六、七世紀，雖然沒有俄國十九世紀末期的這樣變化程度，但性質上是相類似的。一方面，土地皇族所有的集中情況，如上文所指出的，是空前的，但這集中是依靠了「監督」來實行的。另一方面，私有土地也在迅速地發展着，過去豪族地主已經在土地商業化的過程中受了一定的打擊。皇族大地產與土地私有的鬥爭也日益尖銳，這就反映了皇族的土地獨佔和土地商業化的矛盾。

關於土地私有的發展以及經營地主的勢力，在明代特別是在明末，史料的記載是很多的。例如葉夢珠輯「閱世編」卷一「田產」說到非身分性的有心計之家的私有情況：「有心計之家，乘機廣收，遂有一戶而連數萬畝，次則三、四、五萬至一、二萬者，亦田產之一變也」。朱國楨「湧幢小品」說到非身分性的白手起家的私有情況：「余目所經見，（吳江）二十里內有起白手致萬金者兩家，此水利築隄所以當講也。」汪道崑「太函集」卷四七說到非身分性的居士的財產私有情況：「吳處士……三年而聚，三年而穰，居二十年，居士自致鉅萬……庶幾埒都君」。顧亭林「日知錄」卷十，曾拿漢唐時代的情況和明代的情況相比較，以爲漢代的豪族地主當明代經營「分租」的地主，唐代的兼併之家當明代「包租」的經營地主，說明私有土地的發展。史料常見地主經營的方式，甚至「窮天極地而盡人」，以達到「貲日益」的目的。

木棉桑麻的農業生產，也向私有經營方面發展，例如「湖（州）俗以桑爲業，而（茅）處士治生產，喜種桑，則種桑萬餘唐家村上」㊂；「南陽李義卿……家有廣地千畝，歲植棉花，收後載往湖湘間貨之。」㊃因此，農業生產物參與了國內市場的流通，「吉貝則汎舟而粥諸南，布則汎舟而粥諸北。」㊄

第二、我們再從手工業和商業，來考察十六、七世紀中國封建社會解體過程中的資本主義的萌芽。

一、根據馬克思的分析，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結合，是東方封建社會生產方式的廣泛的基礎。他說：「在印度和中國，生產方式的廣闊基礎，是由小農業和家內工業的統一形成的。在印度，還有以土地共有爲基礎的村落共同體的形態；並且在中國這也是原始的形態。……由農業與製造業直接結合引起的巨大經濟和時間節省，在這裏，對於大工業的生產物，提出了極頑强的反抗。」㊅

這一精確的理論，從中國封建社會史的「食貨」二字的連稱，即可以典型地證明。食指農業，貨指手工業，所謂「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㊆。共在唐代，又集中地如「唐六典」所說：「肆力耕桑爲農」，「錢帛之屬謂之貨」。這就是歷代所說的「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農夫紅女」的自然勞動分工。他們的勞動在極大的程度上表現出經濟和時間的節省，强固地束縛着自然經濟的經營方式。租（農產物）調（手工產品）的和兩稅（農產物和手工產品分季交納）的剝削制都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

二、村落共同體或家族公社，不但和皇族地主以及豪族地主有血緣關係，而且成爲專制主義的基礎。馬克思說：「那些家族公社是奠基在家庭手工業上，在手織業、手紡業和用手進行的農業底特殊的結合上，這種結合使它們都能自給自足。……這些淳樸的村社不管外表上看起來怎樣無害於人，却始終一直是東方專制制度的堅固基礎。」㊇恩格斯和列寧也都有過這樣的分析。

這就是中國封建社會和自然經濟相聯繫着的家族、鄉曲、鄉里的組織，從漢末的「部曲宗族」起，勞動組織都和農村公社的組織緊密地依靠在一起，唐代白居易的「朱陳村」一詩形容這種情形最爲典型。宋代人還對於「譜系不具，義分不聯，貧富異居，耕商異業，流居寓處，久漸睽疎」，以爲是壞的現象。皇族土地所有制和豪族土地佔有制的形式，實以這種公社的小農制爲基礎。通過了列寧所說的「警察式的官僚的方法」，這種封建經濟更加鞏固起來。中國歷代的閭伍、三長以及鄉社或保甲的制度就和土地租稅的剝削關係相互聯鎖着，沒有三長制就難統治均田制之下的「匹夫匹婦」，沒有保甲法就難統治二稅制之下的「各色人戶」，沒有鄉里公社的所謂「田里」和「桑梓」的組

㊀「十九世紀末期俄國底土地問題」，見「列寧文集」，第三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三—四頁。

㊁同前引書，第四頁。

㊂唐順之：「荆州集」，卷十六。

㊃張履祥：「近古錄」，卷一。

㊄徐光啓：「農政全書」。

㊅「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四一二—三頁。

㊆見「漢書：藝文志」。

㊇「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見「馬克思論印度」，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三頁。

織，就難鞏固住豪强地主的統治。列寧說：「農村公社的外表上的均平性只是隱蔽了公社內部分配的巨大的不平衡。」豪族地主就是建立在這樣的不平衡上面的。被宗法所維繫的地方獨立性及其血緣的關聯性，從全國統治權來講，正成爲專制主義的基礎。依據這樣的基礎，我們可以考察歷代的農民戰爭。據恩格斯分析，農村公社曾經起過這樣作用，使農民戰爭的起義規模擴大，這是一方面；同時另一方面，鎭壓農民戰爭的地主武裝，從統治階級絞殺赤眉、黃巾以至太平天國一系列的運動看來，也是利用了宗法公社的組織編製，以分化農民的隊伍，劉秀、曹操以至曾國藩的地主武裝的組織都不是偶然的。

三、中國的歷史，從十六世紀以來，沒有如歐洲走向資本主義社會，然而這不等於說，中國封建社會沒有解體過程，沒有資本主義的形成過程。關鍵在於，既在封建社會的母胎內產生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形態，又在發展過程中未能走進近代的資本主義世界，這即是如馬克思說的，既爲舊的所苦，又爲新的發展不足所苦，死的抓住活的㊀。資本主義要排斥身分性的人格依附，然而封建主義的頑强傳統又要維持這樣的人格依附。這就是問題，這就是矛盾。我們對於從明代以來的這種新舊矛盾，既不能割斷歷史，否定中國封建社會內部的頑强傳統的歷史，如上面所述的，又不能忽視歷史發展的客觀條件，否定資本主義的形成過程。

資本的形成是從商人的和高利貸的財富出發的，然而問題却以自由勞動者從農業的分離爲前提。這樣的分離過程，依據列寧的分析，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農業勞動和手工業勞動在農村市鎭中的分離；第二階段是城市手工工場業的獨立形成；第三階段是城市的大工業的出現。相應着這樣的階段，逐漸形成着以至建立着國內市場，逐漸由資產階級前身的市民發展而爲近代資本家，逐漸由農村分離的手工業無產者發展而爲近代的自由勞動者。我們的研究，認爲十六、七世紀的中國社會，正是居於由第一階段向第二階段的發展時期，更正確地講來，因了國內經濟的不平衡，某些地區居於第一階段，某些地區正走進第二階段，某些地區依然沒有走進第一階段。

四、城市手工業的形成，開始總是和農村手工業的分化相伴着的，例如在松江的紡織業，「紡織不止鄉落，雖城中亦然。里媼晨起抱紗入市，易木棉以歸，明旦抱紗以出。……織者率日成一疋。」㊁在農業和手工業的緩慢的分離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城市手工業，「前明數百家布局皆在松江楓涇」㊂。因此，商業資本也發展起來，「松江舊無暑襪店，……萬曆以來，……郡治西郊廣開暑襪店百餘家，合郡男女皆以做襪爲生，從店中給籌取値，亦便民新務。」㊃

「古今圖書集成」記載明代蘇州城市的發達，當是概括說明後期的情況，如說「城市（蘇州）……居民大半工技」，「工匠各有專能，匹有常主，計日受値」。這是手工業作坊和僱傭勞動者的說明。然而，當時這種僱傭性質却具有工役制的束縛。工役制即農奴制在農業和手工業上的殘餘方式。列寧說：「以工役制爲方式的農奴制度，乃是經濟發展底阻礙，乃是……東方專制主義形態的源泉。」㊄這在蘇州不但表現爲官有手工業方面的服役制度，而且也表現爲私人手工業方面的剝削形式。如說「蘇州織工延頸而待傭用」，如說「什百爲羣，延頸而望，如流民相聚，粥後散歸，若機房工作減，此輩衣食無着矣，每橋有行頭分遣。」㊅蘇州情況如此，其他地區的手工業也有衣食於主人的人格依賴的情況，如錢塘織工，「有饒於財者，率居工以織，每夜至二鼓，一唱衆和，……蓋織工也。……蒼然無神色。……工曰、吾業雖賤，日傭爲錢工百緡，吾衣食於主人，而以日之所入，養吾父母妻子。」㊆

蘇州手工業到了萬曆時代的規模是這樣的：「染房罷而染工散者數千人，機房罷而織工散者又數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㊇這樣看來，蘇州在十六世紀末，已經至少有萬人左右的工人。「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相依爲命」㊈，這樣看來，資本主義的手工工場業是在形成之中。

據上瑯張瀚的記載，他所說的張家的資本的發展是和江南都市的發展相適應的。張家起家稍早，但發展成爲兄弟「各富數千金」，却在十六世紀的嘉靖時代。明代說部「醒世恆言」記載的江南盛澤鎭的絲織業情況也是指着嘉靖時代，有一個施姓戶主，積累了數千金的資本，有四十張紬機的手工工場。

大抵在嘉靖間長江三角洲一帶如蘇、杭、湖、松諸府成了國內市場的一個中心區域，張瀚所謂「總覽市利，大抵東南之利莫大於羅綺絹紵，而三吳爲最。……今三吳之以機杼致富者尤衆」。「明實錄」也說到嘉靖以後江南富室積銀至數十萬兩者頗多，其他史料記載有因機織而致富至百萬兩的。

在中國的沿海，長江和江西的大三角地帶，次於長江三角洲，也有一定程

㊀ 參看「資本論」序言。

㊁ 「古今圖書集成」，第六九〇卷。

㊂ 顧公燮：「消夏閒記摘鈔」。

㊃ 范濂雲：「閒居日抄」。

㊄ 見「十九世紀末期俄國底土地問題」，並參看「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有關分析工役制的部分。

㊅ 「古今圖書集成」，卷十、卷六七六。

㊆ 徐一夔：「始平稿」，卷一。

㊇ 「明實錄」，卷三六一。

㊈ 同前引書。

度的資本主義的萌芽，如「天工開物」所記載的景德鎮的磁業分工情形和「陶冶圖說」所記載的該鎮的發展情況，如「古今圖書集成」所記載的沿海城市的發展情況，如屈大均「廣東新語」所記載的冶鐵手工業的技術和分工，所謂「佛山之冶通天下」，都是實例。但一般說來，當時中國的城市手工業的發展情況，是不平衡的。

五、隨着城市手工業的形成以及農村手工業的分化，在徵物的二稅制之下，貨幣地租逐漸發展起來，這也是經過嘉靖到萬曆年間才有了成文式的規定。私人地主方面也逐漸採用貨幣地租的工值。城市鄉村銀貨幣逐漸從死藏，進入流通的蒸溜器之中。雖然布帛在交易中、在賞賜中仍佔居一定的地位，但錢莊業專門行業特別在嘉靖以後，却發展起來；雖然金銀壟斷於官僚太監手中，但另一方面也表示了所謂「上下求銀」的現象。

第三、商業資本也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對南洋、俄國以及日本的貿易的開展，而活躍起來。特別在嘉靖以後至隆慶時代，不但沿海蘇、浙、閩、粵的商人資本有了規模較大的國際和國內的經營組織，而且內地如川、陝、晉、贛、徽、越的商人資本也參與着貿易活動。國內貿易方面，如「農政全書」引隆慶時代的史料說：「東南之機，三吳、閩、越最夥，取給於湖廣；西北之機，潞最工，取給於閩廣。」萬曆時代張瀚說：「賈人之趨利者，不西入川則南走粵，以其利或當五、或當十，或至倍蓰無算也。」㊀國外貿易方面，如「天下郡國利病書」講的閩人的海外貿易，其他史料所詳載的「下番致富」的商業活動。「海澄縣志」說：「饒心計者，視波濤爲阡陌，倚帆檣爲耒耜。蓋富家以財，貧人以軀，輸中華之產，馳異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在資本主義萌芽的初期，商人是探險事業的投機家，中國史書上叫做「海賊」。這所謂「海賊」，也是和當時歷史發展相適應，是嘉靖年間在泉漳等地區開始發展起來的㊁。

商人資本的活動對於舊的生產方式是具有分解作用的，但舊生產方式內部的堅固性，也對於商業的分解，起着一種障礙作用。因此，馬克思指出，前人把亞洲的商業範圍和意義估計得過低，後來的人又把這些範圍和意義，估計得過高㊂。明代的商業資本正要從它的分解作用和阻礙它的分解因素來考察的。

上面我們說到明代商業的發展是起了分解作用的，然而商人又脫離不了舊的生產方式的約束。其矛盾表現在：（一）它和農業的經營依然結合着，特別是季節性的商業活動。（二）它和農村公社的家族組織相結合，特別在沿海商業最繁榮的地區，這種形式更表現的突出，因此，商人不少是以某些巨姓爲首而舉族外出，復把一定的利潤再回投入他的鄉里桑梓的地產，廣東、福建、浙江的情況就是這樣，例如上舉「醒世恆言」講到某商人的活動，最後還是把他所獲得的資本投到土地上面。山西商業的情況也是這樣，華僑資本的活動也是這樣。（三）會館制度的排他性的組織，在明末商業發展的時代也逐漸形成，以致各「幫」的嚴密的樊籬妨碍了國內市場的集中。（四）官僚資本和商業高利貸的結合，妨碍了私人經營的發展，一直到清代的山西票莊還是這樣。（五）官有商業打擊私人商業的禁例，更具有嚴重的障礙的因素。凡此等等的表現，不是孤立的，而是封建舊生產方式通過各方面而產生的束縛力量。因此，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第二十章論證中國的經濟，同時指出了商業「有多大的分解作用，首先是依存於舊生產方式的堅固性和內部結構。」這又是舊的抓住活的的例證，歷史發展不是一帆風順的。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指出「資產階級撕破了家庭關係上面所籠罩着的溫情脈脈的紗幕，並把這種關係化成了單純金錢的關係」，這一關係也產生在明代，但還沒有以新的代替舊的，而是在新舊關係的矛盾中，換句話說，是在溫情脈脈的紗幕和單純的金錢關係二者交織之中。

根據上面的三點歷史分析看來，一方面，十六、七世紀的土地所有制，雖然向國有方面集中，但另一方面，私人對土地的經營也在發展着；一方面，官有手工業雖然大量被皇族所「監督」着，形成官僚機關的層層中飽，產生了財政困難的嚴重局面，但另一方面，城市私有手工業的發展却嚴重地影響着國民經濟。同時，城市商業與對外商業的發展，更啓發了私有制的鬥爭。這樣，歷史面臨着變革的關頭。貨幣用銀的逐漸普遍，說明了商品經濟關係的增進。手工業開始擺脫對農業的依賴，即逐漸打破那亞洲式的「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的結合」底特殊形態。「一條鞭」法的出現，逐漸打破所謂「農桑」、「耕織」的男女分工的生產束縛，逐漸代替着所謂「兩稅」、「二稅」分類分期式的對手工業產品與農產物兼徵的剝削制。歷史進入了新舊因素的矛盾大大發展的局面，活的東西要衝破死的，而死的東西還在束縛着活的。嘉靖到萬曆的年代，正處在這樣歷史變化的轉折點途程之中。

三

在封建社會解體過程和資本主義萌芽的期間，經濟狀況起了變化，因而階級關係也起了變化。這裏，我們就要着重地分析一下當時的階級關係。

我們不要機械地找尋資產階級的前驅，也不要望文生義地附會市民，因爲

㊀ 張瀚：「嘗菴雜談」。
㊁ 參看「天下郡國利病書」，第三八、三九册。
㊂ 參看「資本論」，第三卷，第四篇。

資產階級的前輩是從中古社會萌芽的，其歷史也是很長遠的。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說，「從中世紀的農奴中間產生了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從這個市民等級中間發育了最初的資產階級分子的形成有一個長久的過程。

同書又說，「中世紀的市民等級和小農等級是現代資產階級的前輩」。這樣看來，城市中的各種市民等級和農村中的各種小農等級，都具有資產階級前輩的資格。在他們的轉變過程中又有着極複雜的情況，其轉變的具體路徑，各國也不可能完全相同。

恩格斯說：「十六世紀初葉，帝國各種不同的集團——即諸侯、貴族、僧侶、閥閱之家、中等階級、平民和農民，構成最複雜的羣衆，他們有極端龐雜而且相互交錯的要求。」㊀恩格斯對當時德國的市民等級的階級區劃，大體上分做三大集團或營壘，即城市的豪貴集團、城市中等階級的改良集團和城市平民的集團。依此，從階級的代表性上講來，第一集團也包括於地主階級反對派之中，第二和第三集團又形成了反對第一集團的人物，即中等階級的反對派（以城市爲主，即近代自由主義的先輩人物）與平民反對派（即近代資產階級的先行人物）。從思想意識的代表性上講來，反對派分做城市中等階級的反對派異端與城市平民反對派異端。此外，還有農民反對派異端（如孟彩爾）。中國的十七世紀的反抗運動，不可能和德國十六世紀的情況完全一樣，但我們認爲像在長江流域以無錫爲中心的東林黨的運動，就具有中等階級的城市反對派的代表性（包括上書指的其中構成分子如「富裕的中等階級、溫和的中等階級，以及按照地方情形多少有點差異的較貧分子」）；像長江流域和其他地區的市民暴動，是含有平民反對派的性質（包括上書指的其中構成分子如「中等階級的破產分子和無公民權利的城市居民羣衆，如手工業工人、日工和流氓無產階級的各種萌芽」）。在明末，後者和農民聯合的要求，即類似於平民和農民的聯合反對派。

明代的市民運動最初表現出來的是「盜礦」、反礦官的鬥爭。早期如英宗時代葉宗留等領導的有名的「盜礦」鬥爭㊁，其後如弘治間廣東歸善縣唐大鬟反對鐵冶管制的暴動㊂，更後如嘉靖間「浙江、江西盜礦者且刼徽、寧」的鬥爭㊃。這些反抗運動大抵是和農民運動相聯繫着。

大規模的市民運動是嘉靖以後特別是萬曆時代的城市工商業者和手工業工人的反抗運動。這種市民運動和嘉靖以至萬曆的城市經濟的發展是相適應的。其中如萬曆廿七年（一五九九）臨清的「罷市」暴動㊄，荆州市民的反陳奉暴動，萬曆廿九年（一六〇一）有名的蘇州織工反孫隆的大暴動㊅，萬曆三十年（一六〇二）景德鎮市民反抗礦監的暴動㊆，萬曆三十九年（一六一一）武昌等地市民繼續反陳奉的暴動㊇，這些史書所謂的「市民」，其構成分子，是城市平民反對派集團。

到了天啓年間（一六二一——二七）發生了城市中等階級反對派的運動。封建統治者鎮壓自由講學自由結社，「一切書院盡行拆毀，變價入官」，有名的東林黨六君子獄就在這時發生。然而嚴重的問題更在於引起了「士民」的反抗運動，如統治者罵的「引類呼朋」的楊漣被逮，「都城士民數萬，擁道攀號，爭欲碎官旂而奪公」㊈，如周順昌就逮，「士民夾道」而抗議，「郡中士民，送者數萬」，「百姓執香伏地，呼號之聲如奔雷瀉川」㊉。此外魏大忠、李應昇就逮，都有所謂「士民」的暴動。黃尊素被逮後，錦衣「凌轢市民，一人倡袒呼曰，是何得縱。一招而擊者雲集，遂沉其舟，焚其衣冠，所得輜重，悉投之河」㊀㊁。起義的地點正是在手工業發達的蘇州、常州、吳州等地。這些史書所謂的「士民」，其構成分子是中等階級的反對派集團，而東林黨人（以後爲「聯絡吳越俊秀」的復社）的爭自由或講學運動，就不僅表現出朝野的對立，而且反映了自由主義的前輩中等階級的政治要求。

明末市民運動和農民暴動是桴鼓相應的。李自成所提的口號「貴賤均田」、「不納糧」和「平買平賣」，正表現着反對封建特權及其所依存的大地產。這種鬥爭，是農民初期的民主要求。

在當時經濟發展不平衡的情況之下，規模廣闊的農民戰爭形成了推翻明代封建王朝的主力，城市的自由居民、士民以至市民的各個集團對於農民戰爭，因了各集團的不同利益，便表現出各種不同的態度，情況是複雜的。

上面所舉的第一個集團，其中不少是利用特權而兼高利貸和商人的，和歐洲十六世紀的德國相似，他們也和封建統治者是血肉相連的。這一集團首先站在農民戰爭的反對方面，策謀反動措施。

第二個集團，其中不少所謂猶帶溫情脈脈的私人商業資本家，他們既有地

㊀「德國農民戰爭」，解放社一九四九年版，第二一頁。
㊁「明史」，卷一〇。
㊂同前引書，卷八一。
㊃同前引書。
㊄「定陵注略」，卷五。
㊅「明神宗實錄」，卷三六一。
㊆同前引書，卷四一九。
㊇「定陵注略」，卷五。
㊈、㊉、㊀㊁「明季北略」，卷二。

方性的封建上層關係，又有一定的傳統特權的家族關係。他們畏懼農民戰爭，因而一般也站在農民的反對方面，不同情或打擊農民運動。明末清初代表中等階級反對派的思想家一般都從理論上主張平均土地而又反對農民暴動。

第三個集團，其中佔有多數的下層分子如手工工人，交通運輸工人、鑛工和流氓無產者，是同農民一道參加了鬥爭的，而其中少數上層分子如手工業主人却表現了動搖，背離了農民運動。一般地講來，這一集團是和農民可以形成「平民和農民的聯合反對派」。泰州學派多出身於這樣階級的人，李贄便反映出平民反對派的思想，他評點過「水滸傳」，死於非命，不過他們沒有如德國農民戰爭時代的孟彩爾那樣。

特別到了十七世紀中葉，滿清的民族壓迫和漢族反民族壓迫的鬥爭，使得民族的矛盾掩蓋了階級的矛盾，因而上面所述的那些階級集團的態度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變化。中古歷史上的民族鬥爭基本上是農民解放的鬥爭，因此，首先農民是反清運動的主力（如李自成餘部）。中等階級的集團和平民的集團，一般說來，不少也參加這一鬥爭。第一集團就有極大的分化，少部分參加反清鬥爭，大部分則和大地主大官僚結合起來形成向滿清統治者的投降集團，策劃「太平策」。在反滿的民族戰爭的期間，平民反對派形成了秘密組織的會社或會黨。在統治者所謂「江南人心浮薄」的歧視之下，民族手工業受了嚴重的打擊，滿清王朝除了軍事鎮壓之外，還採取了一系列的文化的以及政治的鎮壓政策。腐朽的封建勢力更變本加厲地爲滿清封建王朝而服務。「涇楓小志」卷十說：「康熙初，里中多布局，局中僱染匠、砑匠，皆江寧人，往來成羣，尤害閭里，『民』受其累，積憤不可遏，糾衆歛鉅資，閉里門水柵，設計憤殺，死者數百人。」這就是利用封建的宗法關係以絞殺平民反對派的典型的例子。

自然，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暴力論」中所指出的，落後民族的統治，經過一定時期，也不得不按照被征服的民族的先進經濟狀況，尋求適應的步驟，甚至改變了自己民族的語言以求適應客觀的歷史條件，但是，明清之際的民族戰爭以及落後民族的民族監獄政策，的確影響了中國歷史的發展。同時，西方資本主義的東侵，也阻礙着中國商業經濟的出路，對於中國資本主義的正常發展增加了困難。但是人民反封建的鬥爭一直是在延續着。

四

我們研究了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的中國社會的發展及其階級關係，就可以進一步分析這一不平凡的時代的思想潮流了。列寧說：「它（馬克思主義）精妙地結合着兩種特點：一方面是完全用科學冷靜態度來分析客觀情勢與客觀進化行程，另方面是極堅決地承認羣衆所表現的革命毅力，革命創造性和革命首創精神底意義，同時當然也承認那些善於探索並實現其與某些階級聯繫的個別人物、集團、組織和政黨所表現的革命毅力、革命創造性和革命首創精神底意義。馬克思非常重視人類發展中革命時期的態度是從他的全部歷史觀點總和中產生出來的，因爲他認爲由所謂和平發展時期慢慢積累起來的無數矛盾只有在這樣的時期才能得到解決。」㊀

十六世紀末以至十七世紀的中國思想家的觀點，通過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特點，經過中國社會條件的三稜鏡的相當程度的折射，不完全等同於西歐以至俄國的「資產者—啓蒙者」的觀點，然而，在相類似的歷史發展情況之下，啓蒙運動的思潮具有一般相似的規律。

首先，列寧分析俄國啓蒙運動的三個基本特點是我們學習的範例。第一，「對於農奴制度及其在經濟、社會和法律方面的一切產物滿懷着强烈的仇恨」；第二，「熱烈擁護教育、自治、自由、西歐生活方式和一般俄國全面歐化」；第三，「堅持人民羣衆底利益，主要是堅持農民底利益，……他們衷心相信農奴制度及其殘餘一經廢除就會有普遍幸福，而且衷心願意促進這一事業。」㊁自然，中國十七世紀的情況是不同於俄國的十九世紀的情況，但是啓蒙思想的性質是共通的。

第一，「新的社會經濟關係及其矛盾，當時還只是在萌芽狀態中」㊂。中國的啓蒙者如何心隱、李贄以至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和顏元等人，都從各種表現的方式，强烈地仇視農奴制度及依存於它的一切產物。他們在所謂「封建」和「郡縣」的各種歷史爭辯之中，傳播土地平均的思想，反對封建國有土地的所有制和大地產的佔有制，反對一切政治法律上的束縛，反對特權和等級制度，反對科舉制度（時文）。這一點，他們之中，有的提出了「自由私產」的主張，以李贄爲例，他說，「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後其心乃見。……如服田者私有秋之穫，而後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積倉之穫，而後治家必力。……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㊃。以顏元爲例，他說，「豈不思天地間田，宜天地間人共享之」㊄。類此主張的思想，是他們的共通特點。

第二，中國的啓蒙者擁護教育、自治和自由。如東林黨的自由結社講學的

㊀「反對抵制」，見「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一九九頁。

㊁「我們究竟拒絕什麼遺產？」，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第一八頁。

㊂同前引書，第一九—二〇頁。

㊃「藏書」，卷二。

㊄「存治編」。

主張，顧炎武等人的地方自治的主張，黃宗羲等人的教育主張，都是代表。以顧炎武爲例，他敢說「政教風俗，苟非盡善，即許庶人之議」㊀，宛轉地反對孔子「庶人不議」的教條，進而主張「天下之人皆得舉而薦之」㊁的初期民主。

關於擁護西方的生活方式，當時雖然不同於十九世紀的向西方找尋眞理的迫切，但他們已經普遍地有着這種要求。西方資本主義侵略中國的先頭部隊是西洋的教徒，他們在輸入中國的宗教中，又挾帶了一種副產物，即儒家與基督教的新格義，利瑪竇和湯若望實爲代表。李贄就和一六〇〇年到北京的利瑪竇相友善。從傳教士的醜惡的夾帶裏，同時也輸入了天文曆算以至名理的西洋文明。到了明末，所謂泰西文明便普遍地成了士大夫中間時髦的學問。明末復社四公子之一、方以智的「物理小誌」，徐光啓的「農政全書」，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梅定九的算學翻譯以及李之藻的「名理探」翻譯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初期的歐化思想。例如「名理探序」說：「日聆泰西諸賢昭事之學，其旨以盡性至命爲歸，其功則求於窮理格致。」「幾何原本」徐光啓序說：「萬象之形囿，百家之學海，…不意二千年古學廢絕後，頓獲補綴唐虞三代之闕典遺義。」

明清之際的學者們，在民族壓迫之下，表現了愛國主義的崇高思想。他們的愛國主義思想又是和世界的進步思想相關聯着。因爲在資本主義的萌芽時代，如「共產黨宣言」中所指出的「各個民族的精神活動成果，已成爲共同的享受物。民族的片面性和偏狹性日益失去立足的地位」。因此，王夫之已經說到「中國是天下的中國」，不能不驚歎西洋科學「以巧密見長」；顏元不能不呼喚科學的世界，他的弟子李塨更不能不言及仿效「西洋諸法」；顧炎武不能不說「外夷」有高於「中夏」的學問與制度；黃宗羲不能不脫出朝代更替的界限而理想和西洋制度相似的政治。李顒也說到「泰西水法」是體用全學的學問。這一系列的思維運動，都是在中國和西洋文明交接之後才產生的。因此，十七世紀的學者們已經逃出中古的思維樊籬，而作「經世致用」的橫議，在某些論點上表現出一種打破民族片面性和偏狹性的新思潮。

第三，他們同情於人民的利益，特別是同情於農民的利益，儘管他們多數是不同情於農民暴動。以黃宗羲爲例，他敢於說「工商皆本」，敢於說「關使無君，人各得自利」，「爲天下之大害者君也」，國家是「爲萬民非爲一姓」㊂，特別是他的「平均授田」的主張，更堅持着農民的利益。以唐甄爲例，他敢說「凡爲帝王皆盜賊也」，「君臣險交也」，主張「平（等）則萬物皆得其所」。他們程度不等地表現出初期民主思想。他們對於農民所受的中世紀壓迫的痛苦，無例外地表示出控訴和抗議，王夫之的「黃書、噩夢」便是代表作。

但是，他們都把他們的理想和萬年樂土或所謂「天地之道」與「百王之法」等同起來。王夫之、顏元所强調的平等制度，黃宗羲、唐甄因反君主專制所憧憬的絕對的形式平等的社會制度；顧炎武因大力宣傳「經世」的理想所自誇的「三代不易」的制度，都是例子。他們的思想對於未來的遠景懷着無限的信念和幻想。他們的思想之所以帶有濃厚的幻想，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必然要跳出近代資產階級社會的範圍，「不僅超越現在，而且超越未來的境界，必定成爲狂暴的空想。」㊃特別在古舊制度束縛甚嚴而無自由的社會，幻想更易於發生，列寧說，「某一個國家內的自由愈少，公開的階級鬥爭表現得愈薄弱，……則政治的烏托邦通常也容易發生。」同時，在封建勢力特別强固的條件之下，「幻想是弱者的命運」㊄。嘉靖以來出現的小說「西遊記」和「聊齋志異」等幻想作品，正由於這樣的歷史條件。

然而，他們是歷史的覺醒者，他們在哲學、歷史、政治、經濟和文學諸方面的「別開生面」，就不僅是反理學運動的量變，而是按他們自己的方式表現出對資本主義世界的絕對的要求，他們的這種要求都是裝璜在理論形式的返原（如人性論，泛神論，進化觀點，勞動與財產觀點等等）上面。

如列寧所指出的，他們不知道行將到來的社會矛盾，「他們看不見它（社會發展）所特有的矛盾」只看到未來的美好世界，「資產階級思想代表者，在當時並沒有表現出任何自私性，相反地，……他們完全眞誠地相信世界樂園」㊅。雖然他們各有自己的反對派的特性，但一般說來，他們都是封建社會的叛徒。十七世紀的中國啓蒙學者，還做出將來社會全面圖景的理想著作，如「天下郡國利病書」、「明夷待訪錄」、「潛書」等。然而，另一方面，在他們的眞摯的理想背後，也包含着他們的叛變的不徹底性。新生的東西既然在舊社會的母胎內是微弱的，所以在他們的理論中常保留着舊的內容，而且常顯出矛盾的體系。他們的哲學思想和他們的理想之間雖然隔着許多層環節，使人難以捉摸，但二者的聯系是存在的。這即是：「從十五世紀中葉起的整個文藝復興時代，…重新醒覺的哲學，在本質上，都是城市發展之果實，……乃是資產階級發展之結果。」㊆

㊀「日知錄：藝文篇」。
㊁「顧亭林文集」。
㊂「明夷待訪錄」。
㊃「德國農民戰爭」，解放社一九四九年版，第三一頁。
㊄見「列寧文選」兩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第八一二頁、八一三頁。
㊅「我們究竟拒絕什麼遺產？」，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第四八、二〇頁。
㊆恩格斯：「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解放社版，第八九頁。

上面我們研究了十七世紀中國啓蒙學者的基本特點，下面再從他們的各樣思想角度所表現的各種特徵來分析一下。

歷史的轉變反映於思維活動，並不是一開始就採取直接的政治形態，因爲社會矛盾是或明或暗地錯綜交織着，人類思想也就不可能深入到社會的歷史分析，通常是由自然史和自然人出發的，通常採取抽象理論返原的途徑。例如復古改制的意識，人性傾向的認識，知行先後的思想等。並且他們所代表的階級意識，也常是通過自然哲學與人性論的絕對概念體現出來。西洋的宗教改革便是這樣的。明末清初的學者們，都以各種偏頗的觀點，爲歷史的人類與人類的歷史繪出他們理想上美妙的圖譜。我們應從他們的代數學的絕對概念中來分析他們的抽象語句的背後實質，而不能直接了當地來看出他們的語言與實質之間的統一。王夫之的「易傳」哲學（如泛神論），顏元的「三物三事」的哲學（如勞動生產的世界觀），就是例子。他們的思想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的解體過程和資本主義的萌芽狀況，但他們所强調的人性概念和神學的要求，是用中古思想的方式來表現的。恩格斯說：「在資產階級爲其解放而鬥爭的第一個階段上，即從八世紀起到十七世紀末止，才採取了這一色彩……而中世紀，僅有一個思想體系的形式：宗教與神學而已。」祇有到了資產階級已經長成，這才能產生出和本階級相適應的思想體系㊀。因此，十七世紀中國學者們的思想，在長期中世紀的冬眠中，既有適應歷史發展的進步的因素，又有受傳統的思想所束縛的因素。

上面已經講過，啓蒙的歷史必然使啓蒙者的思想對過去作詛咒，並對將來作幻想，這樣的思想是不調和的。不但如此，啓蒙學者所使用的語言大都是古色古香的，他們愛好的是古代語言的形式，而想說的是近代的內容，表裏又是極不一致的。正如馬克思在「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中所指出的，十九世紀以前是語句形式重於內容的。一方面，他們過於重視古代形式，另一方面，他們的唯物論思想在觀點上却否定歷史，「在歷史領域內，也缺乏對事物的歷史的見解。……人們把中世紀視做千年來的一般野蠻狀態所招致的歷史行程中的簡單的中斷。沒有人對於中世紀幾百年間所作的大進步，如歐洲文化領域的擴大，在相互鄰居關係中形成的生氣勃勃的大民族，以及十四和十五世紀的巨大的技術進步，加以注意。因此之故，對偉大的歷史聯系之正確見解，就成爲不可能的了，歷史至多不過供哲學家用的蒐集例證和例子的彙集罷了。」㊁

十七世紀中國學者也類似於這樣。他們一方面幾乎都善於運用經學和子學的古代語言，而推崇古代世界，但另一方面，又把過去歷史和將來的歷史割裂開來。例如顏元，一方面復古之氣味無以復加，另一方面，却把過去和將來用「文墨」世界和「實物」世界間隔起來，主觀上要求「文衰而返於實」的世界。又如顧炎武，一方面高舉着人所不能懷疑的「六經之旨」，他方面又提倡着那斷絕千古的「當世之務」。再如王夫之，雖然有進化觀點，但一方面說「六經責我開生面」，他方面說「七尺從天乞活埋」，舊的和新的既和平共處，而又不共戴天。從這裏可以看出，他們的歷史觀點的幼稚正反映着資本主義萌芽階段的矛盾。

基礎之反應於思想，是通過政治、法律等間接來進行的。因此，思想意識的面貌通過十六—十八世紀的漫長時期就好像是不同的，然而「如果你在這曲綫裏描畫出它的中心軸綫，……那末，這條軸綫就益會和經濟發展的軸綫接近地平行着。」㊂啓蒙時代思想的軸綫也是和資本主義萌芽狀況的發展的軸綫相平行着的。

從另一角度來看，啓蒙學者在自然哲學方面大多具有唯物論的思想。當時的自然科學是幼稚的，他們也就不能正確地了解自然界，然而他們在眼界開擴的一定程度之下，一般地具有天才的洞察，而且常會推察到有關唯物論的眞理的粒子。例如王夫之的變革的（「性日生」的）人性論和自然進化論（「絪蘊生化」），又例如黃宗羲的「神滅」思想（推崇范縝的哲學），再如顏元的「戡天的」世界觀和以實踐爲基礎的知識論，都是有價值的遺產。同時，他們是形而上學的舊唯物論者，因此，其進化觀點是貧乏的，常陷入於循環論；其「實踐」觀點是個人的，沒有歷史的內容。他們想抓住自然界和自然人，而他們抓住的依然只是空洞的抽象的東西。恩格斯說：「舊唯物論對歷史的見解，在本質上是實用主義的，它是按照活動的動機來判斷一切的，把歷史的活動者分爲正直君子和詭詐小人。」㊃這裏所說的舊唯物論，和帝國主義時代的美國「實用主義」唯心論完全是兩回事。胡適派專門幹混淆歷史的把戲，常把中國的舊唯物論和美帝國主義的「實用主義」唯心論塗抹在一起，進行他的「媒婆」任務。我們須嚴格地把二者區別開來。十七世紀的中國學者所提倡的「經世致用」之學或實際實物實效之學，是中古絕欲思想的對立物，是進步的資產階級先輩的先進思想，他們所提倡的個人實踐的個人實質上是進步的「市民」的世界觀，而實用主義的唯心論所標榜的個人主義是代表大資產階級的腐朽的世界觀。

㊀ 恩格斯：「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解放社版，第五六頁。
㊁ 同前引書，第四六頁。
㊂ 恩格斯：「給斯特爾根堡的信」。
㊃ 「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解放社版，第七九頁。

中國的啓蒙學者之所以把個人的實踐規定於絕對的善惡標準之上，是由於歷史條件的局限。不要說顧炎武和顏元的經世思想，即像王夫之的知行論，雖然它是超越古人的傑出思想，但其中實踐概念的結論也歸結到所謂「人性存在」的君子或聖人的觀點方面。因此，在他們看來，參加社會實踐的人不是生產關係的總和，而是倫理標準之下的形式的歸納。這就走入唯心論。

爲什麼像歐洲的啓蒙哲學要回到希臘，像中國的啓蒙哲學要回到先秦呢？這自然是由於他們企圖擺脫封建統治階級的危害，不得不託古改制，但更重要的原因却在於，古代人在階級社會的各方面都產生過以後社會的胚胎形態，因而「在希臘哲學底多種多樣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後一切觀察方法底胚胎和發生。因此，如果理論的自然科學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命題發生與發展之歷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臘人那裏去。而這種了解就愈來愈爲自己開拓了道路。」㊀中國的先秦哲學也類似於這樣。中國的啓蒙學者爲了追尋自己當時的一般命題，並爲自己開拓道路，也就不自覺地回溯到古代中國的經學和子學，因爲古代哲學「在整個和大的方面……就比（中古）形而上學要正確些。」㊁從反對中古的煩瑣哲學方面來講，回到古代一事，也包含着爲了進行批判活動而選擇武器的功用。然而鑽在考據之學的牛角尖裏的所謂「漢學」自然是脫離開這個理由的。顧炎武的「理學即經學」的命題，傅山的「六經皆王制」的命題，顏元的「性命之作用爲詩書六藝」的命題，黃宗羲的「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的命題等等，都回到所謂「三代」的黃金世界，追求自己的當時的一般命題。這是進步的思想，我們應當把它和乾嘉的「漢學」區別開來。

啓蒙學者在追求一般的命題的胚胎的時候，既代表着資產階級的先輩而尋求資產階級的世界觀，但同時他們也一般地尋到原始素樸的大同理想，或者說，他們在大同理想的外衣之下而表現自己階級的要求。啓蒙時代還沒有暴露資本主義的歷史矛盾，啓蒙學者也就只「相信當代的社會發展」，「僅僅限於向改革前制度的殘餘作鬥爭」，他們「可以稱之爲歷史的樂觀主義」，他們在「願望的內容上是與資本主義所創造和發展的那些階級底利益相適應的」，他們的純眞的理想和後來的資產階級的代言人那樣僅爲本階級的利益而說謊的謬論是有極大區別的，因此，「啓蒙者沒有挑出任何一個居民階級作爲自己特別注意的對象，不僅一般地講到人民，而且甚至一般地講到民族。」㊂

在十七世紀的中國思想家的用語上也沒有特別注意到那一種居民，以王夫之爲例，他既說到「大賈富民，國之司命」，但也說到「能士者士，其次醫，次則農工商賈，各惟其力」，但對於「故家大族」和「豪猾吏」却攻擊不遺餘力。再以黃宗羲爲例，他的「工商皆本」的市民術語，也是兼包括着資本家與勞動者，但對於「罔民而收其利」的超經濟剝削也攻擊不遺餘力。

因此，他們的思想不一定都是政治的表白，好多情況表現爲文藝、哲學以至宗教的形式，間接地也具有政治運動的意義。如恩格斯所說：「在思想體系的、也許甚至在幻想的形式上，以自覺的動機方式，反映在行動的羣衆和其領袖即所謂偉大人物頭腦中的動因。」㊃

上面所講的是從啓蒙學者的主觀的理想所表現出的共同的純眞態度來分析的，然而這不等於說他們中間客觀上就沒有代表某些集團的階級傾向。相反地，他們的派別是有着區別的，「德國農民戰爭」就多從這一角度來進行分析。具體地區別十七世紀中國學者的派別是一個專門題目，不是本文的範圍所能講的。這裏祇舉一個比較例子。王夫之雖然在哲學體系上是更進步的，傅山雖然在京師敢做學生運動，但他們的思想傾向却接近於代表城市中等階級的反對派（不要誤會爲中小地主），顏元雖然在方法論上是復古的，但他的思想傾向却接近於代表城市平民反對派。他們的階級的出身是有一定的影響的，但我們分析某一派的思想不能依據階級的出身，而應依據其思想面貌的實質。

本文研究明清之際的社會關係和思想輪廓，是不够充分的，但寫作的企圖是依據這樣的教訓：「要批判它（全部思想內容），要從錯誤的但在當時的歷史發展條件下不可避免的唯心論形態中，從這個過渡形態中剝取有價值的成果。」㊄我們就是要這樣地繼承前哲的遺產。

㊀ 恩格斯：「辯證法與自然科學」，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二二二頁。

㊁ 同前引書。

㊂ 見「我們究竟拒絕什麼遺產？」，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第四八—五〇頁。

㊃ 「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解放社版，第八〇—一頁。

㊄ 恩格斯：「辯證法與自然科學」，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二六頁。

評「獨特的民族」論

官　顯

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這一天才的著作中寫道：「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㈠可見，民族是一個歷史現象，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人們的穩定的共同體，決不是偶然的湊合體。

人類和一般動物不同，它謀取生活物質資料時，是集體的協作地進行的。正如斯大林所說的：「人們和自然界鬥爭以及利用自然界來生產物質資料，並不是彼此孤立，彼此隔絕，各人單獨進行，而是以團體爲單位，以社會爲單位來共同進行的。」㈡這種「以團體爲單位」的人們共同體，是適應着人們生產要求的。隨着人們謀取生活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的發展和變更，人們的共同體亦隨之而發展和變更。在原始公社生產方式基礎上形成了氏族、部落、部落聯盟；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生產方式基礎上形成了部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礎上形成了民族。所以，「民族不是普通的歷史範疇，而是一定時代即資本主義上升時代的歷史範疇。封建制度消滅和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同時就是人們形成爲民族的過程。」㈢然而，有些同志認爲在資本主義以前已經產生了民族，斯大林給這個錯誤的論調以有力的批評，堅決認爲「在資本主義以前的時期是沒有而且也不能有民族的，因爲當時還沒有民族的經濟中心，也沒有民族的文化中心。因而還沒有那些消滅某個民族經濟的分散狀態和把這個民族歷來彼此隔絕的各個部分聯結爲一個民族整體的因素。」㈣根據斯大林的原理，前資本主義之所以不能形成民族，是由於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水平所決定的，決不是偶然的。

也許當我說到這裏時，可能有人會反駁我說：「斯大林不是說過『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民族』嗎？」對，斯大林正是這樣說的。那麼，世界上究竟有過什麼樣的民族呢？除了資產階級民族外，斯大林說：「但是世界上也還有另一種民族。這就是新式民族，即蘇維埃民族，這些民族是在俄國資本主義被推翻以後，在資產階級及其民族主義政黨被消滅以後，在蘇維埃制度確立以後，在舊式民族即資產階級民族基礎上發展和形成的。……這種民族應該評定爲社會主義民族。」㈤那就是說，除了資產階級民族外，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基礎上還形成了社會主義民族。「歷史上有過的兩種民族就是如此。」（斯大林）而前資本主義時代呢？「沒有並且也不能有民族存在。」（斯大林）這樣，所謂「前資本主義民族」的論調，就不能不徹底破產了。

民族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礎上才能形成，這是馬克思主義一般原理，「其他一切度過了封建制度階段並發展了資本主義的民族也是如此。」（斯大林）但是，馬克思主義並不認爲在同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礎上形成起來的民族，都是一模一樣的。相反的，馬克思主義認爲各民族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如斯大林在考察英吉利民族與所謂「新英吉利民族」時，指出它們雖然是同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礎上形成的民族，但它們顯然是二種不同的民族，這種相異之所以造成，是由於「不同的特別環境和生活條件」（斯大林）的結果。所以，斯大林說：「民族也和任何歷史現象一樣，是受變化法則支配的，它有自己的歷史，有自己的始末。」㈥

范文瀾同志運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研究了中國漢族何時形成爲民族的問題，並發表在一九五四年第三期「歷史研究」雜誌上。他的結論是：「漢族自秦漢以下，既不是國家分裂時期的部族，也不是資本主義時期的資產階級民族，而是在獨特的社會條件下形成的獨特的民族。」這個所謂漢族是一個「獨特的民族」的結論，不能認爲是科學的。是頗值得商榷的。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斯大林堅決反對有所謂「前資本主義民族」的說法，因爲那時還沒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因而在那時候也就沒有什麼「民族」的概念發生。范文瀾同志似乎不同意斯大林這個著名的原理，竟然在古代的秦漢時期，找出一個令人奇怪的「獨特的民族」。大家知道，氏族、部落、部落聯盟所具有的決定意義的是原始公社生產方式；部族所具有的決定意義的是奴隸制度和農奴制度生產方式；民族所具有的決定意義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

㈠「斯大林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頁。
㈡「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莫斯科中文版，第一五二頁。
㈢「斯大林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三〇〇—一頁。
㈣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四五頁。
㈤同前引書，第三四七—八頁。
㈥「斯大林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頁。

式。而范文瀾同志認爲他所說的「獨特的民族」，既非部族，也不是資產階級民族（當然不會是民族或社會主義民族）。那麼，應該說他所謂「獨特的民族」，就不是在如上述的歷史上的某種生產方式基礎上形成的，而是一個超出於歷史上諸生產方式之上的東西了，也就是說，它是一個超歷史的概念。這就不難理解：爲什麼范文瀾同志在他的論述當中，對民族所由產生的基礎——生產方式，這一決定性問題沒有加以論證的理由了。

范文瀾同志所以得出「獨特的民族」的錯誤的超歷史的概念，決不是偶然的。他主觀地把斯大林民族定義和斯大林關於民族問題諸方面的互相聯系的原理割裂開來，抓住斯大林定義中的詞句；同時，在這個定義中的確沒有「資本主義上升時代」等字樣。這就促使他把斯大林民族定義中的「歷史上」這一概念，理解爲一般的歷史概念了。忘記了斯大林這一著名原理：「民族不是普通的歷史範疇，而是一定歷史時代即資本主義上升時代的歷史範疇。」在范文瀾同志看來，民族既然是一般的歷史範疇，因此，他在古代或中世紀去追尋「民族存在」的做法，就不可避免了。

范文瀾同志一方面如上所述主觀地忽略了形成民族的基礎即生產方式；另方面，把中國近代社會歷史條件對民族形成的影響作用，主觀地加以誇大，爲其「獨特的民族」論調作辯護。即把因中國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所促成的資產階級的軟弱性，誇大爲不能形成資產階級民族的決定原因。范文瀾同志認爲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資產階級異常軟弱。「這個事實，說明了軟弱的中國資產階級實在沒有力量來領導民族運動，因之也不可能形成資產階級民族。」㊀按照他的公式，應該得出結論說，部族是否能形成民族，不是由該部族中是否存在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來決定，而是由資產階級的力量是否強弱來決定。無疑的，把民族形成歸根於資產階級的力量強弱的觀點，會使我們在複雜的歷史現象中，找不到民族形成的規律。

我們並不否認中國社會歷史的特殊性。相反的，我們承認這個事實：就是早在明代已經產生的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由於滿清入關對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破壞，和以後中國進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因而，資產階級異常軟弱（這種情況就削弱了資產階級抗擊阻撓資本主義發展的反動勢力）。以上兩種情形，不僅延緩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的發展，同時，也延緩了民族形成的過程。所以，中國社會歷史條件對民族形成是有一定的影響作用的。但，它並不能決定中國漢族是否能形成民族，因爲決定民族產生的基礎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正如斯大林的指示：「隨着資本主義的出現、封建分割的消滅、民族市場的形成，於是部族就變成爲民族。」㊁那就是說，部族能否形成爲民族，就要看它是否存在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大家知道，中國近代社會和歐洲一樣，是產生了並發展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儘管反動勢力如何摧殘它。根據斯大林關於民族問題的原理，就必然得出結論說，中國近代社會漢族形成民族的過程是肯定存在的（筆者認爲，蘇聯葉菲莫夫同志對中國漢族形成爲民族的論點，是比較科學的）；也就應該得出結論說，研究中國漢族形成民族的問題，應該以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爲線索。

我們從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出發，從中國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出發，來研究中國漢族形成民族的問題，認爲中國並無獨特之處。它和歐洲不同之處，只是在中國社會歷史條件。具體地說，只是中國漢族形成民族之時，因它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故其形成民族的過程，沒有歐洲諸民族形成來得那麼順利，問題更加複雜而已。我們堅決認爲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范文瀾同志拋棄了馬克思主義一般原理，主觀地誇大中國社會歷史的特殊性，竟說斯大林關於民族的歷史概念及其諸方面原理不適用於中國。竟說，世界上除了斯大林所說的資產階級民族和社會主義民族以外，還有第三種所謂「獨特的民族」。這種論證顯然是不正確的。

馬克思主義認爲，一定歷史時期的人們共同體諸特徵，也是在一定的歷史時期的生產方式基礎上形成的。其內容也是由該生產方式所決定。如民族的四個特徵，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礎上形成的。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商業資本的活躍，統一市場的形成，於是部族的帶有偶然性的不穩固的經濟聯系，便發展爲民族的經濟聯系。由於人們經濟聯系的加強，部族的語言變成了民族的語言；部族的「共同心理狀態」，匯合而成爲民族的「共同心理狀態」；部族的「共同地域」也因封建分割的消失，統一爲民族的「共同地域」。這樣部族就變成了民族。

范文瀾同志從他的民族是一般歷史概念出發，在古代史上找出來了「民族」的四個特徵。但他却忽略了這四個特徵所由產生的決定因素即生產方式，也就是說他所找出來的四個特徵是在那種生產方式基礎上形成的？沒有加以論證。他的「民族」諸特徵，就變成了無本之木了。

范文瀾同志在論證「民族」四個特徵時，寫道：「禮記中庸篇記名孔子說：『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按照四個特徵，『共同的語言』就是『書同文』。……『共同的地域』就是長城之內的廣大疆域，『表現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狀態就是『行同倫』……『車同軌』可以瞭解爲相當於『共同經濟生活』『經濟的聯系性』這個特徵。」㊂應該指出，所謂「書同

㊀ 見「歷史研究」一九五四年第三期。
㊁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十頁。
㊂ 見「歷史研究」一九五四年第三期。

文」「車同軌」是指統治階級的經濟和文化上的措施和一定的制度，不能作爲民族的特徵的。至於「行同倫」，范文瀾同志寫道：「儒家思想的主要部分，即祖宗崇拜與孝道是漢族的共同心理。」㊀大家知道，儒家思想是漢代以後變成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即變爲上層建築了。雖然部族或民族的「共同心理狀態」都不排斥統治階級的心理狀態，但它在部族或民族的「共同心理狀態」之中，是決不佔主要部分的。可見范文瀾同志所引用的歷史材料是片斷的，不是大量的。對史料的解釋也不科學，用主觀的牽强附會的方法來任意解釋史料，企圖以「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九個字來解決漢族民族形成的重大問題。自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但是，我們並不能把范文瀾同志辛辛苦苦論證的四個特徵，加以否定就算了事。我們認爲還有提出來把它們逐一加以研究和討論的必要。

「共同的語言」范文瀾同志認爲就是「書同文」。查史記始皇本紀載，秦統治者「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同本紀又記始皇廿六年作琅邪台，立石刻以頌秦德云：「……器械一量，同書文字。」看來秦統治者統一文字是事實。但這並不等於說秦統治者統一了語言。范文瀾同志的錯誤就在於認爲秦統治者統一了文字，就是統一了語言。把文字的統一和語言的統一混爲一談。

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一書中，對語言學作出了極其光輝的論述，他認爲語言是全民性的超階級的人們交際的工具，它爲「文法構造和其本詞彙」所穩固着。它的發展，「是經過逐漸的長期的語言新質和新結構的要素的積累，經過舊質要素的逐漸衰亡來實現的。」就是說經過非爆發的形成來達到質變的。「馬克思主義不承認在語言發展中有突然的爆發。」㊁因此，斯大林認爲不同的語言，是不能由一個階級或某些統治者來加以統一的。他寫道：「語言有巨大的穩固性和對强迫同化的極大的抵抗性……土耳其的同化主義者，曾在幾百年中努力傷害，破壞和消滅巴爾幹各族人民的語言。在這個時期中巴爾幹各族人民語言的詞彙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接受了不少土耳其的詞和語，有過『匯合』也有過『分離』，可是，巴爾幹各族人民的語言還是堅持下來了。」㊂看來，斯大林一方面承認某一個「階級影響到語言」的一定的影響作用，另方面認爲某一個階級或某些統治者是不能把不同的語言統一爲同一語言的。

大家知道，朝鮮在日本侵略者統治下整整五十餘年，日本帝國主義力圖同化朝鮮族，尤其從語言和文字方面去麻痹朝鮮人民的民族意識。但是，事實表明，偉大的朝鮮人民在今天仍然講自己的朝鮮話。那麼，秦統治者又怎麼能够把部族中不同的語言統一爲同一的民族語言呢？

我們不能不指出，在古代或中世紀的時候，部族這一共同體內，雖有其共同的全民性的語言，但是，同時却存在着各地區的不同的地方方言。當資本主義一經發展起來，就要求把這些地方方言統一爲民族語言。斯大林寫道：「隨着資本主義的出現，封建分割的消滅，民族市場的形成，於是部族就變成爲民族，而部族的語言就變成爲民族的語言。」㊃所以，部族的地方方言，就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礎上，在統一市場的條件下，由於人們經濟聯系的加强，而逐漸在一個主導的部族共同語言基礎上統一爲民族語言。斯大林在考察俄羅斯民族語言形成時，寫道：「某些地方方言在民族形成過程中可以成爲民族語言的基礎並發展爲獨立的民族語言。例如，對於成爲了俄羅斯民族語言基礎的俄羅斯語言中的庫爾斯克—奧勒爾方言（庫爾斯克—奧勒爾『話』）情形就是如此。」㊄可見，語言的統一，必須以生產作基礎，在生產中通過非爆發式來達到質變的。馬克思主義關於語言統一的觀點和范文瀾同志的語言的統一的觀點有什麼共同之處呢？

至於說到文字則不同，它是可以被一個階級或統治者所統一、創造、改革的。大家知道，中央人民政府文字改革委員會正是爲幫助各族人民改革他們的文字，和幫助至今還沒有文字的各族人民創造新文字而設立的。可見文字與語言本身有密切的聯系，但其發展却不同。絕不能把語言的統一和表達語言的工具——文字的統一，混爲一談。

我們也不能不指出，范文瀾同志認爲語言可以由一個階級或某些統治者强加統一的觀點，無論在理論上實踐上都是不正確的。因爲這種觀點和理論，就會給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正利用同化主義的「理論」來指導其民族壓迫的實踐，在客觀上提供了新的論據。

其次，如果我們認爲語言可以由一個階級或某些統治者强加統一的話，那麼，一些帶有大漢族主義思想的人，就會錯誤地認爲，乾脆把沒有文字的少數民族統一到漢字漢語中來。

最後，如果我們認爲語言可以由一個階級或統治者强加統一的話，那麼，語言的發展史，實質上變成了統治者統一語言的歷史。這種在語言學中的爆發論調，就會把語言學引導到反科學的途徑上去。

㊀ 見「歷史研究」一九五四年第三期。
㊁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五頁。
㊂ 同前引書，第二四頁。
㊃ 同前引書，第十頁。
㊄ 同前引書，第四四頁。

「共同的地域」范文瀾同志認爲「就是長城之內的廣大疆域。」我們並不否認，漢族在秦漢時代有一個居於長城之內的「共同地域」。但是，這種「共同地域」是部族的呢？還是民族的呢？重要的問題在於進行具體的分析，如果像范文瀾同志所說，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馬克思主義認爲，部族，由於奴隸制度和封建制度的生產方式佔統治地位，由於自然經濟佔統治地位，分裂割據的局面是不可避免的。所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正是這個道理。也正是斯大林所說的十九世紀以前格魯吉亞部族的各個「公國」割據的現象。因此，部族比起民族來，它的「共同地域」是較不穩固的，分裂割據正是它的特徵。

民族的「共同地域」則不同了。由於封建制度的解體，資本主義的上升發展，統一市場的形成，人們經濟聯系的加强，部族的「共同地域」便因割據的消滅而統一爲民族的「共同地域」了。列寧寫道：「……這種溶合……是由各個區域間日益加强的交換，由逐漸增長的商品流通，由各個不大的地方市場集中爲一個全俄市場所引起的。」㊀那麼，在沒有資本主義發展和統一市場存在的秦漢時代，怎麼會有民族的「共同地域」呢？

范文瀾同志所謂秦漢已有民族的「共同的地域」的論調，不僅在理論上不能成立，而且，也爲中國歷史事實所駁倒了的。史記始皇本紀載，「丞相斯爲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短短壽命的秦帝國到始皇死時，社會分裂割據的危機，已達到一觸即發之勢了。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起義，諸侯公國們便起來趁火打刼了。同本紀又寫道：「武臣自立爲趙王，魏咎爲魏王，田儋爲齊王，沛公起沛，項梁舉兵會稽郡。」秦二世三年，章邯出兵「平亂」，當鉅鹿失守之前，邯即「上書請益助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爲王，自關以東，大抵盡叛。」值得注意的是過去由東諸國之再起，這叫什麼統一呢？斯大林教導說，這不過是「暫時的，不穩固的軍事行政的聯合」而已。至漢，高祖「懲戒亡秦孤立之敗」，乃「封建」親戚，「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大者爲王，小者爲侯」，於是，分天下爲「九國」。結果，到景帝三年時便爆發了「七國之亂」。東漢末年展開了軍閥諸侯的割據局面，演變爲三國鼎立之勢。這又叫什麼統一呢？范文瀾同志所謂自秦漢時中國已成爲統一的國家的論點是不會令人信服的。我們再往後看，三國分立，爲西晉所統一，不久，即發生「八王之亂」。此後，中國由於北魏的侵入，形成了南北朝對立局面，南朝宋、齊、梁、陳的更替；北朝五胡十六國之瓜分，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北宋趙匡胤雖然統一了中國，但連石敬瑭出賣的燕雲十六州也沒有收回來（筆者按：燕雲十六州在明太祖統一中國時才收回）。北宋末年以後終南宋一代，在中國領土上展開了遼、金、元角逐局面。中國領土經常被瓜分成幾塊。我們從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來看，整個古代史和中世紀史都充滿了分裂割據現象。和列寧、斯大林所說的十七世紀以前俄羅斯部族中的諸侯、公國分割現象一樣，顯然是部族的「共同地域」的特徵，而不是民族的「共同地域」的特徵。所以，范文瀾同志認爲中國的分裂割據狀態是「短期的」，「變態的」；認爲中國歷史的統一是「長期的，正常的」說法，是和中國歷史事實不相符合的。

「共同經濟聯系」，范文瀾同志認爲「車同軌」可以瞭解爲相當於「共同經濟聯系」，即民族的「共同經濟聯系」。他力圖證明在沒有資本主義存在的，即他所謂封建主義時代的商業資本已經把漢族人民從經濟上聯系爲一個民族整體了。他羅列了許多現象，搜集了許多材料，來充實自己的論據。

我們先看看馬克思主義對於這個特徵的基本觀點。

斯大林在論述格魯吉亞民族的「共同經濟聯系」時寫道：「……直到十九世紀後半期，格魯吉亞才成爲民族，因爲當時農奴制度的崩潰和國內經濟生活的發展，交通的發達和資本主義的產生，使格魯吉亞各個區域之間實行了分工，徹底打破了各個公國在經濟上的閉關自守狀態，而把這些公國聯成一個整體。」㊁可見，馬克思主義對民族的「共同經濟聯系」這一特徵的理解的出發點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存在；統一市場的形成。只有這樣才能有民族的「共同經濟聯系」。

關於部族的「經濟聯系」轉變爲民族的經濟聯系，列寧有一段精采的言論：「……在中世紀，在莫斯科王國時代，這種氏族聯系就毫無疑義已經不存在了，這就是說，當時國家完全不是建立在氏族團體上，而是建立在地方團體上：地主和教堂接納了從各地來的農民，而這樣組成的村社就成爲純粹地域性的團體。但是在當時還很難說已有眞正的民族聯系。」㊂那麼，怎樣才有可能把這種「純粹地域性」的聯系，即部族的聯系，變成爲民族的聯系呢？列寧繼續寫道：「僅僅在俄國歷史底新時期中（大約自十七世紀起），這種區域、領土和侯國才眞正在事實上溶合爲一個整體。……這種溶合……是由各個區域間日益加强的交換，由逐漸增長的商品週轉，由各個不大的地方市場集中爲一個全俄市場所引起的，既然這個過程的領導者和主人翁是商人資本家，所以這種民族聯系的創立也就無非是資產階級聯系的創立。」在列寧看來，部族的聯系變爲民族的聯系，這就是說部族的經濟聯系變爲民族的經濟聯系，必須要有資本主義生

㊀ 轉引自「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四六頁。
㊁ 「斯大林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三頁。
㊂ 同註㊀。

產方式的發展，和統一市場的形成，而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下的商人資本家們，在這個過程中，起了一個領導的推動的作用。

大家知道，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條件下，生產的目的是爲了剩餘價值，也就是爲了生產商品而生產。由於生產力蓬勃發展，而引起了大量商品的存在，商人資本家就要求擴大國內市場，把商品推銷到全國範圍去。於是統一市場便形成了，各區域間的閉關自守狀態就被打破了。這就是商人資本家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基礎上，對部族的經濟聯系變成爲民族的經濟聯系，起了一個領導的推動的作用。

馬克思主義認爲，在前資本主義時期的生產方式基礎上，寄生於其上的商業資本是不能把全國各區域各個市場的人們的經濟聯系，即部族的經濟聯系溶合而成爲一個民族的經濟聯系的。我們舉封建主義時代的商業資本爲例吧。

在封建主義正在發展的時代，由於生產力發展水平不高，就決定了封建主義生產的目的是以享受和應付戰爭的需要爲主，而不是以生產商品爲主。恩格斯在一八九三年七月十九日致P·梅爾的信中寫道：「很難設想，出身於封建制度內部的貴族封地佔有者——公爵或大地主，會有一天像資產者那樣學會經營，會像資產者那樣開始認爲在任何情況下自己的首要天職就是逐年使所得剩餘價值之一部轉化爲資本。這是和以前一切封建國家的全部史實相矛盾的。」㊀恩格斯的意思就是說封建主把榨取來的剩餘生產物主要用來消費，而不是像資產者那樣用之以擴大再生產。

由於封建制度的生產力水平低下，封建主義生產性質，就決定了封建領地的以自然經濟爲其主導的特徵。列寧寫道：「農奴領地應是自給自足的，閉關自守的，跟世界其它部分的聯系是非常薄弱的。」㊁領地的自然經濟的性質，爲領地生產的多樣性所表明。我們如果概括一下中唐時的莊園經濟的情況，那就是：官僚地主的莊園，或親自管理，或派莊吏、監莊、家僕掌管。大多數莊園除莊宅及其附近的田地之外，還包括有果園、菜園、碾磑、店舖、茶園、鹽畦、車坊以及山澤森林。這些生產資料均歸莊園主所佔有。這樣就構成了自然經濟的統一的整體。

然而，封建領主並不能「萬事不求人」，他缺乏許多的奢侈品和武器，這些東西需要從外方運來；同時，自己領地上也有許多東西是用不了的，如大量的茶葉和菓類等；需要向外方運出的。因此，他就要求「以有易無」，來達到自己奢侈和打仗的需求。正是在這裏，商業資本就來爲封建主服務了。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再看看農村吧：列寧在說明封建生產方式的特徵時，開頭第一個特徵就是「自然經濟佔統治地位」。在廣大的農村中，小農經濟的特點，就在於它是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唐書」卷五一「食貨志」曾記載初唐帝國向小農榨取的租調庸制度：「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棉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至中唐，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均田制的破壞和莊園制的確立，以行兩稅之法，要農民們把「應」交給國家的實物折錢後交納。「新唐書：食貨志」寫道：「今兩稅出於農人，農人所有唯布帛而已。」從前面一個史料可以知道，所謂綾、絁、麻、棉、布等都是家庭手工業生產物；後一個史料所謂「農人所有唯布帛而已」中的「布帛」，也是家庭手工業產品。兩個史料都證明封建時代的農村小農自然經濟的性質。當時農民們對市場的依靠，沒有像資本主義發展下的人們對市場的依靠那樣迫切。他們除了用一點「剩餘」產物來換取自己所沒有的用品外，基本上是排擠商品生產的，農民們對市場並不感到很大的興趣。因此，商業資本在這裏的活動範圍是有限的。

由此可見，商業資本主要的是爲上層封建主服務。只是爲封建主的「以有易無」的要求，也就是說，它在基本上是爲以自然經濟爲主導的大領地經濟服務。由於當時商品生產不發展，商業資本還不能提出擴大與統一全國市場的要求，只能在各個基本上不相聯系的區域內，通過本區域各個大小的地方市場，來爲封建主服務。它還不能根本動搖自然經濟的統治，打破各區域之間的閉關狀態，從而把全國聯成爲一個民族整體。也就是說，它還不能把部族的「共同經濟聯系」，溶合成爲民族的「共同經濟聯系」。

儘管范文瀾同志說在封建主義正在發展的時代的商業資本似乎已經能够把部族的經濟聯系溶合而成爲民族的經濟聯系，誇大古代商業資本的作用，但他却不能不承認這個事實，即當時還處在封建主義正在發展的時代，當時還是「國內大小市場」（范文瀾同志語）。一方面硬說民族的「共同經濟聯系」已存在於秦漢時代；另方面却又承認當時還沒有統一市場的存在。這種自相矛盾的論證之所以產生，就是在於他忽略了生產力的發展，生產方式的發展水平。他不是從封建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程度及其基礎來考察商業資本在當時可能有的作用，而是拋棄了生產方式這一決定性的問題，單從當時商業資本表面活動的現象中去尋找其作用，並且，把這些表面現象加以羅列，以誇大商業資本在古代的作用。他這種把古代商業資本的作用加以誇大，甚至和近代商業資本作用等量齊觀的觀點，就在於不能客觀地來研究商業資本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應有的作用。

㊀「歷史問題譯叢」，一九五四年第一輯。

㊁「資本主義以前經濟形態」，中國人民大學版，第八五頁。

「共同心理狀態」，馬克思主義認爲部族和民族同樣有「共同心理狀態」。那麼，如何來認識它呢？仍然要以一定的生產方式發展作爲自己出發點。在前資本主義時期，由於奴隸制度和封建制度佔着統治地位，統一市場還沒有形成，人們經濟聯系並不是十分密切，故部族的「共同心理狀態」還不能溶合而成爲民族的「共同心理狀態」。當資本主義上升之時，由於統一市場的形成，人們經濟聯系的加强，分割局面也消滅了。於是，部族的「共同心理狀態」便統一而成爲民族的「共同心理狀態」。

至於漢族，我們在前面說過，奴隸制度和封建制度時期的「分」「合」現象；也說過統一市場尚未形成，民族經濟聯系還不存在。因此，民族的「共同心理狀態」也不能存在了。

范文瀾同志在論述民族諸特徵的時候，既然忽略了生產方式這一決定性的因素，即既然它的四個特徵是無本之木，它們之間也就沒有什麼直接的聯系。試問，「車同軌」和「書同文」有什麼辯證聯系呢？當然沒有。因此，他所謂民族特徵，倒不如說是部族中某些現象的羅列更爲恰當。

馬克思主義認爲，隨着民族形成而來的是民族運動。在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條件下，生產力迅速發展，大量商品的存在，使商人資本家們不僅要求擴大和統一國內市場，而且，「資產階級由於需要有不斷增加的產品銷路，乃不得不奔走於全球各地。它不能不到處鑽營，到處棲止，到處建立聯系。」㊀也就是說它還要去爭取國外市場。斯大林說：「在年輕的資產階級看來，市場是基本問題。它的目的是銷售自己的商品，戰勝和自己競爭的異族資產階級。因此，它力求保證自己有『自己的』『本族的』市場。」一當別的民族資產階級來爭奪「自己的」市場時，那麼，它「自然要行動起來，它向『下層同胞』呼籲，開始高呼『祖國』，把自己的私事冒充全民的事情。它爲着……『祖國』的利益而在『同胞』中間給自己招募軍隊。『下層』對這種號召並非始終不理，有時也在資產階級旗幟的周圍集合起來，因爲上層的高壓手段也觸犯了他們，引起他們的不滿。」「民族運動就是這樣開始的。」㊁由此可見，民族運動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礎上產生的。它適應着當時商人資本家要求，也是他們提出來的，民族運動實質上是資產階級運動。

范文瀾同志在論證中國漢族於秦漢時形成民族之後，也論述了民族運動。即所謂「民族反抗運動」。正如范文瀾同志所說的，偉大的漢族，的確經過幾千年的鍛鍊，富有反壓迫反侵略的民族精神，有着自己光輝的歷史，是值得我們引爲驕傲的。但是，正如人們所知道的，這種發生在秦漢以後的種族矛盾，是在特殊形式的階級鬥爭中產生的。它不是直接在一定的生產方式基礎上產生的，它和當時商業資本沒有直接聯系。所謂「民族反抗運動」，實質上就是指漢族在受他族侵略時，它就起來反抗而形成的一種運動。應該指出，這個所謂「民族反抗運動」的提法是不科學的，它既和民族運動毫無共同之處；也和種族矛盾不同，因爲種族矛盾這一概念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本族受外族的侵略；另方面本族侵略外族。而這個「民族反抗運動」則只限於「反抗」而已。這決不是什麼歷史概念。范文瀾同志之所以提出這個概念，即在於湊成他的整套的「獨特的民族」論調。

爲了不使「部族」「民族」諸概念混淆起來，蘇聯司徒靈威院士曾經建議：「蘇聯歷史編纂學方面就不應該把『民族』『民族的』等術語用到古代社會去。指明奴隸制時代及中世紀社會的合乎規律的術語乃是『部族』……。」㊂因此，我認爲在奴隸制和封建制時代最好用「部族」這一術語，它和外族之矛盾，應該用「部族矛盾」這個術語。在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時候，才可用「民族」這個術語，它和外族的矛盾，應該用「民族矛盾」這個術語。

總之，范文瀾同志在主觀上企圖以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來研究中國民族形成問題，但是，他所得出的結論及其論證是不能令人滿意的。首先，他不論在民族的歷史概念，民族的四個特徵，民族運動諸方面都忽略了生產方式的發展。其次，他又誇大中國漢族所處的近代社會客觀條件，並以此爲理由，拋棄馬克思主義一般原理。最後，在思想方法上也犯了主觀片面的錯誤，如把斯大林民族定義孤立起來運用；在史料方面企圖以片斷的零碎的一些史料來解決中國民族形成的重大問題。有時，不惜用牽强附會，任意解釋史料的手段來達到主觀上所要達到的目的。因此，他所謂漢族是一個「獨特的民族」的論點，是錯誤的，沒有科學根據的。

㊀「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六頁。

㊁㊂以上所引均見：「斯大林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三〇二—三頁。

㊃「歷史問題譯叢」，一九五四年第一輯。

論部分集體所有制的農業生產合作社

曹國興

一

我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已取得了巨大的成績，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迅速發展。中共中央在「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中，要求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內，即到一九五七年，爭取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到八十萬個左右，包括全國農戶的百分之二十左右；但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第三個年頭的初期（即一九五五年春耕前），全國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已有了近六十萬個，包括了全國農戶的百分之十三。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超額完成中央的計劃，一般說，是可以肯定無疑了。

我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所以有這樣巨大的成就，互助合作運動有如此迅速的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的是中共中央確定了以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爲我國現階段（第一個五年計劃或更長一些的時間）改造農業的主要形式，並以此爲出發點規定了發展半社會主義性質農業生產合作社各項具體政策。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不同階段上確定主要的合作組織形式是有很大意義的。斯大林在談到正確運用無產階級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時指出：「要在每個一定時機內找到事變過程鏈條上的一個特別環節，一抓住這個環節，便能握住整個鏈條而準備好達到戰略成功所必要的條件。」㊀

黨中央由於選擇與確定了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爲我國現階段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中心環節和主要發展形式，從而極大地推動了這一運動的前進。

黨中央爲什麼確定半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爲我國現階段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主要形式呢？選擇與確定一種大量發展的主要的合作形式，取決於下列兩個主要條件：

（1）當前生產力水平和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

（2）廣大農民羣衆的覺悟和經驗。

根據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經濟規律，任何一個經濟組織形式都要符合於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只有如此，才能促進生產的發展和符合客觀經濟發展的需要。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組織形式也不能不如此。除此之外，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組織形式還要考慮到廣大農民羣衆的覺悟和經驗。因爲任何一種合作社組織形式都是或多或少地在改變農民的經濟關係，其最終目的是把個體農民經濟改變爲社會主義所有制經濟，而改造農民經濟的一個根本原則是自願原則，因此合作社組織形式必須使農民易於接受，要和廣大農民的覺悟程度與經驗相適應。否則也是不會成功的。這裏所說的「適應」，就是說在當前的階段上廣大農民羣衆比較容易瞭解和接受的形式。黨中央在關於我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決議和指示中都充分地貫徹着上述兩個條件。「黨中央的方針就是根據生產發展的需要與可能的條件而穩步前進的方針」㊁。

在我國國民經濟恢復時期，黨在全國範圍內廣泛地組織了農業生產互助組。這種形式在該階段上是適宜的：

第一，當時廣大地區的土地改革剛結束不久或還未結束。農民雖然翻了身，但廣大農民羣衆在生產上的困難還是很多的，特別是長期戰爭的破壞，不少的農民（包括一部分老中農）缺乏耕畜、農具或是缺乏勞動力，而互助組在當時較適宜地解決了這些困難，從而推動了農業經濟的迅速恢復，獲得了廣大農民羣衆的擁護。

第二，這種互助組形式由於尚不牽動農民所有制的變化，是個體經營的勞動互助範圍和規模較小，因而它適應解放初期廣大農民羣衆的覺悟和經驗。

隨着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結束，大規模工業建設的開展，要求農業有計劃地、相應地配合，而個體農民和集體勞動分散經營的互助組都不能滿足生產日益發展的需要和進一步改善農民生活的要求。如果說，在農村經濟恢復時期，農村分化和農民自發的資本主義趨勢還不顯著的話，那末在隨着農村經濟的恢

㊀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中文版，第九八頁。

㊁ 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

復興發展，農民的自發的資本主義趨勢就日益明顯起來。這條道路是與黨所領導的互助合作道路根本不相容的。互助組由於仍是個體經營的農民經濟，不能更好地和農民分化、農村自發的資本主義道路作鬥爭。由此可見，生產力的發展和整個社會主義建設進程都要求發展一種比互助組更高級的合作組織。於是，土地入股、統一經營的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在農業生產互助組運動的基礎上和客觀經濟發展的要求下就逐步成長起來。土地入股、統一經營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經濟關係決定了這種形式適應於目前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和廣大農民羣衆的覺悟和經驗。

二

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經濟關係是一種什麼樣的經濟關係呢？斯大林曾經指出，分析合作社的經濟關係不能孤立地、而要與國家政權性質、社會的主導生產關係配合起來。這是因爲合作社經濟的生產目的、發展前途及其發展的規律性是受國家政權性質、社會的主導生產關係所影響、所制約。因而分析我國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經濟關係不能不注意到它的發展條件。我國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的最基本條件就是以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國營經濟的領導作用及社會主義工業的日益發展。

我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主要生產資料還是私有的，但在人民民主政權和國營經濟領導下，作爲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一種形式，一種過渡形式，不能不具有社會主義性質，其發展前途不能不過渡到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關係。它目前是一種半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組織：

一、生產資料佔有關係：

甲、勞動農民的私有部分——入股的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

乙、勞動農民集體所有部分——有些社牲畜或主要農具是公共的（或均攤歸公的，或用公共積累購買的）；有些社因集體開荒，有了一部分公共土地；有些社經共同勞動修建了房屋、水利工程，種植了公共林業以及其他的公共財產。

此外，有些社還使用着國有土地（全民的）。

最後還應指出，農民入股的私有生產資料，由於已不歸個人支配，而由合作社統一支配和使用，因而就合作社對這些生產資料統一使用來說具有社會主義性質。這是因爲合作社統一使用的目的是爲了發展生產，改善全體社員生活；私有生產資料的報酬和代價是以既有利中農又有利於貧農和它們的長遠的共同利益爲出發點的。

二、社員之間的關係：由於這種合作社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吸引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種過渡形式，因而社員之間的關係不能有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統治與服從的關係，但也不是完全社會主義的同志友愛關係，而具有兩方面的性質：

甲、中、貧農關係——由於農民的生產資料還是私有的並取得合理報酬，而中、貧農入股的生產資料和收入是不等的，因而他們對待合作社的收益分配、生產投資及其他經濟措施方面就常常有着不同態度和要求。這反映了社員之間關係上的中、貧農關係。這裏沒有根本對立，因爲它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目前保留這種關係對中、貧農是都有好處的，他們的不同要求可以由其利益的一致性，在黨的領導下來調整。在黨的領導下他們並不能因生產資料多寡而產生統治與服從的關係。

乙、社員之間社會主義的同志互助合作關係——社員在合作社中的地位是相同的，每個社員必須參加社內勞動這種共同勞動的目的是爲了全體社員的生活上昇和富裕。任何社員都不能帶僱工入社。他們平等地管理合作社經濟，大家共同決定合作社的重大事宜，社的管理幹部是經全體社員民主選舉的，他們的權利和義務是平等的。這些都是社會主義的同志關係，這種關係隨着公共經濟發展和社員覺悟的提高而發展、鞏固。

三、以生產資料佔有關係爲轉移的分配關係。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當年總收入除了抵償消耗的生產資料部分及繳納農業稅外，其餘的勞動產品的分配也具有兩方面的性質：

甲、分配中的私有部分——根據入股的生產資料的多寡分配。由於生產資料私有，必須給土地私有者以合理報酬（或者是按土地與勞力的比例分紅，或者爲土地的固定分益）和私有牲畜大農具者以合理代價，以及給予生產投資者以合理利息。各個社員由於佔有生產資料不同，因而按生產資料取得的收益是不相等的。一般說，中農取得的私有生產資料報酬多些，貧農少些，但這裏沒有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因爲這種生產資料較多者的中農和生產資料較少者的貧農的合作，其目的是爲了和資本主義作鬥爭，是爲了共同擺脫剝削和貧困而謀求生活的共同上昇與富裕。這種作法是現階段中、貧農能共同接受的一種過渡到完全社會主義分配關係的過渡形式。

乙、分配中的社會主義部分——由於這種經濟組織形式是人民民主政權領導下引導農民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一種過渡形式，由於國營經濟對其領導和幫助，社內還有或多或少的公共生產資料和其他公共財產，因而分配中不能不具有社會主義性質：

1. 按着業已確定的勞動分益部分，根據計工取酬的原則進行按勞分配；

2. 根據業已確定的提取公積金的比例，提取公積金；

3. 根據業已確定的提取公益金的比例，提取公益金；

4. 根據生產發展的需要和可能的條件，經全體社員同意，補充擴大再生產的流動資金和其他費用。

分配中的社會主義部分隨着生產的發展、各類社員收入的增長和其覺悟提高是逐漸增加的。它符合全體社員的共同利益和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要求。

以上分析表明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經濟關係，既有勞動農民的私有制部分，又有勞動農民的集體所有制部分；既有勞動農民的私有經濟因素及其中、貧農關係，又有社會主義經濟因素及其社會主義的互助合作關係。所謂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就是表明它的經濟關係具有上述兩方面的性質，並是勞動農民過渡到完全社會主義性質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一種過渡形式。在這種合作組織中社會主義經濟因素是起着主導作用的。

這種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適合我國目前生產力發展的要求，能保證相應地增產。我國農業目前不能利用大機器技術和使用更多的化學肥料進行生產，一方面是由於社會主義工業尚不能供出大批機器和化學肥料，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在個體農業的基礎上也根本不能應用新的技術和新的農業科學成就。半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由於統一經營，土地連片（或可逐漸連片），有較大的集體勞動和較大的經濟力量，從而可以充分利用目前社會主義工業供出大批新式農具，畜拉機器（如畜拉雙輪雙鏵犂）。畜拉機器是目前我國技術改革，增加生產的主要措施之一。而這些畜拉機器大部分是農業生產合作社使用的。

這種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在目前條件下能够有效地利用農業中生產資源。在我國尚不能採用大機器耕作、化學肥料和機器灌溉前，合理地挖掘現有農業生產潛力對增加農業生產有着非常重要的意義。個體農民經濟的弱點之一就是不能合理地利用土地和勞力。這是由其小規模的分散經營所決定的。統一經營的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在生產上「一方面，便於統一計劃土地的經營，因地種植，使地盡其用；另方面，可以更方便地調劑勞動力和半勞動力，發展勞動分工的積極性。這兩方面，也就可能逐漸在若干點上克服小農經濟的弱點」㊀。農業生產合作社在成立當年一般能增產百分之十五至二十，這主要是由於合理地利用了土地、勞力耕畜和農具並相應地進行了技術改革。

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不但能適應目前生產力水平和符合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且適合於我國目前廣大農民羣衆的覺悟和經驗：

一、廣大農民在過去的互助組運動中已初步體驗到集體勞動的優越性，從而爲農民過渡到土地入股統一經營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創立了一定的思想基礎。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雖較互助組大大地前進了一步，統一經營了，並有了較多的社會主義因素，但因保留着農民的生產資料私有制並取得合理報酬，從而農民容易理解和接受。

二、在目前生產力水平下，保留私有制並給予合理報酬，能使中、貧農的利益適當結合起來，使農民利益和國家的利益正確結合起來。因爲這種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可使土地較多者和勞力較多者在目前條件下都能提高自己的收入，改善自己的生活。例如：

一九五四年山西省三個農業社各類社員收入比較（預分方案）：

社名	類別	社員姓名	人口	勞力	土地（畝）	全年收入	與去年收入比較（%）
山西省興村農業社	甲類	張作堂	九	二	五七·七	一、三四四萬元（舊幣）	超過入社前純收入四一·〇
	乙類	郭永福	四	四	三六·〇	一、一五四萬元（舊幣）	超過入社前總收入一一〇·〇
	丙類	張友義	五	二	二〇·八	七五九萬元（舊幣）	超過入社前總收入一一六·〇
山西省農業社（光曙）	甲類	劉友禮	四	一、五	一七·六	五、四三八斤糧	超過入社前糧食收入二〇·八
	乙類	韓臭會	七	五	一五·〇	一〇、八五〇斤糧	超過去年糧食收入二〇·六
	丙類	—	—	—	—	—	—
山西省大寨村農業社	甲類	張補成	九	二	四三·〇	六、七八四斤糧	超過去年糧食收入一六·三
	乙類	張磨福	二	一	七·九	三、五五五斤糧	超過去年糧食收入二〇·七
	丙類	—	—	—	—	—	—

註：甲類爲土地相對多而勞力相對少者；乙類爲土地相對少而勞力相對多者；丙類爲土地和勞力中等者。

㊀ 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

由於各類社員的收入均有了增加，因而中、貧農都可以接受。反之，如果目前實行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不僅在思想上不能適應，而且目前的生產力水平不能全面地保證各類社員都增加自己的收入（如缺乏勞動力的貧農，土地較多而勞動力相對較少的中農），從而不能保證合作社運動迅速地發展。因爲「任何一個社會階級或階層在革命中的動向，歸根到底是由某一種社會制度對他們的經濟利害影響來決定的」㊀。雖然，高級的完全社會主義的合作社將來能更好地改善其生活，但當前農民看不到這點，他就不能自願地入社。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在目前生產力水平下，恰當地提高了各類社員的收入，從而獲得了廣大農民羣衆的擁護，這既有利中農也有利於貧農，並配合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建設。

三、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由於是統一經營的較大規模的經濟，因而要求農民有管理公共經濟的才能和參加公共經濟生活的習慣和一定的管理公共經濟的能力，特別是培養了領導半社會主義農業社的骨幹分子。

所謂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適應目前廣大農民的覺悟和經驗，並不是說現在的農民或已參加了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民在思想上和管理公共經濟的能力已與這種合作社經濟性質和要求相符合了，而是說農民對這種組織形式不感到突然，而是有了一定準備，對這種形式較易理解，爲要使農民自願參加合作社或使已參加社的農民在思想上和幹部管理上符合這種組織形式的要求，把已建立的合作社都鞏固起來，還必須進行一系列的組織和宣傳教育工作，而且這個工作乃是一個長期的任務。

黨中央確定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爲我國現階段改造農業的主要形式，不僅符合我國目前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和適應廣大農民的覺悟和經驗，而且把發展這種形式和使農民穩步過渡到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直接聯系起來了。因爲這種形式能够提高生產，改善農民生活，與此同時，培養着農民的集體主義思想，提高着社會主義覺悟，培養着幹部，並在社內生產不斷發展、社員收入普遍提高的基礎上逐漸增加公共積累，逐步降低土地報酬，提高勞力報酬，從而爲農民經過這種形式而穩步過渡到完全社會主義的農業合作社打下基礎。中央指出，這種形式的農業生產合作是引導農民過渡到完全社會主義農業生產合作的適宜的形式，使農民「進到農業的完全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的時候不感到突然，而是事先有了精神的和物質的準備的，因而能够避免由於突然變化所可能引起的種種損失」㊁。

由此可見，黨中央關於在現階段上，主要是發展半社會主義性質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指示是完全正確的，這是列寧斯大林合作社計劃在中國的創造性的運用和發展。大量發展和鞏固這種合作組織形式是順利地實現我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

三

現階段大量發展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黨和政府對這種合作組織的具體經濟政策是從其兩方面的性質出發的。一方面充分考慮到了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民的私有性，另一方面考慮到了它的社會主義性質。中央在「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和國務院「關於春耕生產的決議」中都明確規定了對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經濟政策。這就是允許社員私有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並給其合理利益；不過早的取消和過多的降低土地報酬；不能急於實行耕畜和主要農具的公共化。初辦社時最好採用私有公用，給與合理代價。在必要和可能實行折價歸公時，折價應合理，並按期歸還價款和付息；社內收益，應有相當的部分按勞分配，一般說，勞力報酬應稍高於土地報酬，但也不要使土地報酬過低，規定好的土地報酬除非遇到災荒，幾年內不應降低；在分攤社內生產資金時，對無力支付的貧苦社員在新老中農同意並不使其負担過重的情況下給貧農以必要照顧；爲了增加社會主義經濟力量，加强社內擴大再生產能力和解決社內文化福利措施要從每年的歲入中扣除一定比例的公積金和公益金，其數量：公積金，一般不超過歲入百分之五，公益金不超過百分之一。收入較高的經濟作物區的農業社可適當提高一些……等等。

這些具體經濟政策，適應於廣大農民的覺悟和經驗，照顧了中、貧農利益，照顧了私人經濟利益和全體社員生活改善並在生產發展、社員生活改善的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的經濟因素不斷地增大。這樣，就保證了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穩步、順利地發展起來，鼓勵着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使我國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中暫時不利生產的某些影響縮小到最小限度。這對農民和國家都是有好處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本是爲了提高生產，是我國目前農業生產發展的一個決定性條件，但在一個巨大的社會經濟改造過程中，對生產暫時發生某些不利的影響是難免的。可能對生產產生暫時的某些不利影響，常常是運動過急過猛，農民感到突然，思想不適應，或合作組織發展得很快，未能及時地從組織上和經濟上加以鞏固，生產沒有隨着新經濟關係的建立而迅速組織起來，或者

㊀「爲什麼必須重視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鞏固工作」，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社論。

㊁中共中央「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

在運動中侵犯了中農利益，傷害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黨和政府充分估計到了這一點，採取着「積極領導，穩步前進」的方針，對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經濟政策，既充分估計到了農民的私有性，又估計到了它的合作性質，「由此謹愼地又積極地在逐步發展的基礎上，引導它們前進」㊀。

對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兩方面性質及這種形式對我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意義估計不足，必然發生右的和「左」的錯誤。右的錯誤就是表現爲對發展農業社的放任自流，或社內土地報酬和生產資料代價過高，侵犯貧農利益和排擠貧農入社；「左」的錯誤就是在發展農業社中貪高冒進，强迫命令，土地報酬過低，過多和過早的降低與取消土地報酬，過急的實行牲畜和大農具的公共化及耕畜農具折價過低，盲目追求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社和侵犯中農利益。

國務院在「關於春耕生產的決議」中除肯定了我國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巨大成績外，並指出了所發生的一些缺點：有些地方未能切實貫徹自願互利原則，在處理有關社員實際經濟利益的種種問題時照顧不週，或者使貧農吃虧，或者損害中農應得的利益；也由於對合作化的政策和步驟宣傳不够或解釋不很恰當，甚至發生强迫命令的錯誤，有些地方急於併大社，急於實行牲畜農具歸社公有，過早降低土地報酬，主觀要求加速過渡到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合作社，以致引起部分農民對合作化的懷疑和誤解……。這些缺點反映了不少幹部對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兩面性估計不足，對中央關於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爲我國現階段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主要形式的指示的重大意義認識不足。因而，加强幹部這方面的學習，對於深入體會和堅決貫徹黨對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經濟政策是有很大意義的。

黨對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各項經濟政策及其它政策也就是黨的各項具體的階級政策。在農業生產合作社貫徹黨的經濟政策和貫徹黨的階級政策應當作一個統一的標準來檢查。

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是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在農村的鬥爭，因而這個運動就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階級鬥爭，要完成改造農業的任務就必須有相當的階級政策。黨在過渡時期對農村的階級政策是依靠貧農（包括全部原來是貧農的新中農）鞏固地團結中農，由限制到逐步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由於過渡時期每個階段上情況不同，任務不同，因而在實現階級政策的內容和形式也就有所不同。現階段我國是大力發展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因此，在半社會主義的農業社內，除了從政治上、組織上依靠貧農外，在合作社內部經濟問題上不要使貧農吃虧，不能排擠貧農，應幫助貧苦社員解決困難，並作可能的、必要的照顧。在團結中農方面，除了政治上和組織上團結外，在處理合作社內部經濟問題時，要給中農以合理利益，不能侵犯中農利益。目前必須堅決防止富農混入合作社，防止在合作社內進行變相的富農剝削。

黨對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具體經濟政策，是充分貫徹着黨的階級路綫的精神的，因而對執行黨對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經濟政策必須提到階級路綫的高度來看待、來檢查，這樣就可能防止强調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私有性質，而損害和忽視社會主義性質，或强調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會主義性質，而忽視，損害生產資料私有者的利益。這樣就可能防止某些人藉口執行黨的經濟政策而在實際上違犯黨的階級政策，從而也就違犯了黨的經濟政策。或藉口執行黨的階級路綫而違背了黨的經濟政策，因而在實際上就違背了黨的階級路綫。所有這些都是不了解黨的經濟政策也就是黨的階級政策，其實質是片面地執行黨的政策所致。國務院在「關於春耕生產的決議」中指出的那些缺點，同樣反映了在執行黨的階級政策方面的缺點。爲了發展農業生產合作運動，必須全面地貫徹黨對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經濟政策和過渡時期黨對農村的階級路綫，並不斷地從組織上、經濟上鞏固已建立起來的農業生產合作社。

㊀ 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

中國的棉花生產問題

華　忍

一

中國是世界上最適宜於栽培棉花的國家之一。

遠在紀元以前，中國就有了棉花栽培的記載，如漢代沈懷遠「南越志」：「桂州出古終藤，結實如鵝毳，核如珠珣，治出其核，紡爲絲綿，染爲斑布。」又同書：「南詔諸蠻，不養蠶，惟收婆羅木子中白絮，紡爲絲，織爲幅，名婆羅籠段。」按桂州即今日之廣西桂林，南詔即今日之雲南大理。

可是在黃河、長江流域一帶，棉花的普遍栽培則比較晚。如漢代農書「氾勝之書」㊀其中不但種稻、種麻，都有單篇；連種瓜、種芋，也有專題，獨獨未寫棉花。又北魏賈思勰所著「齊民要術」，爲現存最完備也最全面的一部古代農書，其中我國亦無棉花。據考，古時中國內地的衣被原料，主要是蠶絲和麻類。孟子：「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帛是絲織品；又「漢書：藝文志」：「麻、紵、葛曰布」。沒有提到棉花。一直到隋、唐以後，在當時比較邊遠的地區，如四川、福建等省，棉花的栽培才開始普遍起來，如唐代張籍詩：「蜀客南行祭碧鷄，木綿花發錦江西。」宋代謝昉詩：「嘉樹種木綿，天何厚八閩，……江南易此種，亦可致富殷。」明陶宗儀「南村輟耕錄」上說：「韃靼人跡踏中土，而木綿始移植於我國。閩、粵、關、陝首得其利。元時乃傳至江南，江南又始於松江。有明以來，始遍江北。」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上說：「木綿有二種，似木者名古貝；似草者名古終，或作吉貝者，乃古貝之訛也。」到後來，又慢慢地把「木綿」兩字，簡化成「棉」。

元明以後，棉花的經濟價值，才逐漸引起重視。元王禎「農書」中說，木棉之爲布，「茸密輕暖，可抵繒帛；又爲毳服毯段，足代本物。……且比之桑蠶，無採養之勞，有必收之效；埒之桑苧，免績紝之工，得禦寒之益。可謂不麻而布，不繭而絮。」元至元二十六年（一二八九），在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等地，設立「木棉提舉司」，專責掌管棉事。明代在南京立國之初（一三六八——一三九九），更進一步地正式規定：「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棉各半畝，十畝以上者倍之。稅糧，亦準以木綿折米。」於是，長江流域一帶，棉田逐漸普遍。到清代，康熙所作「木棉賦」，認爲棉花的功用，不在五穀之下，已開始提到桑麻之上了。乾隆所編「授時通考」，棉花更佔到了很重要的篇幅。後來又畫了一套從棉花播種到加工染織整個生產過程的連環圖，題了詩，用石碑刻起，立在保定。從此南方的優良棉種和栽培技術，就很快地推廣到黃河流域來了。不過當時沒有產量調查，更缺乏系統的數字。僅據後來一個叫斯賴特的英國人的估計，在光緒二十七年至三十年（一九〇一——一九〇四）之間，平均年產量約四百萬担左右。

我們知道，棉花的種類很多。但在我國栽培得最廣的，主要就是粗絨棉（亞洲棉，過去一般稱爲中棉），和細絨棉（陸地棉，因爲原在美洲栽培最盛，所以過去一般稱爲美棉）。粗絨棉一般祇能紡十二支到十六支的粗紗，質量當然不够好；細絨棉一般可紡二十至四十支紗，好的可紡到六十支以上的細紗，產量也比較高。

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以前，中國所栽培的棉花，基本上都是粗絨棉。當時，由於洋布入口，一年多似一年，於是滿清政府，也着手開辦機器織布局，並從那年起由美洲引進了細絨棉的種子，但引種的事，都操在大地主大官僚資本家如張之洞、張謇等的手中，他們的主要目的，只是企圖榨取更高的利潤而已，根本談不到什麼栽培技術的研究和推廣，結果當然沒有什麼成效。

辛亥革命以後，也曾一度獎勵植棉，還制定了單用現金來獎勵擴大播種面積的辦法。如：「凡擴充植棉者，每畝獎銀二角；種植美棉者，每畝獎銀三角」等。到一九二〇年，全國共有棉田二千八百多萬畝，年產量六百七十多萬担。這個數字，一直延續到一九三二年，十多年中，雖忽升忽降，但相差都不過一兩百萬担左右，只有從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的那五年之中，產量才較有增加，平均年產量爲一千零八十餘萬担，其中以一九三六年最高，計一千六百九十萬担。抗日戰爭時期無全面統計數。到一九四六年，則已跌至七百四十餘萬担，僅及十年前的半數了。到一九四九年全國解放時，產量爲八百八十餘萬担。

根據上面所引用的歷史資料來分析：

第一、從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起到國民黨反動統治垮台止，前後整

㊀ 詳「玉函山房輯失書」所載目錄。

整半個世紀，在這半個世紀中，中國棉花的年產量，僅僅提高了一點一倍左右。

第二、自蔣介石反動統治開始起到他被逐出大陸止的二十多年中，中國棉花的年產量，雖曾一度上升，但最後還是沒有增加什麼。

二

前面說過，中國的棉花生產，在二十世紀的前半個世紀中，增加得極其有限。可是另一方面，同樣在那半個世紀中，洋棉的進口數量，却上漲得極其迅速。據海關統計，如一九〇一至一九一〇的十年中，進口洋棉共約兩百多萬担，出口中棉則達一千萬担以上，雖然其中有相當大的數量，出口後仍然輸回國內各地，但基本上是出超的。可是到後來僅解放前的三年中（一九四六—一九四八），進口洋棉即達一千三百九十六萬餘担，年平均四百萬担以上，出口數量則極少。

據舊日資料，洋棉輸華，遠在一七〇四年（康熙四十三年），就已經由賣鴉片出名的東印度公司做起來了，初時數量很小。同時中國棉花也有部分出口，如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美國內戰時，輸往日本的也有六十三萬担。特別是一九一九年，出口棉花竟達一百萬担以上，那年出超八十三萬餘担。但也就是從那年以後，則年年入超，一九三〇年進口洋棉高達三百四十餘萬担之多。

而且，按照實際情況，單從「洋棉」一項來說，還不能看出問題的全面。因爲在本世紀初期以前，中國還沒有機器紡織工業，所以進口的「洋布」「洋紗」等，比洋棉的數量既多，價值也高。按洋紗輸華，一八二一年就開始了，最初每年不過幾百包（每包約四百磅），以後不斷增加，最高竟達一百萬包以上。如一八九八年的進口洋紗，列全部進口貨的首位，總值四千萬海關兩。至於洋布，一七八六年就有了進口的紀載。在一八六八年到一九〇八年的四十年中，每年進口洋布、洋紗等棉紡織品總值五千萬至一億海關兩以上，佔各年全部進口貨總值百分之三十五以上。假若再把洋棉加上去，那麼，翻開舊日的關册，自十九世紀中葉，我國開始有海關統計起到蔣介石賣國集團被趕出大陸止，年年佔據各項進口貨價值第一位的，幾乎都是洋棉及其織品。

但值得提出的，一九三〇年以前，洋布、洋紗的數量和價值，都比洋棉大，有時要大上好幾倍；而一九三〇年以後，進口洋棉越來越多，而洋紗、洋布則逐漸下降。按一九三〇年以前，洋布、洋紗，總是佔進口貨的第一位。一九三一年則以洋棉佔第一位。一九三二、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洋棉仍佔第二、第三位，洋布、洋紗則退到第三第四以至第九位以後去了。到抗戰以後，洋棉進口更加嚴重，如一九四六年進口洋棉，共值四千餘億僞法幣㊀，列進口貨的首位，幾與進口貨的總值相等。其數量共六百八十九萬餘担，相當於是年國棉產量的百分之九十五。

爲什麼會造成這種情況的呢？這與舊中國紡織工業的畸形發展和美國壟斷資本的經濟侵略，是分不開的。

前面說過，滿清政府到一八八〇年，才着手籌辦第一個機器織布局，到一八九〇年才有部分紗機開車，可是到一八九三年，這個織布局新購的機器還沒有從外國運到，廠房就失火燒掉了。以後再也沒有拿出錢來重建，而由一班官僚資本家來接手，改名「華盛紗廠」。當時這種資本主義工業的經營，他們還很生疏，興趣也不大。可是帝國主義者却早就注意到了。當時正值甲午之戰。戰後，日本取得了在中國通商口岸開設工廠的權利，首先辦起紗廠來，接着，英、美、德等國，也援例開廠。到一九二五年，全國就有了八十七家紗廠，三百多萬紗錠，在這許多紗廠中，洋商佔的比例很大，特別是日本，日商紗廠的紗錠，要佔全國紗錠總數百分之四十以上。而且所有的紗廠，其全部機器設備，幾乎統統都是進口貨。

爲什麼當時洋商要對中國的紡織工業大量投資呢？暫且單從利潤的榨取方面來分析：

第一、中國的勞動力多，工價低。

第二、中國工人的工作時間長，無所謂三八制。

第三、洋棉可以從海關免稅進口。

第四、中國既有廣大的銷售市場，而鄰近的東南亞也有很大的出路。

這樣一來，洋棉的進口，當然越來越多了。

進口洋棉的來源，主要是從美國、印度、埃及、巴西等地，最初以印棉的比例最大。如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三年，都有一百多萬担，佔各該年進口洋棉總額百分之七十以上，可是一九三一年以後，美棉突然增多。如一九三二年即達三百餘萬担，佔進口洋棉總額百分之八十三以上，超過是年進口印棉七倍。按當時正是蔣介石賣國集團，爲了要擴大內戰，一再派戰犯宋子文到美國去商談並簽訂所謂「棉麥大借款」（共計一千六百萬美元）的時候。從那時起一直到蔣匪幫被逐出大陸，美棉始終高踞進口洋棉的首位。特別是抗戰以後，美國壟斷集團不但藉所謂「聯總」的名義，免稅傾銷其剩餘原棉，並進一步直接控

㊀ 一九四六年直接由海關進口者，計值三千三百五十餘億僞法幣；另有以「聯總」救濟物資名義進口者，計值六百九十餘億僞法幣。共值四千零四十餘億僞法幣，同年，全部進口貨總值計四千一百二十餘億僞法幣。

制了中國絕大多數紗廠的原棉分配權。當時曾出現一種所謂徹底解決中國原棉問題的謬論，那就是：先由美國輸入一批棉花，貸給中國紗廠，由中國紗廠織成紗布，然後就以這批紗布出口㊀，換取外匯，又以這批外匯再購進美棉，或直接掉換美棉。如是週而復始，生生不息。

這種罪惡的陰謀，一方面是妄想無限制地剝削中國工人的勞動，高價傾銷美國的剩餘棉花；而另一方面則企圖徹底扼殺中國棉花的生產。問題還不明顯嗎？

三

根據一般資料估計，在舊中國的最後半個世紀中，國內棉花平均年產量，約六、七百萬担，入超洋棉及其織品（折成棉花），大約也相當此數。因此，以全國人口平均計算，每人每年不過兩斤多花。再拿舊中國紡織工業的生產量來計算，當時最高約爲五百餘萬紗錠，在全部開工的情況下，全國平均每人每年也只攤到十三尺布。可是，從來有的資料上，對於衣被原料的供應問題，却並沒有像糧食問題那樣連篇累牘地令人觸目驚心。

這又是什麼緣故呢？

應該知道，衣被對於人們生活上的重要，畢竟還比不得糧食。沒有吃的，十天半月就會餓死；沒有穿的，如果不是在特殊情況下，問題還不致那麼嚴重。同時，一件衣一條被，縫縫補補可以用上十幾年乃至幾十年。土地改革的時候，不少地方都發現穿過好幾代的棉襖，蓋了幾十年的棉被。可是在吃的方面呢？十斤玉米，最多也維持不了半個月。所以過去在封建反動統治的殘酷剝削下，勞動人民不得不先顧「嘴」，後顧「身」。古代的詩人曾這樣告訴我們：

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
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
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襟；
遍身羅綺者，誰是蠶織人！

關於過去中國廣大勞動人民衣被問題的具體情況，尚未見到系統的調查。僅據一般了解，即在當時華北一帶棉區，農村中除地主富農外，平均每人還不到一套棉衣，而這套棉衣，往往又兼作被蓋。至於其他非產棉地區，不要說棉衣棉被，即最起碼的單衣單袴，也非人人所能有。可是人們對於棉花的需要，則無論棉區非棉區，北方或南方，同樣都很迫切。就是在靠近熱帶的廣東、廣西，越到夏季，越是太陽晒得利害的時候，也越需要衣服，否則便會焦皮中暑。至於在較冷的地方，冬天更非要足够的衣被不可。如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上海曾在一個夜晚，凍死一百多個「乞丐」。

因此，我們可以認定：在反動統治時期，缺衣的人，會比挨餓的人更多；而由於缺乏衣被蚊帳等所造成的痛苦與對健康的損害，可能比飢餓還要嚴重。記得抗戰以後，國民黨反動統治區的較進步的報紙，曾經提出：科學在中國的任務，就是要使人人都有袴子穿㊁。

然而在舊社會，在封建地主、官僚資本和帝國主義的層層壓榨下，像「人人都有袴子穿」這樣可憐的願望，也都是無法實現的幻想。

爲什麼呢？

第一、反動統治階級，不但不維護生產，相反的，只是瘋狂地進行掠奪與榨取。雖然過去若干紡織界的民族資本家和農業科學工作者，也曾在發展植棉上作過一些努力，但事實證明，那種努力是徒然的。如陝西關中棉區，經過某些改良以後，到抗戰前幾年，已成爲國內最好的細絨棉產區之一。可是抗戰期間，却由於反動政府藉口實施所謂「棉價管制政策」，把棉價强迫壓低三分之一以上。一九四〇年棉麥比價爲一比七，一九四五年僞農本局的「官價」已低至一比四點五。致使棉田拋荒和改種的，竟達原有面積百分之六十五。

第二、舊中國的紗廠，絕大多數都開設在沿海一帶大城市，在當時內地交通運輸條件的限制，與反動政府媚外政策的影響下，洋棉的供應，往往比國棉佔有優勢，原棉市場，基本上都被外商所控制，特別是抗戰以後。如一九四七年年末，上海細絨棉市價高達每担僞法幣四百萬元，而陝西產地價格，還不到二百萬元。這樣，進口洋棉的利潤極大，而內地棉農則已無法維持其再生產了。

第三、也可以說是最主要的：過去農民根本不願種棉花，即使種，也不敢多種。我們知道，棉花是一種經濟作物，自己的消費有限，必須出售後再換取其他生活資料與生產資料。而一般貧苦農民，在朝不保夕的情況下，一邊收花，一邊就要急着出賣。於是剝削階級掌握了這個矛盾，每屆新棉上市，總是棉價下跌。偶然遇到年成特別好，棉農才會略微獲得一點好處。所以除了有力囤積、可以待價而沽的地主、富農外，一般貧、中農，都把多種棉花當着像賭博一樣冒險的事。而當時在高額地租與捐稅的壓榨下，誰還去冒這個險呢？

第四、棉花的栽培，比一般農作物所需要的生產資料和人工、技術，都要高一些。如在人工方面，據當時的調查，一畝能收一百斤籽棉以上的棉田，南方要十九個工，北方要十二個工。較之種水稻、小麥，要超過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同時棉花的病虫害又較多，在個體分散的小農經營和嚴重的缺乏農用藥械的情況下，一旦發生病虫災害，就只有拋荒廢棄。

第五、反動政府長期不修水利，不少棉區，有的僥倖搶着下了種，但到開

㊀ 可銷東南亞等地，此時已無日商競爭。

㊁ 一九四七年一月，漢口「大剛報」社論。

花結鈴時，又被一場洪水冲掉。這種情況，過去在蘇北、在河南、在鄂中、在洞庭湖濱等棉區，幾乎是年年都要發生。

……

在那樣惡劣的政治、經濟以及自然條件下，舊中國的棉花生產，又怎樣會發展起來？

四

如果說舊中國的棉花生產問題，是尖銳地體現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經濟形態；那麼，幾年來新中國的棉花增產工作，則是具體地說明了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優越性。

新中國成立的那年，即一九四九年，全國棉花的總產量只有八百八十多萬担，單位面積產量僅僅二十一點四斤。這個數字，不要說與今後國家工業建設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要求，相距太遠，就是比起那以前曾有過的年產量高紀錄，也已經跌落了百分之四十以上。

針對着這一嚴重的情況，黨和政府在號召增產糧食的同時，也及時提出了增產棉花的具體任務，要求在一九五〇年內，全國棉花的產量達到一千三百萬担。也就是在一九四九年的基礎上，提高百分之五十。我們知道，這樣的增產速度，在舊中國棉花生產的歷史紀錄上是從未有過的。而且我們還應該知道，當時不少重要棉區，正忙着進行上年遺留下來的水災救濟工作，廣大災區的生產資料還感到嚴重的缺乏。

可是，到了一九五〇年工作總結的時候：全國共計種棉六千餘萬畝，除部分遭受水、旱、蟲等自然災害的四百萬畝減收或改種其他作物外，收穫面積約達五千六百萬畝。共產皮棉一千四百二十餘萬担，超過一九四九年五百三十餘萬担，超過中央計劃五十餘萬担，達到戰前棉花最高年產量百分之八十三點七〇。

在一九五〇年超額完成任務的勝利基礎上，新中國的棉花增產工作，繼續發展。一九五一年達二千餘萬担，一九五二年高達二千五百萬担以上，超過一九四九年產量百分之一百九十一，超過戰前最高年產量百分之五十二。一九五三年由於國家有意識地不讓棉田過分擴展，加以不少棉區受災，對產量略有影響，但仍超過一九四九年產量百分之一百六十五，一九五四年雖又遭受了百年來未有的洪水，據初步估計仍可超過一九四九年產量的百分之一百八十。

同時，幾年來，全國棉田的單位面積平均產量，也有了顯著的提高。前面說過，一九四九年每畝棉田平均產量僅二十一點四斤，一九五〇年即增至二十五點七斤，到一九五二年已達到三十點八斤了。三年內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三點九。

應該指出，以上的成就具體地說明了新中國的棉花增產工作，在短短的三五年間，已經做出了舊中國要一百年還不一定能夠做出來的成績。

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力量，能夠造成這一奇蹟般的事實的呢？這主要是共產黨的和人民政府正確領導，人民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和全國範圍內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沒有這些優越的先決條件，不但棉花生產，就是其他一切生產的發展，都是不可能也不可想像的。

已經說過，從前一般貧農、中農，往往把多種棉花當作像賭博一樣冒險的事，不願多種，不敢多種。解放以後，人民政府首先頒佈了一系列保障棉農利益的政策，如在每年棉花播種之前，就按各個不同地區，公佈棉花和糧食的比價。不少地區的供銷合作社，又與棉農直接訂立預購合同，保證植棉有利。僅一九五二年國家在預購棉花時所支付的肥料、布疋、煤、鹽等工業品和糧食，就值七千多億元（舊人民幣）。同時，一般種植棉花的收益雖比較多，但政府仍按糧田的標準徵收農業稅，並准許以棉代糧。

其次，政府又大力供應棉區各種必需的生產資料。如幾年來供應棉區的噴霧器和噴粉器，已達六十萬架以上，供應的各種農藥，僅一九五二年一年內，即達七千九百餘萬斤，這一年，由於及時防治了棉花病蟲害，因而減少了約計一百五十多萬担產量的損失。至於肥料，過去棉田很少施用細肥，現在全國棉田每年所施用的餅肥與化學肥料，已達一百萬噸以上。另外，政府又大力興修水利，排除水害，從而不斷地擴大了棉田灌溉面積，按一般北方棉田，灌溉與否，產量常相差五十至六十斤籽棉。幾年來，河北、山西、陝西等主要產棉省分的灌溉棉田面積，已增加到總面積百分之二十五以上。這對棉花產量的提高，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三，政府有計劃有組織地推廣優良棉種。從一九五〇年起，即在全國主要棉區選定了十個細絨棉推廣種，設置了一百多處良種繁殖基地，先後建立了六十四所良種軋花廠。幾年來累計貸發的優良棉種共三億一千多萬斤，並普遍發動羣衆進行選種留種工作。到一九五三年全國良種棉田面積已佔總面積百分之六十二，比一九四八年擴大了二十四倍之多。按一般良種可較農民原來的棉種增產一成至兩成，衣分、絨長都有顯著的提高。

第四，學習了蘇聯先進經驗，推行了羣衆性的技術改進工作。主要的如深耕、密植、及時播種、保苗勻苗、合理灌溉、適當整枝、減少蕾鈴脫落和防止徒長晚熟等，這樣不但逐年提高了單位面積的平均產量，而且不斷出現了單位

㊀ 詳見「中國農報」一九五一年，第一期。李書城：「一九五〇年全國農業生產的概況」。

面積的高額豐產。如過去每畝棉田產量，很少能達到四、五百斤。但解放以來，如山西吳春安農業生產合作社，在一九五二年時，即創造了每畝產籽棉一千零二十一斤的紀錄；新疆瑪納斯河流域軍墾農場，在一九五三年，又創造了每畝產籽棉一千三百四十九斤的紀錄。

第五，值得着重指出的是，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組織與國營農場的發展，爲棉花增產帶來了有利的條件。前面說過，由於棉花的栽培需要較多的人工和複雜的技術，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不容易也不可能得到充分的發展。而棉農一旦組織起來之後，就能够加强田間管理，及時地進行各種技術措施，所以如吳春安、曲耀離、吳宣文等棉花豐產勞動模範，也都是出色的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組織的領導人。至於國營農場，由於機械耕作的優越條件，和幾年來對蘇聯先進經驗的學習，不但已不斷地創造了高額豐產的紀錄，而且還給廣大農民以具體的示範和教育，如北京國營五里店農場的籽棉產量：一九五〇年每畝爲一百三十三斤，一九五一年即增至二百一十五點八斤，一九五二年又增至二百二十八點六斤，一九五三年更增至二百七十五點七斤。這對該場附近農民，也是莫大的鼓舞和生動的社會主義教育。通過以上許多事例，使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今後隨着農業合作化與國營農場的發展，我國的棉花增產工作，一定會更快地獲得更大的成績。

五

二十五年前，當蘇聯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後不久，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所作關於中央委員會政治工作的總結報告中指出：「在蘇聯這裏，羣衆消費額(購買力)的增長，總是超過生產額的增長，推動着生產向前進展；反之，在他們那裏，在資本家那裏，羣衆消費額(購買力)的增長，總是趕不上生產額的增長，總是落後於生產額的增長，常常使生產陷入危機」。

今天，拿我國棉花的生產和消費情況來看，恰恰也是如此。根據以上所作五十餘年來中國棉花生產情況的分析，與解放前後棉花生產的對比，充分的證明了：幾年來在黨與政府正確領導之下，棉花增產工作所獲得的成績是十分巨大的，三五年內，產量已增加兩倍，已相當於戰前最高年產量的百分之二百五十二。同時，棉布的生產，也發展得很快。一九五〇年全國棉布的產量是七千多萬疋，就已經超過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到一九五三年又增加到一億四千多萬疋，比一九五〇年提高了一倍，約等於解放前最高年產量的百分之二百四十三，爲一九四九年產量的百分之三百六十三。全國每人平均已可得二十三尺。可是，在另一方面，廣大羣衆的消費量却增加得更快。一九五〇年全國棉布的銷售總數還只有五千多萬疋，到一九五三年就增加到一億三千萬疋以上了。再以各年棉布產銷的百分比來看：一九五一年產布比一九五〇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九，而市場銷售量却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一九五三年產布又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七，而市場銷售量却比上年又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七。

爲什麼市場銷售量會增加得那麼快的呢？主要是過去廣大羣衆的生活水平太低，衣被用品太缺乏了。正如前面所說，從前是糊口還不容易，那能顧得上穿的蓋的，如今吃的問題基本上已經解決，就隨着要求穿得暖和甚至開始要求穿得好看一些了。

從幾個典型的例子來看：如東北黑龍江白城縣勝利村，過去那兒的老鄉也是跟一般農村一樣，所謂「一舖一蓋，兩條麻袋；一棉一單，兩件破衫」。可是解放以後，一九五〇年每人平均買了二十一尺布，一九五二年每人平均買了二十六尺布，一九五三年每人平均買了三十四尺布。又如上海國棉一廠北織布機車間有十個工人，解放前他們整天織布，可是自己穿的却是補上加補，幾年做不起一件新衣服，其中有個女工王阿三，結婚時縫的一件土布棉襖，就穿了十四年。解放後幾年來，他們這十個人可不同了，一共先後添了十二條棉被，三十三件棉衣，二十二件夾衣，七十一套單衣。……只要全國每人多添一件衣(不是一套)，總計起來，就要多用三、四千萬疋布，也就是三四百萬担棉花，如果平均每十人多做一條被子，那個數目當然更要驚人。所以，只拿東北一個地區來說，解放後五年內的棉布消費量，就增加了十三倍多。

爲了適應這一人民生活改善的要求，國家在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的同時，也相應地發展了輕工業，而在輕工業中比重佔得最大的就是紡織工業。五年來，我國新建和擴建的棉紡織廠、印染廠等，有好幾十個。而且還建立了自己的紡織機器製造業，開設了紡織機械工廠，這些工廠的產品，基本上已能滿足國內的需要。

前面說過，舊中國的紡織工業，不但有相當大的一部分，直接由外商經營，而且全國絕大多數的紗廠，都開設在遠離棉花產地的沿海一帶大城市，無論機械、原料都靠外國進口。解放以後，已經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五年來，在全國各主要棉區分別建廠，如陝西已建立起三座現代化的棉紡織廠，第四座也早已興工，又如河南鄭州，現在已成爲一個新興的紡織工業城，這裏已建立起一個紡織機械廠、三個棉紡織廠。另外，北京、武漢、以及河北的石家莊、邯鄲等棉區，都將發展爲紡織中心，還有四川重慶、雲南昆明，也都新建或擴建了紡織廠，連新疆省也已經出現了現代化的紡織廠。據估計在一九五四年年底時，全國投入生產的紗錠總數，要比全國解放時所有能够生產的紗錠總數，增加百分之二十二點三，織布機(不包括棉織廠和染織廠的)，將增加百分之二十六點五。而紡織品增長的比例，更要大大超過設備增長的比例。

非常明顯，隨着紡織工業的發展，棉花生產必須相應地配合上去。比如新建一個五萬紗錠的紗廠，一年可出產四萬一千多件紗，用這些紗，可以織成一百五十萬零五千多疋布。但同時它也需要一十六萬二千多担原棉的供應。按近年來全國棉花平均單位面積產量計算，就需要擴種五十多萬畝棉田，才能達到那個產量的要求。可是，過去幾年我國棉田已經擴大了不少，一九五〇年才五千多萬畝，一九五四年已增加到八千多萬畝，在目前的情況下，固然還可能適當擴展，但如果過急的和過分的擴大棉田，勢必就會縮少糧田，減少糧食的產量，所以這是不妥當的做法。

有人以爲不妨再從國外進口一些棉花來，可以解決問題。但也應該知道，大量輸入棉花，佔去很多外匯，就會縮減工業器材的入口，影響整個國家工業化的建設。

那該怎麼辦呢？

陳雲副總理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關於政府工作報告的發言中說：「增加生產是解決供不應求的根本辦法，但是產量是不能立刻大量增加的。就現在條件來說，解決消費品供應的辦法有兩種：一種是聽任這些消費品被囤積居奇，搶購漲價，……另一種辦法是實行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我們採取後一種辦法是完全正確的。」

我們知道，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就是在商品不足的條件下，使國家能夠掌握到必需數量的商品，以便合理地有計劃地調劑全國人民的消費需要，使全國人民的需要都能夠得到適當的滿足。同時，計劃供應雖然要緊縮過高的消費，但整個說來，並不是縮減一般的消費，而是保證全國六萬萬人基本的需要，並且隨着生產的增長，計劃供應的份額還將不斷地提高。因此，自從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起，在全國範圍內實行棉花的計劃收購、棉布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以來，已獲得生產者和消費者一致的擁護與支持，市場的棉花、棉紗、棉布及其他棉製品的價格，更是始終穩定。

六

根據以上的分析，使我們最後還必須討論這麼兩個問題：

第一，究竟要增產多少棉花才能夠滿足廣大人民的要求？

第二，我們是否具有那樣的條件來滿足這個要求？

對於頭一個問題，不可能提出一個具體的數字。因爲衣被原料的需要量的彈性比較大，它不像糧食那樣具有一定的消費限度。在一般情況下，平均每人只要有單夾棉三五套衣服，三五年換一次新的，已經能初步表示滿意了。可是隨着生活水平的上升，平均每人能有十幾套衣服，兩三年就換一次新的，那當然更好。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棉花的用途，除了紡紗織布之外，胎絮、醫藥、化工、國防各方面都需要它，今後隨着國家工業化的發展，棉花的需要量，勢必大大提高，這是肯定的。

但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值得一併提出，就是隨着科學的進步，工農業的不斷發展，到將來，毛織品、絲織品以及人造纖維等的使用，也會迅速的擴大。因而會相對地降低棉花的重要地位。

從發展上看，這是必然的。不過由於棉花本身除掉衣被之用之外，還有其他許多重要的用途，這些用途，同樣也會隨着科學的進步而不斷地發展。何況我們目前對於棉織品的需要還是大大的不够呢？因此我們決不能爲了若干年後才會發生的新情況，就開始放鬆對增產棉花的努力。所以根據國家農業生產計劃，僅在一九五五年內，就要求比上年增產皮棉四百五十萬担。

有沒有繼續地大量地增產棉花的條件呢？

首先，從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上來看，棉花增產的潛在力還是十分雄厚。前面說過，解放後三年之內，全國棉田的單位面積產量，就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三點九，乍看起來，好像增加得够快的了。可是實際上，還裏面還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據一九五三年的估計㊀，各省棉田單位面積的皮棉平均產量如下：山西四十六點四斤，熱河四十點六斤，陝西三十九斤，江蘇三十四點七斤，河北三十三斤，而河南才二十二點六斤，安徽只有十七斤。這可能說是由於自然條件不同的影響，但也有在自然條件相同的地區，產量的差別却是很大的。如一九五二年河北省南宮縣四十多萬畝棉田，平均產量爲三十四點七斤，而相鄰的威縣五十多萬畝棉田，每畝平均却只有二十五點八斤，此外尚有不少特別低產的棉區，如湖北襄陽，河南信陽、南陽，安徽宿縣、阜陽以及江蘇淮陰等六個專區，六百六十多萬畝棉田，幾年來平均每畝產量都還不到二十斤㊁。

但是，同樣也還有不少特別高產的棉區，如河北豐南、石家莊市，山西夏縣、解縣和虞鄉等，每畝產量達籽棉一百六十五至二百六十四斤，江蘇南通三餘區十三萬多畝棉田，一九五三年平均產量達籽棉一百五十斤，新疆吐魯番縣四萬餘畝棉田，一九五四年平均產量達籽棉三百一十四斤半，其中設在該縣的省棉作試驗場九畝半栽培蘇聯種的棉田，平均每畝產量高達籽棉一千三百二十四斤。至於蘇聯棉花的單位面積產量，一九五一年爲籽棉二百八十斤（每公頃

㊀ 一九五三年全國棉產工作會議估計，「中國農報」，一九五四年第三期，第十九頁。

㊁ 一般籽棉與皮棉的折合率爲三比一，即三斤籽棉大致可軋成一斤皮棉。

二十一公担），超過我們兩倍以上，而小面積的每畝最高紀錄更達二千零六十六斤。

目前全國棉田面積約八千餘萬畝，只要每畝平均增產十斤，即達到皮棉四十斤，就可使現有年產量增加皮棉八百萬担。將來當我們的平均產量接近蘇聯的水平時，全國棉花總產量就可達到七千五百萬担以上，超過戰前最高年產量五倍多。何況到那時棉田面積已經不斷地擴大了呢？

其次，關於擴大棉田面積的問題。前面說過，幾年來全國棉田面積已比解放初期擴大了將近一倍，許多老棉區的棉田，已經相當集中。然而是不是在目前條件下，棉田已經沒有繼續擴展的可能性了呢？不是的。據調查㊀：就在幾個主要的產棉省區裏，如河北、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等省，現在百分之八十的適宜於植棉的縣分，其棉田面積還只佔總耕地面積的百分之二十以下，還有着繼續擴大的條件。此外，如四川省的山區植棉已獲得成功，可以繼續擴大。至於新疆、甘肅、河北、山東、江蘇等省，也還有大片荒地可以開墾。特別是新疆，發展前途最大。如前面所說的該省瑪納斯河流域的軍墾農場，幾年來在蘇聯專家提托夫教授的指導下，在從未種過棉花的荒地上，從一九五〇年起開墾植棉。第一年每畝平均產量才籽棉五十一點二斤，第二年提高到七十八點九斤，第三年即達到一百二十點四斤，第四年更高達三百五十七點六斤，其中有兩萬畝竟超過四百斤。像這樣美好的可耕地，在西北，特別在新疆，還有着大量的存在。

大規模的開墾生熟荒地，是增產糧食、棉花及其他農產品的主要途徑。蘇聯在一九五四年內進行開墾，而將在一九五五年內進行播種的生荒地，已有一千七百萬公頃。並決定到一九五六年要達到二千八百萬至三千萬公頃。是怎樣能夠具有這樣高的速度和這樣大的力量進行開墾的呢？赫魯曉夫同志告訴我們：「社會主義農業是以頭等的技術裝備起來的，爲了開墾新地，蘇維埃工業能夠供給足夠數量的拖拉機、聯合收割機和其他機器。

我們有進行大規模社會主義生產——農業機器拖拉機站、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必要的領導幹部和組織幹部，有大批的農業專家和機務人員在從事農業工作。

因此，我們有一切條件來開墾新地。」㊁

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而我們的今天的任務，就是要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實現國家工業化。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隨着國家工業化的發展，隨着農業合作化、機械化的發展，新中國的棉花增產工作，必然會獲得極其輝煌燦爛的成就。

㊀「農業部關於一九五五年及今後三年棉花增產的主要措施」，見「中國農報」一九五五年第四期。

㊁「關於進一步發展蘇聯農業的措施」，財政經濟出版社版，第一三三頁。

孟德斯鳩——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維護和平的思想家

徐大同

（上接第63頁）儘管孟德斯鳩的政治觀點是唯心主義的；是爲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對後世影響最深的三權分立學說實際上也只是一種虛構，但在當時條件下，他的思想是起了進步作用。孟德斯鳩和法國其他啓蒙思想家一起，揭露了宗教的荒謬的教義，反對了封建的專制制度，提出了資產階級自由、平等、法制以及維護和平、反對戰爭的思想。這些思想啓發了人們的意識，鼓舞了人們反對封建的鬥爭，對法國資產階級革命起了重大作用，成了它們爲爭取自己政治權利而鬥爭的行動綱領。

一七八九—一七九四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推翻了專制的封建國家，打破了法國的封建關係，爲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開闢了道路。這個革命是資本主義上升時期一切革命中最堅決的革命，它對以後各國資產階級革命、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起了巨大的影響。

法國資產階級利用了革命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們攫取革命果實，他們把政權攫取在自己手中，在封建廢墟上建立了自己的「王國」——資產階級王國以後，便走上了反動的道路，屠殺人民，使人民羣衆的革命發動淹死在血泊之中，並利用孟德斯鳩三權分立學說，欺騙羣衆，掩蓋資產階級專政的實質，維護自己的統治。當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資產階級更根本拋棄了在革命時所舉起的資產階級民主、自由和民族平等的旗幟；拋棄了在其革命時所提出的法制原則，推行法西斯政策，向勞動人民猖狂進攻。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集團，更企圖發動新戰爭，以遂其奴役世界各族人民、獨霸世界的野心。因此，當我們紀念孟德斯鳩之際，我們應該更清楚地認識到現代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統治的反動性，揭露帝國主義破壞和平、挑撥戰爭、妄想奴役世界各族人民的一切陰謀詭計，爲保衛和平、反對戰爭、反對奴役而鬥爭！

貨幣流通規律與貨幣流通計劃化※

鄭伯彬

在我國實現社會主義建設中，幣值的穩定和貨幣流通之有計劃的調節，用以適應生產與商品流通的需要，是順利推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重要條件之一。大家知道，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需要穩定的貨幣用以開展商業，擴大市場，溝通城鄉關係；在轉入計劃建設的時候，更需要穩定的貨幣和有計劃的組織貨幣流通，把它分配到社會主義工業化所必需的方向，加速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現。

在實施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幣值的穩定和貨幣流通之計劃調節，也同樣具有重要意義。這不但是因爲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的存在，市場物價的波動還存在着可能性，而且，在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由於主要農產品——糧食、棉花、油料的計劃收購，需要投放大量貨幣，而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在組織商品供應上的任務，又較前更爲艱巨；如果貨幣流通的組織不能與生產和商品流通相適應，貨幣價值不能穩定，勢將深刻影響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事業。

這樣，深入研究貨幣流通，從理論與實際中分析貨幣流通規律，進而有效地運用於貨幣流通組織工作，在今天說來，是非常必要的了。

現在，爲了瞭解我國貨幣流通計劃化所根據的規律，爲了加强貨幣流通計劃化的信念，我們首先來闡述貨幣流通規律及其與貨幣流通計劃化的關係。

一

馬克思在研究貨幣和商品流通時，曾經指出，貨幣流通與商品流通是有所不同的。商品流通在它的第一形態的變化之際，商品會從流通中退出，即在商品交換中的「商品——貨幣——商品」的變化過程裏，當商品發生第一形態變化，變爲貨幣時，該商品就從流通中退出，由新的商品不斷地遞補進來；但是，貨幣在流通中，却不斷地停留在流通界：作爲流通手段的貨幣，是不像商品那樣退出流通，而是在商品交換中不斷地運動着的。因此，這裏必然要發生這樣一個問題：就是究竟有多少貨幣爲流通界所吸收？爲了滿足商品流通的需要，社會上究竟需要多少貨幣呢？這個問題的提出，在組織與調劑貨幣流通上，顯然是具有極重要的現實意義的。

首先，我們單從作爲流通手段的貨幣來進行觀察：因爲作爲流通手段的貨幣只運用於和商品的直接交換，商品購買者手中的貨幣是要與商品出售者手中的商品相交換的，所以，商品流通過程所必要的作爲流通手段的貨幣量，應該由流通中的商品總價格所決定。

如果商品價格不變，社會必要貨幣流通量就決定於流通中的商品總量。一國流通中的商品總量增加，流通所必要的貨幣量也必隨之增加，反之，一國流通中的商品總量減少，流通所必要的貨幣量即隨之減少。流通中的商品量和社會必要的貨幣流通量構成一種正比例的關係。但是，一國的商品流通，是包含着許多在時間上、空間上不同的轉形過程的：在一定時間內，同一單位貨幣可能只流通一次，也可能流通數次；有時候，許多商品交換同時進行，有時候，是一部分交錯進行，或是順序進行。所以，同一單位貨幣經常發生次數不等的流通，如果把流通中的貨幣的流通次數加以綜合觀察，可以看到貨幣流通的平均速度。貨幣流通次數的增加，意味着貨幣流通速度的加快，也意味着同一貨幣可多次完成商品的交換，因而，同一貨幣的流轉次數，就和流通所必要的貨幣量構成一種反比例的關係。如以公式表示，就是：

$$\frac{\text{商品總價格}}{\text{同一單位貨幣的流轉次數}}=\text{作爲流通手段的貨幣必要流通量}$$

應該指出：作爲流通手段的貨幣流通量，既由商品總價格所決定，而貨幣流通速度「也只表現商品形態變化的速度，表現商品形態變化序列的連續的錯綜，表現物質變換的迅速，表現商品迅速從流通範圍退出和同樣迅速由新商品代替」㊀。這和資產階級學者認爲貨幣流通的加速與停滯，是由於貨幣流通量的不足或多餘的說法，毫無共同之處。馬克思在這裏着重地說明了貨幣流通速度是由商品轉形速度所決定的。

一國流通所必要的貨幣量，由商品價格總額和同一單位貨幣的流轉次數所決定，是馬克思所發現的貨幣流通的基本規律。這個規律反映了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客觀的存在，只要是還存在着貨幣，這個規律就要起作用。在人們

※ 本文所稱貨幣流通規律，係指貨幣流通必要量的規律而言。

㊀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一四頁。

使用金屬貨幣的時候，如果貨幣流通量大於商品流通的需要，就要通過金屬幣的自動退藏作用（多餘的貨幣退出流通界爲人們收藏起來），使公式的兩端相等；如果人們使用紙幣——價值的符號，而紙幣的發行量大於商品流通的需要量時，那末，每一單位紙幣所代表的價值量就要按比率地降低，而由於每一單位紙幣所代表的價值降低的結果，儘管紙幣流通量有所增加，上述公式的兩端仍然相等。這個貨幣流通的基本規律，是早經長期的歷史所證明了。

自然，以上所說的，只限於作爲流通手段的貨幣，如果考慮到貨幣還具有其他機能，那末，一國流通所必要的貨幣量，還要決定於其他的因素。這就是：

（1）在一定時期內，商品中有不用現金出售而是以信用賣出的，這一部分的商品價格，應該剔除；

（2）如果在這一定時期內，以前已經以信用出售的商品，約定了在本期要支付價款，那些商品雖已脫離了流通界，因爲在這時仍需以貨幣支付，應該加算進去；此外，在這期間內如有納稅還債等其他支付，也應一併計算；

（3）到期支付的一部分，有些是可以互相抵帳冲銷的，這部分不用現金的相互結算，也應該扣除。

這樣，社會必要的貨幣流通量的決定，就應該是：

商品價格總額－信用售出的商品價格＋到期支付的總額－互相冲銷的支付額

同一單位貨幣的流轉次數

二社會必要貨幣流通量

這就是馬克思所指出的社會必要貨幣流通量的公式，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貨幣流通規律的簡要說明。但是，當具體組織貨幣流通的時候，對於這個規律，經常發生一些不正確的看法，其中最主要的，有如下兩種：

第一，是對於規律本身的懷疑。發生懷疑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認爲上述公式所列的幾個決定社會必要貨幣流通量的主要因素，是不能事先核計的，所以，這個貨幣流通規律對於貨幣流通的計劃化沒有現實的意義；一是認爲上述公式不能說明過去的許多實際情況，特別是和我國目前的貨幣流通的實際情況不符。

前一種看法，是不明白在社會主義經濟條件下貨幣流通的特點。這個公式所規定的幾個因素，在資本主義的經濟條件下，確是不能事先核計（正是因爲這個原故，這個規律在資本主義社會只是自發地起作用）；但在社會主義的經濟條件下，像後面要詳細說到的一樣，它就是可以事先核計的了。

後一種看法，主要是根據我國近年貨幣流通的情況，認爲這一規律在我國的經濟條件下，已不起作用。因爲我國近年的貨幣價值是穩定的，而近年來的貨幣流通量也是逐漸增加的，貨幣流通量的增加雖說是由於五年多以來工農業生產都有飛躍的發展，流通中的商品量更由於城鄉聯系的溝通，農產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而有顯著增加，但是，市場貨幣流通量的增加率並不與商品量的增加率相一致；有些人以爲自從人民銀行開展非現金結算業務以來，許多商品交易是不使用現金的，這部分還要從社會必要的貨幣量中扣除，對於這個規律的作用，就似乎更是不可理解的了。

我們應該指出，這種看法是片面的。馬克思曾經說過：各種「不同諸因素的變動可以互相抵銷」，「特別在我們考察較長期間的時候，我們發覺，在一國內流通的貨幣量的平均水準，並不像我們從表面現象去看將會預料的那樣時時變動」㊀。如果我們僅從某一較短期間來看，或是僅從某一個因素來看，確是有某些不可理解之處，但是，如果從較長時間去觀察，從各個有關因素綜合觀察，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了。例如，在全國大陸解放以後的最初幾年，市場貨幣流通量的增加，除了適應當時商品量增加的因素以外，還必須注意在一九五〇年財經統一物價穩定以後，市場上以物易物的現象被消滅，市場上的銀元、雜鈔、外幣也被人民幣所代替的因素。如果我們能更全面的觀察，我們就不能從某些單獨的、短時期的現象來否認上述貨幣流通規律的作用。

第二，是和上述對規律的懷疑正相反，他們不懷疑這一規律的存在與作用，而是機械地把貨幣流通規律理解爲單純的數學公式。在貨幣流通的組織工作中，一定要根據上述公式算出貨幣必要流通量的精確數字。

應該指出：在組織與計劃貨幣流通的實踐過程中，重視貨幣流通規律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把貨幣流通規律看做是單純的數學公式，單從這一公式算出貨幣必要量的精確數字，是對貨幣流通規律的教條主義的理解方法。如上所述，馬克思研究貨幣流通規律，是從商品流通與貨幣流通的區別的研究開始的。它主要是闡明貨幣流通與決定貨幣流通的幾個因素的關係；並進而闡明一國流通所必要的貨幣量的存在，說明價值符號（紙幣）代替具有完全價值的貨幣流通的可能與限界。

大家知道，在資本主義社會，根據貨幣流通規律中的幾個決定貨幣流通量的因素，來計算貨幣必要流通量的精確數字是不可能的。姑不論在資本主義社會，沒有這樣一個機關或個人來從事這種計算工作，而且，在資本主義的經濟條件下，也根本不可能根據這一公式計算出社會必要貨幣流通量。

在資本主義下，流通中的商品總量是一個不可能事先確定的因素，商品的

㊀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一六—一一七頁。

價格是自發的盲目的市場運動所規定的，而決定貨幣流通速度的商品交易的速度——商品形態變化的速度，更不是事先所能預見的。這一切都取決於盲目的市場運動，取決於價值規律的盲目的調節作用。如果我們更從支付手段的幾個因素來看，以信用銷售的商品量，相互冲銷的支付額、到期債務和其他支付，以及作爲支付手段的貨幣的流通速度，也都是取決於盲目的信用活動，取決於自發地產生的債權債務關係，和以追求利潤爲目的的資本主義銀行的盲目的活動。

這一切的事實，一方面說明了馬克思所發現的貨幣流通規律在於闡明貨幣流通取決於商品流通方面的諸因素及其相互關係；另方面，也說明了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貨幣流通用以適應生產和商品流通的需要，只有在社會主義的經濟條件下，才有可能。但是，在社會主義的經濟條件下，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貨幣流通，也只是根據這一規律，分析其更具體的因素來進行。把上述公式機械地理解爲唯一的數學公式，單從這一簡單算式來進行貨幣必要流通量的核算，是不恰當的。

由此可見，馬克思所發現的貨幣流通規律的主要意義，是提供了我們具體組織貨幣流通的最重要的理論根據，只要存在貨幣流通，這一規律就要發生作用，因此，在具體組織與計劃貨幣流通時，必須充分注視上列公式所規定的各個因素；但是，如果把貨幣流通規律理解爲唯一的、單純的計算公式，斤斤於這一公式的核計，而不結合周圍經濟條件分析更具體的因素，是不能精確測定社會必要的貨幣量，使貨幣流通適應於生產與商品流通的需要的。

二

現在，我們結合社會主義的經濟條件來進行分析：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如何運用貨幣流通規律來自覺地、有計劃地組織貨幣流通。

首先，我們要理解在社會主義下的貨幣流通與資本主義下的貨幣流通的根本區別。它們之間的根本區別，在於：資本主義社會的貨幣流通是爲少數資本家的利益服務的。由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經濟規律與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的規律起着作用，在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流通，是完全自發的、盲目的：它從許多出發點出發，流向不同的各點，流通的數量和渠道完全由是否能够取得利潤和取得多少利潤來決定。然而，在社會主義社會，貨幣流通就不是爲了少數人的利益，而是爲了勞動人民的利益，爲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利益；在社會主義社會，由於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和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起作用，貨幣流通是有計劃有組織的。在社會主義社會，國家銀行是唯一的現金中心和出納中心，貨幣流通從一點出發，最後又回歸於一點。貨幣流通的數量和渠道，不決定於利潤而決定於整個國民經濟計劃。

社會主義國家貨幣流通的有計劃性質，首先是在生產資料公有的基礎上產生的。生產資料的公有從根本上消滅了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切投機活動，消滅了虛擬資本的存在；這就提供了貨幣流通與經濟週轉的需要相一致的重要基礎。在生產資料公有制下，貨幣流通反映着生產與商品流通的需要，反映着社會主義經濟不斷增長的需要。

社會主義生產與商品流通以及其他決定貨幣流通的各種因素，都在國民經濟計劃的任務中，可以找到具體的反映。國民經濟計劃預先規定了各種影響貨幣流通的因素。首先是在各種物質財富的生產和分配計劃中，規定了各種經濟指標，如產品的生產量及其構成，各種產品的價格、成本、職工數目、工資基金、國家的採購和商品流轉額等；其次，在各種財政計劃中，更規定了通過財政與信貸的方法進行國民收入分配與再分配的各種指標，如週轉稅、上繳利潤和投資撥款、信貸等與貨幣流通密切相關的因素。

這裏，我們很容易看出來，國民經濟計劃不僅規定了與貨幣流通具有密切關係的商品量和價格，即規定了決定作爲流通手段的貨幣必要流通量的最重要的因素，而且，由於在社會主義經濟中，作爲商品的只限於一般消費資料，在國民經濟計劃裏，還可以看出居民貨幣收入與國家的和合作社的商業零售貿易額的關係。

國家的財政計劃和銀行的信貸計劃，也是貨幣流通計劃化的重要基礎。蘇聯的國家預算不但是在整個國民經濟的財務計劃的基礎上進行編製的，而且，由於預算收入經常超過支出，保證了貨幣發行不可能再有財政發行；而信貸計劃更是根據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實際的生產與流通過程的需要來編製和執行的。這就決定了所有一切作爲支付手段的貨幣流通，同時，也提供了作爲支付手段的貨幣流通計劃化的重要根據。

但是，國民經濟計劃雖然提供了貨幣流通計劃化的重要依據，因爲貨幣流通的決定因素很多，國民經濟和各階層居民的收支關係很複雜，在具體組織貨幣流通的時候，還有賴於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所特有的，貨幣流通的如下優越條件。

社會主義貨幣流通的組織與計劃的主要優越條件之一，是在國民經濟中的一切貨幣支付流轉，分爲兩種形式——現金的支付與非現金的支付，並且，這兩種形式的支付是嚴格劃分了的。這就是：在現金流通的領域，主要是與居民有關的貨幣收支，如工資、津貼、補助費、養老金、集體農莊莊員按勞動日分配的收入、居民出售商品或提供勞務的收入，以及居民購買消費品的支出或對國家繳納租稅、對公用事業或文化娛樂事業的支出等類；非現金流通的領域，

主要是國營企業與機關之間的貨幣收支，所有國營企業相互間、企業與機關之間或機關與機關之間的貨幣收支都是通過銀行劃撥轉帳的，國營企業與機關和集體農莊間的貨幣收支，大部分也採用非現金的結算。這樣，由於非現金結算的制度的存在，使現金的流通主要只限於與居民有關的收支，就使掌握現金的數量與流通的渠道，也即對貨幣流通的組織與計劃，提供了最優越、最便利的條件。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貨幣流通的組織與計劃的另一優越條件，還有國家銀行是現金流通中心，也即發行中心和出納中心。按照蘇聯法令的規定，國營企業、合作社企業和機關必須把它們的貨幣資金交存國家銀行，除了一些零星開支以外，一切的收付也必須通過國家銀行辦理。這樣，國家銀行就成了全國現金流通的起點，同時也是現金流通的終點。

自然，除了以國家銀行爲中心的貨幣流轉以外，還有居民與居民之間的貨幣流轉，特別是在集體農莊市場上的貨幣流轉。但是，這部分的交易在整個商品流通中所佔的比重是不大的。絕大部分的貨幣流通不僅是通過國家銀行收付的，而且，貨幣流通的渠道還是非常集中：即流出的主要渠道，是職工的薪資和集體農莊莊員按勞動日分配的貨幣收入部分，這部分從國家銀行金庫中支出的現金，經常佔了國家銀行所有現金支出的十分之九；而流入的主要渠道則是國營與合作社營商業組織的營業收入，這項售貨收入，經常佔了國家銀行現金流回總額的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㊀。

這種情況——國家銀行成爲現金出納中心，對於貨幣流通的組織與計劃，也同樣提供了最有利的條件。因爲各個企業與組織發放工資從國家銀行的金庫支取現金，現金乃從國家銀行流出，而職工領取工資以後，用以在國營和合作社營商業組織購買消費品，通過商業機構又返流國家銀行，國家銀行乃成爲現金流通的中樞，不像資本主義國家那樣，貨幣從銀行流出，就是無法控制的了。

在上述社會主義社會貨幣流通的特點中，我們很容易看到，馬克思所提出的貨幣流通規律，在社會主義的經濟條件下，是完全有可能自覺地加以運用和實現的。因爲，在這裏，不但決定貨幣流通必要量的各個因素可以根據國家計劃來測定，而且，根據不同的貨幣流轉，國家銀行得以具體掌握貨幣週轉情況。

爲什麼呢？這是因爲在社會主義的這些經濟條件下面，停留在居民手中的貨幣（也就是流通中的貨幣），不外是：（一）作爲購買手段的準備，（二）作爲支付手段的準備，和（三）作爲儲蓄的形態。

作爲購買手段的準備的貨幣，停留在居民手中的久暫，主要是依存於如下兩個因素的，即：

（一）依存於居民收入的貨幣，是否用在國營和合作社商店購買消費品，或用在集體農莊市場購買消費品。如果在國營或合作社商店購買，這部分貨幣就立刻回到國家銀行，這部分貨幣只流轉一次；如果職工所得的工資用在集體農莊市場購買商品，那末，這部分貨幣就要經過較多人的手，才能回到國家銀行，也就是說，這部分貨幣要流通較多的次數。

（二）依存於國營和合作社企業的商品流轉是否有正確的計劃和組織。正確估計每一地區居民的消費需要，以及及時地對居民的消費品組織供應，是可以加速商品流轉，從而加速貨幣的週轉率的。如果商品供應組織不良，各個地區的居民消費需要未能正確估計，即不同品種的商品流轉不能正確計劃與分配，則將引起商品流轉的遲緩，使商品積壓，使貨幣流通速度降低。上述貨幣流通規律曾經告訴我們，貨幣流通速度取決於商品形態的變化速度，那末，在商品流轉的正確計劃下，對於貨幣流通速度的核計，就起着極重要的作用。

至於作爲支付手段準備的貨幣，一般說來是依存於：貨幣收入的時間與打算支出的時間之是否互相適應。支出時間與收入時間的適應性越大，（例如一日領取工資，二日需要納稅）在居民手中作爲支付手段的貨幣準備額則越小；反之，支出時間與收入時間的適應性越小（例如月初收入工資，要月末才支付租稅），則作爲支付手段的貨幣準備額就越大。一般的情況是：城市居民的收入時間與支出時間，比較相適應；而農村居民的貨幣收入，由於生產的季節性關係，農民手中經常要保有較多的貨幣。貨幣流通速度因此也較爲緩慢。

作爲儲蓄形態的貨幣，停留在居民手中的久暫，基本上則依存於儲蓄網的擴展情況和它們對居民的服務程度。如果儲蓄網分布很廣，而儲蓄工作又能爲居民服務，則作爲儲蓄形態的貨幣，就不會過多的停留在居民手中，而匯集於國家的儲蓄機構。

這樣，我們加以綜合觀察時，可以看出，在社會主義的經濟條件下，決定流通中的貨幣量的最主要因素，不外是如下兩項㊁：

第一，影響流通中的貨幣量的，首先是居民貨幣收入的額度。

居民貨幣收入的額度，是和工農業生產的增減密切相關的，生產增加，居民貨幣收入將隨之增加，反之，居民貨幣收入亦將隨之減少。如果貨幣流通速

㊀ 參閱巴丘林：「蘇聯財政與信貸」（俄文版），蘇聯國立財政書籍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三五七頁。

㊁ 參閱巴德洛夫：「蘇聯貨幣流通的組織與計劃」，（俄文版），蘇聯國立財政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第五〇頁。

度不變，流通中的貨幣量必將隨着居民貨幣收入的增減而增減。例如，農民的貨幣收入由於農業增產、國家收購的增加而增大了二倍，如果在同期內對農民的商品供應情況仍和從前一樣，貨幣的流轉次數不變，貨幣流通量也必隨之增加二倍。

第二，影響流通中貨幣量的，是居民貨幣收入的次數、規律和對居民的商品供應情況。

因爲停留在居民手中的貨幣的多寡，在頗大程度上要依存於居民貨幣收入時間與支出時間的是否更相適應，所以，居民貨幣收入的次數越多，越有規律，則處在流通中的貨幣量就越少；反之，居民貨幣收入的次數越少，越沒有規律，則處在流通中的貨幣量就越多。而對居民的商品供應，也同樣有極重要的影響。

自然，除了這兩個最重要的因素以外，還有其他許多因素。例如，各國營企業、機關所保有的現金庫存，及其是否遵守國家的現金紀律，及時交存銀行；以及居民手中的貨幣儲蓄，是否能够及時吸存於國家的儲蓄機構等，但是，這些因素都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居民貨幣收入的額度、規律和商品供應情況。

這樣，貨幣流通的組織與計劃，就不僅要確定居民的貨幣收入額度，而且還要進而瞭解居民貨幣收支的不同渠道，以及在各個渠道中的暢流情況。

在這種情形下面，爲了更具體的組織與調節貨幣流通，蘇聯中央計劃部門乃有居民貨幣收支平衡表的編製。居民貨幣收支平衡表是按照各階層居民各種收支的形式編製的，無論是收入與支出，都分別列出如下兩類：即（一）從國營與合作社企業及機關組織的收入，和對國營與合作社企業及機關組織的支出；（二）居民對居民的出售商品與提供勞務的收入與支出㊀。

因爲居民貨幣收支平衡表規定了不同階層的居民的不同渠道的貨幣收支，所以，它能够核計國民經濟中現金流通的分布和流向。即如何從國營、合作社企業與機關組織流出，如何分配在居民的不同階層，又如何在居民之間流轉，以及通過什麼途徑流回企業與組織的金庫。這樣，居民貨幣收支平衡表的編製，不但可以明瞭居民的貨幣收入與支出的情況，而且也能保證貨幣在居民與企業組織之間的不斷循環，從而適應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的需要。

國家銀行爲了具體組織和執行貨幣流通，更編有現金出納計劃。現金出納計劃規定着國家銀行金庫的現金收入的來源和現金支出的渠道，以及在計劃時期內國家銀行投放貨幣或回籠貨幣的額度。

國家銀行既然是全國現金出納的中心，國家銀行的現金出納計劃就必然反映整個國民經濟的現金流轉。現金出納計劃的收支項目，是根據國民經濟計劃的經濟指標，分別規定了通過銀行的貨幣流通的主要渠道的：它規定着各國營企業、合作社與機關組織爲了辦理它們的支付對現金的需要，規定着爲了滿足這些需要而支付的現金之一切來源；同時，出納計劃也根據貨幣流通的需要情況，按照政府的指示，規定着貨幣流通量的增減，即從發行準備基金與銀行業務基金的相互調撥關係中，具體掌握着貨幣的投放與回籠。

蘇聯的事實證明，在社會主義的經濟條件下，人們是完全可能運用貨幣流通規律，對貨幣流通進行有計劃的組織與調節的。與資本主義國家恰恰相反，那裏流通中所必要的貨幣量完全取決於自發的因素，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價值從來就是不可能穩定；而在社會主義國家，則可以根據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通過國家銀行的現金出納計劃來組織與調節在各個不同渠道上的貨幣的運動。從而使社會主義國家的貨幣成爲世界上最穩定的貨幣。

三

現在我們進而研究我國的貨幣流通的組織與計劃工作。在我國，是否具有貨幣流通計劃化的條件呢？

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也就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一九五二年的這一段期間，我國貨幣流通的組織工作，主要的只是實施了現金管理和「資金管理制度」。現金管理辦法規定了一切公營企業、機關、部隊及合作社等所有的現金，除准予保有規定的限額外，其餘必須存入人民銀行；各公營企業、機關、部隊及合作社間的相互往來，必須經過人民銀行結算。「資金管理制度」的主要內容是：在現金管理下，各級銀行的資金集中總行統一使用，匯兌資金按日軋算匯差，各行使用現金通過發行庫與總行清算。這個辦法，是適應了當時國民經濟恢復的需要的，它幫助了貨幣資金的集中統一使用，在當時大力支持國營貿易、暢通匯兌，開展城鄉物資交流上，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但是，我們也不難看到，在這時候，貨幣流通的組織計劃工作，實際只是奠定了一個基礎，貨幣流通計劃化的條件是不具備的。

然而，當我國進入計劃建設的階段，在我國實施過渡時期總任務的過程中，我國貨幣流通發生了顯著的變化，貨幣流通計劃化的條件已經逐步形成了。歸納起來，我們至少可以看到如下幾點：

第一，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成份已逐步發展壯大，在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過程中，國營、合作社營和公私合營企業在國民經濟中所佔比

㊀ 詳見，馬爾果林：「居民貨幣收支平衡表」，人民大學譯，一九五三年版，第七三—七六頁。

重迅速上升。根據周總理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報告，國營、合作社營和公私合營工業的產值，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在一九五四年預計將由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三十七上升爲百分之七十一左右」㊀，而更重要的，「國營商業已經可以掌握有關國計民生的主要商品的全部或大部，並且管制了全部對外貿易。供銷合作社和消費合作社在今年（一九五四年）上半年已有基層社三萬一千餘個，社員一億六千五百五十二萬餘人，成爲國營商業的强大助手。目前，國營和合作社營商業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的比重已佔百分之五十左右，在批發總額中的比重已佔百分之八十左右。」㊁

在農業方面，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生產在全農業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重雖然爲數不大，但是，在一九五三年冬季，國家開始了對糧食、油料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一九五四年又實行了對油布棉花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小商品生產者的自發的供銷關係，使絕大多數的農民與國營和合作社營企業組織直接往來。農村中的資本主義的自發勢力因此更受到了限制。

第二，全國解放以來，中國人民銀行已經成爲全國統一的、巨大的，擁有近兩萬個機構的國家信用機關。全國私營的銀行錢莊，除了極少數外，絕大部分已合併組成統一的公私合營銀行，並在人民銀行的直接領導下，按照國家的政策和計劃，爲生產和流通服務。人民銀行是我國唯一的發行銀行，並正成爲全國的現金出納中心。在我國，一切變相貨幣和信用票據的流通是禁止了，在社會主義企業間的商業信用也正在逐步取消。近年以來，全國的流動資金的絕大部分都通過人民銀行週轉，而國營企業、合作社、國家機關和社會團體間的交易往來，也都通過人民銀行進行非現金的結算。這樣，隨着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壯大，隨着有組織的市場的發展，人民銀行已有可能掌握絕大部分的商品流轉，從而對貨幣流通進一步的加以組織與計劃了。

第三，由於以上情況的變化，貨幣流通的本身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近年來我國的貨幣流通情況，有兩點是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首先，就是對工人與農民的貨幣收支的比重增大了，也就是說，我國貨幣流通的渠道是越來越集中了。近年來，由於基本建設的擴大，對主要物資實行計劃收購計劃供應的結果，國家直接支付給工人和農民的現金的比重增大了。從一九五四年上半年的銀行現金出納計劃的執行結果看，工資支出和農產品採購支出，達總支出的百分之六十，國家零售商業的收入，佔總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七點九；從一九五四年第三季度的情況來看，通過銀行支出的現金總額中，直接對工人和農民的支付，佔百分之七十以上，至於國營零售商業的收入，則佔全部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因此，在我國貨幣流通的渠道上，充分地表現了：在支出方面，主要是工資與收購農產品的支出；在收入方面，則主要是國營和合作社營零售商業的營業收入。其次，是由於國營和合作社營的商業的發展，在廣大農村一面直接收購農產品，一面直接推銷工業品，貨幣的就地投放與就地回籠的因素也增大了。在過去，由於私營商業的廣泛存在，貨幣的投放或回籠，對某一地區來說，有些地區經常是投放的，有些地區又經常是回籠的；有時候，原來是投放的地區，可能會變爲回籠的地區，有時候，原來是回籠的地區又可能變爲投放的地區。貨幣流通的盲目的自發的因素很大，但是，近幾年來的情況不同了。自從國營和合作社企業與農民直接建立交易關係以後，貨幣在某一地區投放下去，過一些時候一定在當地回流銀行，不再發生在地區間的盲目流轉了，貨幣投放和回籠也有一定的規律了，私營經濟，個體農民之間的盲目的貨幣流通減少了。

由於上述情況的變化，我們很容易看到，在新中國已經出現了貨幣流通計劃化的必要條件。雖然，我國目前各國民經濟部門的計劃性還不够强，目前貨幣流通渠道的集中程度也還不及蘇聯，但是，這些情況都只是量的區別，並沒有什麼質的不同。對於我國貨幣流通計劃化抱着懷疑態度，從而失去信心，是不應當的。

貨幣流通計劃化的條件既經逐步形成，我們應當採取什麼辦法來有計劃地組織貨幣流通呢？毫無疑問，馬克思所指出的貨幣流通規律已經揭示出了組織貨幣流通的基本原理，應當在貨幣流通規律的原理下面，根據我國的具體情況來製訂現實可行的辦法。

蘇聯在這方面的經驗是豐富的。蘇聯成功地運用了馬克思的貨幣流通規律已使貨幣流通計劃化。我們應該確信：蘇聯的貨幣流通計劃化制度，也是我國貨幣流通計劃工作的指針。

雖然，我國現在還沒有進行居民貨幣收支平衡表的編製，但是，從一九五三年第三季度起，人民銀行已在全國實行現金出納計劃制度，同時，也實行了「新資金管理辦法」（亦稱銀行現金調撥辦法），把過去的匯差出入庫及暫付匯差的辦法取消了。一九五五年三月份起，爲了加强貨幣流通的組織與調劑，更在全國實行「發行—現金調劑辦法」，以代替「新資金管理辦法」。在這「發行—現金調劑辦法」下，各級人民銀行能够及時地、正確地將市場貨幣流通數量的增減變化情況，逐級集中並反映在總行的會計帳上，現金出納計劃的執行更獲得了保證。

㊀ 周恩來：「政府工作報告」，人民出版社版，第六頁。

㊁ 同上，第十四頁。

在目前，現金出納計劃成了我國貨幣流通計劃化最重要的工具。我國的現金出納計劃規定着現金流轉的各種不同渠道。它的項目雖和蘇聯的現金出納計劃有所不同，但是，編製的原則是一樣的，它反映了貨幣流通規律的原理：貨幣流通決定於生產與商品流通的需要。而貨幣流通渠道的掌握，不但能够確定社會必要貨幣流通量，且也能够明確貨幣如何在各個渠道中流轉。

我們現在來觀察一下我國現金出納計劃的項目：

收入項目	支出項目
(1) 零售商品收入	(1) 工資支出
(2) 批發商品收入	(2) 糧食收購
(3) 客貨運業務收入	(3) 經濟作物土特產收購
(4) 文教衛生公用事業收入	(4) 工鑛產品收購
(5) 郵政電信業務收入	(5) 郵政電信業務支出
(6) 各項稅收	(6) 公債還本付息支出
(7) 發行公債收入	(7) 行政管理費支出
(8) 儲蓄存款收入	(8) 儲蓄存款支出
(9) 農業生產合作社存放款收入	(9) 農業生產合作社存放款支出
(10) 私營企業存放款收入	(10) 私營企業存放款支出
(11) 匯兌收入	(11) 解付匯款
(12) 收回農貸	(12) 農貸支出
(13) 信用合作社繳存現金	(13) 撥付信用合作社現金
(14) 專業銀行繳存現金	(14) 撥付專業銀行現金
(15) 其他收入	(15) 其他支出
(16) **收入合計**	(16) **支出合計**
(17) 前期業務庫存	(17) 本期業務庫存
(18) 由發行基金調入業務庫現金	(18) 由業務庫繳回發行基金現金
平衡	平衡

這些項目的收支，絕大多數是可以根據有關企業與機關的計劃資料編擬的。例如，零售和批發商品收入，可以按照各系統的專業公司財務計劃，結合當前財經情況與政策及歷史規律，確定計劃期間的現金收入；工資支出項目可按照系統分別搜集職工人數，平均工資分、季度工資總額，扣除應扣項目，計算實發金額；糧食收購及經濟作物土特產收購支出，可根據糧食部門和有關土特產商業部門的收購計劃，掌握品種、單價、數量，結合歷史規律，扣除轉帳支出及坐支，核計總現金支付；客貨運業務收入、郵政電信業務收入、文教衛生公用事業收入、稅收、公債收入、以及郵電業務支出、公債還本付息支出、行政管理費支出等，也都有各有關部門的計劃材料。至於有關銀行各種業務收支，則可以根據銀行的信貸計劃及其他有關材料，參照歷史規律核計。

自然，我們不能不注意，這些項目都是通過銀行金庫收付的金額，並不是社會全部貨幣流通總額。由於我國還存在着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私營經濟之間與個體經濟之間以及居民與居民之間，還有許多貨幣流轉是不通過銀行的。但是，我們在上面曾經說過，我國社會主義的經濟成份在國民經濟中已經佔有較大的比重，通過銀行的貨幣流通在全部貨幣流通中已佔有絕大部分。並且，私營經濟或個體經濟之間或居民與居民之間的貨幣流轉，其收入與支出總是平衡的：某一部分的私營經濟、個體經濟或某一居民對另一部分的私營經濟、個體經濟或另一居民的貨幣支出，也就是另一部分的私營經濟、個體經濟或居民對這一部分的私人經濟或居民的貨幣收入。這樣，決定我國貨幣流通量的增減的，只是上述出納計劃項目中的收支。如果出納計劃中的收入項目的總計大於支出的總計，就意味着流通中的貨幣要回籠，反乏，如果現金支出大於現金收入，就意味着貨幣要投放。

由此可見，現金出納計劃中的收支平衡情況，是貨幣流通量增減的決定因素。現金出納計劃不但規定了貨幣的投放和回籠，而且，在上述各個項目裏，還反映了貨幣流通的主要渠道，全國的貨幣流轉，通過那種渠道流出和通過那種渠道流回。對於社會主義企業的經濟活動，它們是否完成國家的計劃任務，人民銀行還可以通過現金出納計劃的編製與執行進行貨幣監督。這樣，貨幣流通的組織與計劃，必須首先掌握現金出納計劃，現金出納計劃的正確編製與執行是有計劃的組織貨幣流通的重要關鍵，是非常顯明的了。

爲了使現金出納計劃得以正確執行，人民銀行各級行處還要對現金收支按旬分日進行匡計。因爲出納計劃是按季分月編製的，所以，按旬分日的現金匡計是出納計劃的組織執行的重要保證，同時也是現金調撥工作的中心環節。

我們知道，貨幣流通的組織與計劃是非常複雜的工作。在各個不同季節、不同地區、不同生產條件、人口構成與多寡、交通條件以及城鄉往來情況，都會給貨幣流通帶來不同的影響。因此，組織調劑貨幣流通，主要依靠現金出納計劃，同時也有賴於各行處的分期現金收支匡計。現金收支匡計雖然是結合現金出納計劃進行的，但它是針對着各該地區的當時情況，針對該地區在較短時間內的經濟活動對現金的需要進行的一種核計。例如，在該地區的某一特定時間的商品供應情況（某種商品缺貨，某種商品積壓），交通情況，某一時期（有如春節）的工資發放情況，農產品收購的進度和農作物上市的早晚等，都是進行分期現金收支匡計的必要材料。（下轉第20頁）

孟德斯鳩——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維護和平的思想家

——紀念孟德斯鳩逝世二百周年

徐大同

一

孟德斯鳩是十八世紀法國啓蒙學者之一；是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卓越的思想家；是維護和平、反對戰爭的人道主義者；是資產階級法學奠基者之一。他所生活的時代，正是法國封建制度面臨崩潰，孕育着資產階級革命的大動盪時代。

十八世紀上半期的法國，就其社會性質來看，仍然是奠基於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礎上的封建關係佔統治地位的社會。當時，還保存着「沒有土地不屬於領主」的原則，不到全國人口百分之四的貴族佔據了一半以上的土地。農民爲了獲得耕種的土地，要向領主繳納收穫量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的代役租以及許多附加的苛捐雜稅（橋樑稅、道路稅等等）。貴族對農民依然保有各種特權。農民除了向貴族繳納貢賦以外，還要繳納教會的什一稅和苛重的國稅（名目繁多的直接稅和間接稅）。再加上十七世紀末葉和十八世紀初期的連年災荒—兵禍和歉收等等，更使得農民走頭無路。這時，農民爲了自己生存的起義已成爲經常的現象了。

在封建社會內部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經濟，十八世紀時已逐漸在全國經濟生活中佔了重要的地位。出現了許多擁有大批工人和先進技術裝備的手工工場。對外貿易以及殖民地的經營也成爲僅次於英國的歐洲第二大國。但是，爲專制制度所維護和鞏固的封建關係，却成了這種新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束縛。封建的壓榨，使勞動羣衆—首先是農民的購買力十分低下，工業主要是生產極貴重但生產量很少的爲滿足貴族奢侈生活需要的商品，限制了國內市場的發展。城市中的生產大部分被爲專制政府所特加保護的行會所把持。封建割據的殘餘，使商品流通要經過無數道關卡，從而加重了商品納稅的數目。封建落後的工業管理法規限制着技術的革新。總之，這一切都使資產階級對現狀表示不滿，而要求經濟上的改革。此外，儘管資產階級佔有大量財富，然而它仍同第三等級中的其他組成部分一樣，毫無政治權利。法律並不保護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因此，資產階級這時也提出了參加政權的要求，藉以消滅妨礙自己發展的障礙、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

由於十七世紀末和十八世紀初期的政治經濟情況，使得當時法國很明顯地分爲兩大營壘。一方面是貴族和高級僧侶，他們佔全國人口中的少數，但享有一切封建特權。他們依靠對農民的壓榨，國王的薪俸、恩俸和津貼等形式獲得大量財富，但所關心的不是社會的發展，而是終年的驕奢淫侈的生活。他們已成爲社會上腐朽的寄生的階級。龐大的封建上層建築——專制君主、宗教教義就是維護着他們的利益。

另一方面則是「第三等級」，其中包括了農民、城市貧民和資產階級。他們佔人口多數，但幾乎沒有任何基本的政治權利，得不到國家的保護。在他們中間，雖然經濟地位和要求不同，但反對封建制度，反對專制君主制度的共同利益把他們團結在一起。

由於當時法國的工人階級還處在萌芽狀態，發展還很薄弱，因此就決定了十八世紀法國的階級鬥爭的基本路綫是：以革命的資產階級爲首的第三等級和反動的封建特權的等級的鬥爭。

在這個鬥爭中，出現了一批資產階級思想家，啓蒙主義者，如伏爾泰、孟德斯鳩、盧騷、狄德羅等人。他們曾代表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勇敢地批判了中世紀以天啓、神示爲基礎的信仰主義，批判了天主教的一切教義，也揭露了貴族、僧侶以及專制君主的德行敗壞和寄生的生活方式。他們把一切都奠基於「理性」基礎之上，提出了「天賦人權」、資產階級自由、平等等思想，這些都爲一七八九年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從思想上做了準備。

* * *

孟德斯鳩於一六八九年一月十八日生於波爾多地方的一個貴族家庭中，原名爲查理·路易·斯恭達。他曾學過法律。二十五歲（一七一四）時，入波爾

多法院工作。一七一六年繼承了他叔父爲波爾多法院院長，並獲得了他叔父的封地、爵位（子爵）和孟德斯鳩的姓。他在職十年中，研究過哲學、法學、史學、文藝以及自然科學。

在這期間，孟德斯鳩曾寫了不少著作。其中最著名於當時和後世的即「波斯人信札」。

「波斯人信札」是一七二一年匿名出版的，這是一部諷刺性的社會哲理小說。這部小說是以兩個波斯人—郁斯貝克和黎伽的通信方式寫成的。它通過波斯人在歐洲、在巴黎旅行的見聞，對專制的法國君主和社會上層等級的橫行霸道、荒淫無度等行爲進行了非常出色的辛辣的諷刺。

孟德斯鳩在「波斯人信札」中揭露並批判了封建上流社會的阿諛奉承、矯揉造作、陰謀傾軋、賄賂公行、表面上的仁義道德和骨子裏的卑鄙齷齪的生活方式以及僧侶的貪婪和虛僞。他指出了主教是「在大教堂中擬定教義，私下裏却爲有錢信徒籌劃規避這些教義的方法」的人物。同時，他還通過了郁斯貝克的形象來表達出自己關於正義、理性、平等、自由以及政體、法律等問題的思想，這些思想在他以後的著作，特別是「法意」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波斯人信札」是一部卓越的文學作品，它對十八世紀和以後的文學起了巨大的影響。

一七二六年，「波斯人信札」出版後不久，孟德斯鳩放棄了官場生活，賣掉院長職務遷居巴黎，專門從事科學工作。一七二八年他被選爲法蘭西學士院院士。以後他曾先後到過奧地利、匈牙利、意大利、瑞士、荷蘭，最後渡海到了英倫遊歷。他考察了各國的社會、政治、法律、風俗、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狀況。特別是在英國，他居住了將及兩年，熟悉了英國的國家制度、立法，並參觀了英國議院的議會。他着重地研究了洛克的著作和英國憲法。這些，對他以後的思想發展起着極巨大的影響。

返國以後，孟德斯鳩便蟄居故鄉從事著述。一七三四年仍以匿名出版了另一名著「羅馬興亡史論」。他運用了大量的材料，打破了一向佔統治地位的陳腐的宗教觀的歷史學，而以人爲的政治的因素解釋歷史現象。這一著作爲他以後的「法意」奠定了基礎。

一七四八年，孟德斯鳩最後完成了他費了二十年之久寫成的著作「法意」。這部著作總結了各方面的知識，奠定了資產階級法學的基礎。全書二十九卷，凡有關教育、經濟、貨幣、戶口、賦稅、風俗、宗教等等問題都有涉及。這一著作，儘管被教皇列爲「禁書」，但它仍然很快地流傳起來。二年間即出版了二十二版，並且譯成了歐洲各國文字。

孟德斯鳩於一七五五年二月十日在故鄉逝世，時年六十六歲。

二

孟德斯鳩代表了十八世紀初期新興的資產階級利益，表達了它們的政治要求，批判了封建專制制度，提出了君主立憲和三權分立的學說和維護和平、反對戰爭的思想。

孟德斯鳩拋棄了封建的傳統的神權觀點，一切皆由天定的荒謬見解，企圖揭露社會發展的規律性。在他看來，法律不是神造的，而是從事物本性中所發生的必然關係。然而，孟德斯鳩竟錯誤地把地理環境看成是制約着人們道德面貌、法權、政治制度等現象的根源。他認爲由於各國的氣候、土壤、面積、居民的職業、性格、風俗習慣等等之不同。也就決定了各國的民族精神不同，而法權、政治制度等都適應着這種由地理環境所決定的民族精神。這種錯誤的地理環境決定論，構成了孟德斯鳩分析政治、社會問題的出發點。

孟德斯鳩同當時最廣泛流行的資產階級的觀點一樣，從自然法出發來解釋法權問題，認爲在人類制定法產生以前就已經存在着一種適應於人類本性和人類需要的自然法。但是孟德斯鳩堅決地反對了霍布斯關於自然狀態是「人與人之間的戰爭」、「人對人是狼」的觀點，而主張自然法不是表現爲人們之間的「相侵凌」，相反的却是和平、自養、互助和樂羣。孟德斯鳩對自然狀態的這種解釋，構成了他反對戰爭、反對侵略、反對奴役、維護和平的人道主義思想的基礎。

孟德斯鳩認爲在國家交往中，應本互相平等、反對壓迫的精神，以便達到「人類福祉之繁殖」。他認爲「兩個民族的利益，通常是不相干擾的，所以只要愛好正義，就可以找到公平合理的解決」（「波斯人信札」第九十五信）。他更反對爲了壓迫其他民族的聯盟，而把「兩民族間爲了壓迫第三民族而締結的盟約」都看成是「非法」的。提倡「和平條約」，認爲它是「大自然的呼聲，大自然在爭取它的權利」（「波斯人信札」第九十五信）。但他同時也指出和平條件要從「平等」出發，要保證兩國人民都能夠生存，才是合法的。

孟德斯鳩一方面主張以民族平等，和平的方式來解決國際問題，另一方面他也反對了戰爭。他認爲只有「爲了抗拒敵人的侵襲而進行的戰爭」和「爲了援救被侵襲的同盟者」的戰爭才算是「正義」戰爭。除此以外，無論任何藉口，都是「武斷的偏詞」。他更反對封建君主的「驍武窮兵」，以一些小事爲藉口所發動的戰爭，是「毫無正義之可言」的。

目前以美帝國主義爲首的帝國主義集團，正在利用各種方式破壞着世界和平，爲了滿足壟斷集團追求最大限度利潤建立各種侵略性的軍事同盟、企圖發動新的戰爭；反對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妄想使全世界人民都處於受其

奴役的地位。因此，早在二百多年以前被孟德斯鳩所提出的這種關於對和平、對戰爭的人道主義的見解，在今天依然有着現實的意義。

* * *

孟德斯鳩在他的著作中嚴厲批判了專制制度。

早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鳩就已用文學方式抨擊了已腐朽的法國專制制度，揭露了法王路易十四的專橫和暴虐。在「法意」中，更從國家制度問題上來指責了專制政體，提出了自己關於君主立憲制和三權分立的主張。

孟德斯鳩在「法意」中把國家的政體分爲「公治」（共和）、「君主」（立憲君主）和「專制」（君主專制）三種；在「公治」政體中，又分爲「庶建」（民主政體）和「賢政」（貴族政體）兩種。

在各種政體中，孟德斯鳩把專制政體看成只有壞處沒有好處的政體。他指出專制政體是「以一人而具無限之權利，惟所欲爲，莫與忤者也」。（「法意」第二卷第五章）專制君主「一身兼三物，爲憲法、爲國家、爲王者」，他把國家看成「天下惟我一統無並立者」的「私物」。因此，專制君主必須實行恐怖政策，使人民都變成「怯懦」、「愚頑」、「志氣銷萎」、「無敢爲非常之慮」的愚民，奴才，才能維護其統治。所以他說「未有專制之君而非奴隸者也」。爲了達到這種目的，專制君主便利用宗教作爲他使人民服其「凶威」和麻醉人民的工具。因爲「迷信之束縛人心最深。惟迷信，而後其君爲不可侵犯之神聖」。（「法意」第十八卷第十八章）在這裏，孟德斯鳩很清楚地揭露了封建君主和教會互相勾結的實質。在專制制度下，「國中之地皆王土，國中之民皆王臣」，人民無立錐之地；專制君主只顧搜刮人民以滿足他自己和他左右的私欲，不注意國事的「修進改良」，結果「雖有至腴之息土，不數年生息盡矣」！造成了「相率不耕、田野萊蕪」的荒涼景象。因此，孟德斯鳩把專制政體看成「非可久之物」。

對於其他各種政體，孟德斯鳩雖然認爲可以根據各國的國情（地域的大小、氣候的寒暖、歷史的傳統等等）而設立，並無一定的成規，但實際上他却認爲君主立憲政體是最好的國家制度。在他看來，即使是共和政體，無論爲民主或貴族，從其組織上看「皆非自由者也」。只有「平和政府」才能保證實現公民的政治自由。實際上這種「平和政府」也就是被他理想化了的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制度。

但是孟德斯鳩同時也指出，即使在君主立憲政體中，要想使政府不濫用其權力，使人民的自由能够得到保障，也必須「凡立一權，不可不更立一權焉，以爲之限制」。在這個基礎上，他又提出了三權分立、互相制衡的學說。

孟德斯鳩三權分立的學說，只是進一步發展了洛克把國家權力分爲立法、行政、外交三權的主張。他認爲國家權力應分爲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在他看來，只有使這三權彼此獨立，又互相牽制才能使人民的自由得到保證。

孟德斯鳩關於君主立憲和由此引申出的三權分立的學說是有其階級背景的。根據孟德斯鳩對三權分立的分析，實際上是企圖把立法權掌握於資產階級手中，並使它監督行政權；行政權由封建君主獨掌，它雖可對議會的立法有否決權，但無權立法，而且都必需根據法律進行一切活動。至於司法權則是「獨立」的「無所專屬」。這種見解，充分地反映了當時階級的關係。一方面表達了新興資產階級限制君權和要求政治權力以保護自己階級經濟利益的願望；另一方面却也暴露出當時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同封建制度的妥協性，他們企圖通過這種辦法來達到調和各等級利益的目的。

* * *

以上就是孟德斯鳩關於社會、政治的基本見解。從這裏可以看出孟德斯鳩思想的歷史的和階級的局限性。

首先，孟德斯鳩對法權、國家制度的解釋的出發點是唯心主義的。他雖然企圖從社會發展規律來說明國家和法權問題，但他對社會發展規律的了解是遠離科學的。他不是把國家制度、法權看成客觀的社會關係的產物，而是從自然法出發，把它們看成是由理性所確立的；它們適應着由地理環境所決定的民族精神。孟德斯鳩這種地理環境決定論的觀點，符合於那時已在歐洲年輕的資產階級中間形成的、認爲自己在社會經濟上優於亞洲和非洲民族的意識，從而成了爲歐洲資產階級剝削其他民族辯護的思想武器。

其次，孟德斯鳩依據英國國家制度所提出的君主立憲和三權分立的學說，充分反映了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前夫資產階級同封建制度妥協的特色。他所提出的不是革命的見解，而是溫和的改良主義的主張；不是要求從根本上推翻封建制度，而只是要求在限制君主權力條件下使資產階級發展能够得到政治保障。至於他關於三權分立的學說，如同前面所談到的，實際上也是從資產階級利益出發而提出的。這種觀點掩蓋和歪曲了國家的實質。我們知道，任何國家權力，都是統一的統治階級的權力，都是統治階級的專政，各個國家機關，只不過是從不同角度來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分工。這一點馬克思早在批判德國分權原理擁護者居里維特時就已指出：「居里維特和其他國家法哲學家們以極大的敬意把分權崇拜爲神聖而絕無錯誤的原則，其實這不過是把普通的產業分工適用到國家機構上而已。」㊀

（下轉53頁）

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六卷，第二八四頁。

信箱

關於國民經濟計劃

馬紀孔

編者按：本刊收到許多讀者來信，提出了一些有關國民經濟計劃化的理論根據、國家制定國民經濟計劃的原則、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國民經濟計劃和黨的綱領路綫與一般政策的關係等問題，請求解答。現在我們請馬紀孔同志作一個綜合的簡單答復。

社會主義和人民民主國家，對國民經濟實行有計劃的管理，這是較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一個最顯著的特點和優點。

社會主義和人民民主國家，所以能夠實行國民經濟計劃化，是由於在這裏工人階級已掌握了國家政權，和對於主要的生產資料實行了社會化。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產生了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和其他一些經濟規律。在這裏整個社會生產結成爲一個統一體，生產的目的不是追逐利潤，而是爲了滿足社會的需要。工人階級通過它的先鋒隊——共產黨，正是認識、依靠和利用了社會主義的經濟規律，來指導國民經濟的發展的。國民經濟計劃化從可能變成爲現實。

產生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經濟基礎上的社會主義經濟規律，首先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與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是國民經濟計劃化的科學基礎。國民經濟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與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的體現。

國民經濟計劃化，表現爲國家編製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及其執行的過程。國民經濟計劃化，只是管理社會再生產過程的方法，它本身不是目的也不能成爲目的。它只是人們認識並運用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經濟規律的表現與結果。國民經濟計劃化所應達成的目的或任務，由黨和國家依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乃至在當時起作用的其他經濟規律所製定的政策路綫所決定。

國家製定的經濟發展計劃，這是黨爲了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總目標總任務的實際步驟。它是黨的綱領在一定時期的具體化。

國家製定經濟發展計劃時，是以不斷提高社會生產力，增加生產，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需要爲出發點的。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總目標、總綱領，這是編製任何時期的經濟發展計劃的總方向和總指針。

一九五二年，黨提出了我國過渡時期的總路綫總任務：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總路綫的實質，就是通過國家工業化和對非社會主義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使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成爲我國唯一的經濟基礎，在我國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正是黨所提出的這一總路綫，決定了我國從一九五三年開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概括說來，這就是：集中主要力量進行以蘇聯幫助我國設計的一五六個單位爲中心的，由限額以上的六九四個建設單位組成的工業建設，建立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發展部分集體所有制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和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建立對於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初步基礎；基本上把資本主義經濟分別地納入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建立對於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初步基礎。也就是說，這個基本任務的內容，包括着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和對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進行改造兩個方面。

黨的總路綫和第一個五年計劃規定的基本政治經濟任務，就決定了國家所編製的經濟計劃各項主要指標的具體表現，和國民經濟各部門、各地區、各經濟成分之間的發展速度與比例關係的變動趨向。這將必然是：在工農業共同增長的情況下，工業生產的增長速度大於農業，工業產量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上升；在工業部門內，重工業的發展速度要大於全部工業的發展速度，從而使重工業的比重增加。與大量的工業建設投資相配合和適應，國民經濟的積累量必須大大增加而消費量不能不受到一定限制。在各經濟成分之間，社會主義經濟、合作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將會增長的特別快，而非社會主義成分的比重要逐漸縮小；這不僅因爲社會主義經濟本身經營的優越，而且也是由對非社會主義經濟進行改造的必然結果。

編製國民經濟計劃的複雜性，正在於如何根據黨的政策路綫，對於各部門、各地區和各經濟成分作到統籌兼顧、全面安排；如何根據社會需要與實際的可能性規定各項具體指標。安排的不全面，勢必削弱了國民經濟的計劃性，給資本主義的盲目發展留下空隙，延緩經濟的發展與黨的路綫的及早實現；經濟發展計劃沒有具體的指標，則不能表明實現黨的綱領路綫的具體要求或要求不明確，就在形式上和黨的綱領路綫沒有區別；而指標如脫離需要與實際資源條件，也將得不到應有效果。

國民經濟計劃，是黨的綱領、路綫和一般政策的具體化，但計劃與黨的綱領路綫和一般政策又有區別。這種區別首先在於二者的表現形式是不相同的。國民經濟計劃，是通過各項相互聯系和制約着的指標體系來反映政策路綫的，而黨的綱領、路綫和一般政策，則不具有指標的形式。其次，編製國民經濟計劃的基本方法是平衡法——表現爲編製一系列的物質、財政與勞動平衡表，乃至編製綜合的

表明社會再生產過程的國民經濟平衡表；而黨在製定自己的綱領、路綫和政策時，則主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分析綜合法。但，它們所要達成的總任務總目標又完全一致。而且也不允許不相一致。

國民經濟計劃是實現黨的綱領、路綫和政策的工具。首先，計劃本身就是黨的綱領、路綫和政策的具體化。黨的綱領決定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但，沒有也不可能規定何時建成社會主義，這個問題只能隨着經濟的發展，隨着歷屆計劃的執行，而逐步獲得解決。現在我們就可以說：大約要經過三個五年計劃，就可以在我國建成社會主義。我們所以敢於而且能够回答何時建成社會主義這個最重大的問題，決不是單純憑了勇敢或者是猜測，而是經過對於工、農業生產發展的認眞核算，與加以計劃發展而得的可靠結論，是建立在對於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安排改造的科學計劃上面的。正是通過計劃工作，使黨的綱領的實現，成爲有計劃有步驟的行動，而能獲得最後勝利的保證。

其次，國民經濟計劃，這是進行階級鬥爭的鋒利武器。「階級鬥爭的全部複雜性在計劃工作中反映得特別明顯。國民經濟應當往何處發展，如何發展，循着什麼方向發展——這些都是階級政策」。列寧認爲：計劃，這是無產階級專政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過渡時期，國民經濟計劃，就其階級內容來看，就是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工人階級戰勝資產階級的一幅縮圖。計劃中有關公、私經濟比重的指標動態，固然是最明顯的說明着「誰戰勝誰」這個問題，就是國民經濟計劃中所有一切主要指標，無不都是直接、間接與這一問題相關聯的。例如，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指標，看來似乎與「誰戰勝誰」這一問題無關了，其實不然，社會主義之所以可能戰勝資本主義，和必然戰勝資本主義，正是因爲社會主義有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提高社會主義經濟各生產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就能够爲社會創造出更多的產品積累，從而使擴大建設投資成爲可能；就會創造出更多的工、農業產品，大大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社會主義經濟，而其中主要是社會主義工業的發展，則是實現總路綫的物質力量與領導力量；工業生產量指標的動態，則是影響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步驟與進程的決定性因素。可見，提高工業各部門勞動生產率，是與「誰戰勝誰」的問題存在間接但很密切的關係的。我們正是藉助於計劃工作，使國民經濟的發展轉向我們所需要的方面去。計劃工作重要任務和原則之一，是要編製出階級性明確的計劃出來。

國民經濟計劃是實現黨的綱領、路綫和政策的工具，還在於：計劃——這是全國勞動人民目標和意志的集中與統一的表現，它是全國勞動人民經濟生活和社會文化生活的指導力量。通過計劃工作能够把全國人力、物力和財力資源充分動員起來，並集中於解決當前面臨的主要政治、經濟任務。計劃可以調節全國人力、物力和財力在國民經濟各部門、各地區分配比例，避免資源的浪費，保證國民經濟按比例的協調發展。國家所編經濟計劃，以未來的光明前途的輪廓，鼓舞全國勞動人民的積極性、創造性，爲其實現而進行忘我的勞動。計劃的先進性，具有動員全國勞動人民的力量，一致爲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生產、厲行節約和降低成本而鬥爭。

爲使國民經濟計劃，成爲實現黨的綱領、路綫和政策的有力工具，編製國民經濟發展計劃，首先應服從於黨的政策路綫，使當前的政治經濟任務與黨的長遠目標相結合，使短期計劃與長期的發展遠景計劃相結合。所編計劃應具有科學性，反對因循保守，但同時要把主動精神、爭取及早實現社會主義的決心，意志和實際可能密切結合，使計劃的各項主要指標，建築在堅實可靠的基礎上。

國民經濟計劃是工人階級用來組織新經濟，加快社會主義建設速度的最重要因素。這決不是說停留在編製正確的計劃方案上，而更重要的是說要依據計劃方案指導我們的實踐活動。國民經濟發展計劃、與黨的綱領、路綫和政策應具有同樣的不可違犯性，認爲計劃是自己編製的，因而也可以任意修改，不執行或不全面貫徹執行，這都是不可容許的事情。對於計劃貫徹執行的情況，應該看作是對於黨的事業忠誠程度的重要標誌。防止違犯計劃的現象的最好方法，是組織經常的監督和檢查。

本刊啓事

本年五月份，各地郵局收訂本刊第三季度訂戶，讀者可預訂一季，或訂至本年年底爲止。至於具體收訂及截止日期，由各地郵局按不同情況另行規定。希讀者及時向當地郵局聯系，在規定的收訂期內辦好預訂或續訂手續。

教學與研究

「教學與研究」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的綜合性的學術月刊。它的主要任務是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開展學術批評，結合研究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理論和實際問題介紹政治、經濟、財政、法律、外交等各種專業科學知識，並兼顧在職幹部的政治理論學習，推動教學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的開展。

一九五五年　第四期　　目錄

列寧論過渡時期的工農聯盟……高　放
列寧論過渡時期的階級鬥爭……許征帆
解放台灣是我國的內政，決不許美國干涉……林　欣
中國地理學發展概述……孫敬之
——在蘇聯地理學會第二屆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蘇聯工業化初期的國民經濟計劃工作（續）……米·維·布列也夫
列寧的著作「關於辯證法問題」……弗·然·克列
評「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法則
在我國過渡時期的作用」……李聿恒
講授「中國革命史」怎樣貫徹理論聯系實
際的方針（續完）……中國革命史教研室
「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課程綱要（續完）
……蘇聯高等教育部奧皮契金教授主編
蘇聯高等教育部社會科學教育司審定
根據蘇共中央和中共中央最近各項決議的精神
提出「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講授方法的幾點
一般意見……費·謝·巴甫洛夫
讀「『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課程綱要」的札記……朱　榕
問題解答（九則）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全國各地郵局發行

北京市期刊登記證出期字第九五號

本刊零售每冊三角五分

北京新華印刷分廠印刷